

应舜仁：
蒋介石在台岁月

老先生最主要是一双眼睛厉害，有一种使人敬畏的味道/老先生非常听夫人的话，不听的时候两个人也不会吵嘴/同老先生握手的中国人恐怕很少，他只有接待外宾才握手/他岁数已经大了，也不是像外面说的年轻时候那个脾气，基本上很慈祥/夫人一哭，我很惊讶，怎么夫人会哭？接下来是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



蒋孝严：
蒋家门外的日子

外婆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我跟孝慈当然难以置信/生活比一般人差很多，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我们就像两个小虾米，蒋家就像大鲸鱼啊/经国先生过世后第四天晚上11点，安排车子载我跟孝慈一起到荣总医院，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们泪如雨下，跪在那里磕头，但总算见到了……



陈履安：
主政台湾的
"陈诚伯"

我父亲时常讲，军人不怕死，文人不要钱，这个政府就有救/很多事情做好决定了，让他来背黑锅，孙立人案子也是这样/他有段时间非常不愉快，时常跟我讲找块田去耕田，他很向往农村生活，但他这一生都没有可能/老"总统"说，你以前跟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一起到中南部去，我就不放心……他把连任的理由说成我父亲跟文人在一起。



孔令仪：
家族最后的
守望者

蒋夫人比较外向，孙夫人不太多讲话，跟家里人也这样/父亲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的，他知道自己是国共斗争的对象，离开是唯一的选择。他深知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重新定义他的事迹/她（宋美龄）有很厉害的皮肤病，这个病我想是敏感，很多事情搁心里面不能够讲出来/我跪在她床前，握住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眼睛。她在等我，留最后一口气等我……



白先勇：
白崇禧的孤寂晚年

他主要就是看看书、下下棋，在家里养了二三十盆兰花/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的，后来他去交涉，清真寺建起来了/他们对我父亲相当防范，我们家对面就是派出所/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该讲什么讲什么/整个家几乎是我母亲一个人撑起来的，她过世的时候父亲受到的打击很大。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口述·历史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从大陆到台湾，
大量历史细节首次披露

从历史风云到家族命运，
还原台湾历史真实样貌





最富有人情味的民国史和台湾史
最真实的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白崇禧、陈诚……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应舜仁：蒋介石在台岁月

老先生最主要是一双眼睛厉害，有一种使人敬畏的味道/老先生非常听夫人的话，不听的时候两个人也不会吵嘴/同老先生握手的中国人恐怕很少，他只有接待外宾才握手/他岁数已经大了，也不是像外面说的年轻时候那个脾气，基本上很慈祥/夫人一哭，我很惊慌，怎么夫人会哭？接下来是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日子

外婆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我跟孝慈当然难以置信/生活比一般人差很多，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我们就像两个小虾米，蒋家就像大鲸鱼啊/经国先生过世后第四天晚上11点，安排车子载我跟孝慈一起到荣总医院。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们泪如雨下，跪在那里磕头，但总算见到了……



陈履安：主政台湾的"陈诚伯"

我父亲时常讲，军人不怕死，文人不要钱，这个政府就有救/很多事情做好决定了，让他来背黑锅，孙立人案子也是这样/他有段时间非常不愉快，时常跟我讲找块田去耕田，他很向往农村生活，但他这一生都没有可能/老"总统"说，你以前跟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一起到中南部去，我就不放心……他把连任的理由说成我父亲跟文人在一起。





孔令仪：家族最后的守望者

蒋夫人比较外向，孙夫人不大多讲话，跟家里人也这样/父亲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的，他知道自己是国共斗争的对象，离开是唯一的选择，他深知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重新定义他的事迹/她（宋美龄）有很厉害的皮肤病，这个病我想是敏感，很多事情搁心里面不能够讲出来/我跪在她床前，握住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眼睛，她在等我，留最后一口气等我……





白先勇：白崇禧的孤寂晚年

他主要就是看看书、下下棋，在家里养了二三十盆兰花/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的，后来他去交涉，清真寺建起来了/他们对我父亲相当防范，我们家对面就是派出所/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该讲什么讲什么/整个家几乎是我母亲一个人撑起来的，她过世的时候父亲受到的打击很大。





口述·历史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从大陆到台湾，
大量历史细节首次披露

从历史风云到家族命运，
还原台湾历史真实样貌





最富有人情味的民国史和台湾史
最真实的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白崇禧、陈诚……

版权信息

台湾往事

作　　者：凤凰书品

出 版 人：刘清华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应舜仁：蒋介石在台岁月
〇在士林官邸，老先生对夫人真是百依百顺
〇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〇老先生是军人的个性，意志很坚定
〇先生流鼻血了，牙齿也流血，夫人脚这边流血了
〇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哭的声音
第二章 陈履安：主政台湾的『陈诚伯』
〇蒋“总统”再来电：做台湾省主席，这是命令，你非接不可
〇这样喊来喊去，把两个师喊过来了
〇“不贪污，不怕死。”你做得到就来，做不到你别来
〇我们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毕竟你把人家家里的钱全搬过来了
〇那些老师，在课堂里面教着教着就哭起来了
〇孙立人马上把衣服拉开来，身上全都是伤疤
〇老“总统”一句话不讲
〇他从来不讲痛，还是军人性格，我死都不怕还怕痛啊
第三章 白先勇：白崇禧的孤寂晚年
〇父亲晚年很寂寞，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失落
〇我们家从小都遵守教规，不吃猪肉的
〇撤退的时候，他坐在马上睡着了，好几次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到田里头
〇每次谈到四平街会战他都跺脚
〇“国安局”到家里来查抄，连地板都被揭开来检查
〇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
〇要加害我父亲的话，不必等到那个时候
第四章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日子
〇她看到经国先生并无纯中国血统的孩子，自愿以身相许
〇外婆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我跟我弟弟当时难以置信
〇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
〇我们两个人就像两个“小虾米”，蒋家就像个“大鲸鱼”

〇孝武旁边的人注意到了，对我们就有点防范

〇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跟孝慈很激动，泪如雨下，跪在那面磕头

第五章 孔令仪：家族最后的守望者

〇家里很严格，我们一年只能出去两次，平时是不许去外面的

〇他（孙中山）总是先喝汤，然后再吃饭……他比较西洋化

〇我们几个学生在那里演讲，一大堆人围着我们。蒋公侍卫的车子经过那里，见一堆人围着我，以为出了事情

〇我们家里头，小孩是学外国的。小孩子只听不说

〇父亲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的

〇我跪在她床前，握着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眼睛

第六章 郝柏村：亲历金门炮战

〇老“总统”说金门是下决心要守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守

〇金门炮战是老“总统”老早就预料到的，情报上是知道的

〇武官就报告，说昨天晚上金门发生炮战，老先生很镇定，他说知道

〇美军护航运补只到离大陆12海里

〇晚上他打他的，我们照样睡觉

〇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错的

第一章　应舜仁：蒋介石在台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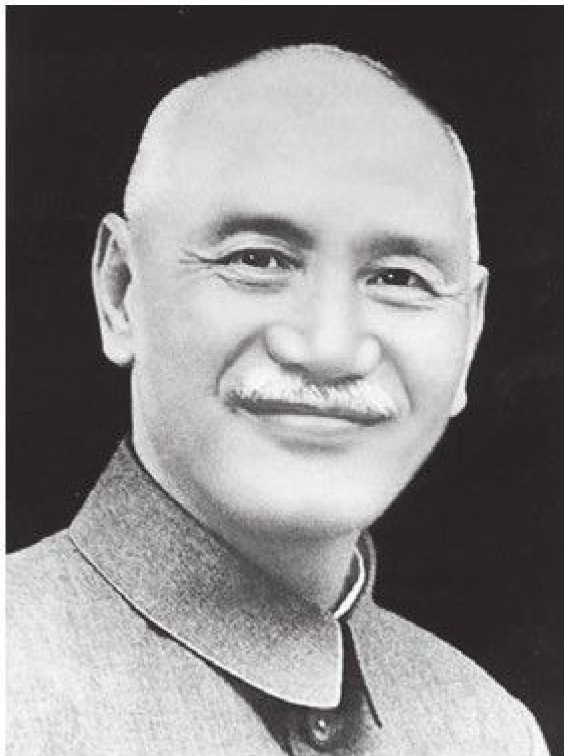
讲述人　应舜仁

应舜仁，蒋介石侍卫。1927年生于浙江永康，1945年当兵离开家乡，在南京总统府仪仗队就职。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工作38年，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最后岁月。退休后从事写作，先后发表政论文章台湾歹戏拖棚几时休　再说台湾歹戏拖棚几时休三说台湾歹戏拖棚几时休　草山行馆一把火——谁点火焰？等。

讲述人　郝柏村

郝柏村，『国军一级上将』。1919年生，江苏盐城人，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亲历抗日战争，参与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1965年任『总统府侍卫长』。后任『陆军总司令』，1981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93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副主席。退休后多次到大陆参观、访问。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



生于溪口一个盐商之家，幼年丧父，20岁入保定军官学校，次年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回国追随孙中山。

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个真正全面继承其地位的党、政、军领导人。

1928年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形式上统一中国，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战败后退守台湾。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市郊士林官邸病逝，享年88岁。

曹景行：1975年4月5日，清明节的午夜时分，88岁的蒋介石在台

北士林官邸去世。那天晚上，当应舜仁听到楼上传来的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哭声，他禁不住浑身颤抖，茫然无所适从。从南京到溪口，再到台北，蒋介石当政、下野，又再次上台，在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的30多年中，应舜仁始终作为侍卫官随侍在他的身边。

应舜仁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工作了38个年头。抗战胜利之后，作为南京总统府仪仗队的一员，他每天和战友们立正、敬礼，目送蒋介石的车队缓缓开过。那时候，蒋介石的警卫人员分为外勤部队和内勤部队。身穿军装的应舜仁属于外勤部队，也被叫做军衣部队。

1954年1月，国民党到达台湾的第五年，应舜仁终于脱下军装，换上了浅色的中山装，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名便衣侍卫，也因此，他有了第一次和蒋介石单独谈话的机会。

应舜仁：便衣（侍卫）呢，那时候蒋公是要见的。从便衣侍卫到侍卫室的人，他都要自己见，不然不放心。他在“总统府”见我，问我问题，问得很详细：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看书，等等。老先生最主要是一双眼睛厉害，眼睛看起来很有精神的样子，有一种使人敬畏的味道。

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岁月，使得蒋介石一贯表情严肃，不怒自威。时任士林官邸凯歌堂牧师的周联华回忆说：“我第一次见蒋公的时候，就有个印象，这印象一直在我心里，就是蒋公鼻子以上非常威严，尤其是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以下非常和蔼可亲，尤其是他的嘴。所以我常常说他的鼻子以上像严父，他的鼻子以下像慈母。所以每次我都尽量多看他的嘴，这样我就不太害怕了。”

应舜仁：他跟你谈话的时候，很注重你的应对、讲话、语气各方面。他还看你这个人的仪态、表情。很多人讲老先生会看相，其实不是看相，他是见过了千千万万的人，见过的场面、见过的人多了去了，所以能察言观色。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厚道不厚道，是不是嬉皮笑脸的那种，有没有奸诈的样子。再等你开口，几句话一讲，他就可以了解你一半了。

如此审慎地挑选侍卫，是蒋介石多年军旅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他亲自起用的第一位贴身侍卫是自己的堂侄王世和。1921年，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返家奔丧，守制期满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由

于早前在广东曾与粤军将领结下梁子，蒋介石担心此行粤军会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因此打算挑选一批忠贞可靠的家乡青年，组成一支小规模的近身侍卫队随他去广东。他见22岁的堂侄王世和长得精干结实、反应灵活，此时又无业在家，便命他广招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青年。最后挑选了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名蒋姓宗亲侄辈与王世和一起组成贴身侍卫小组，由王世和担任侍卫长。由此，蒋介石开始正式使用侍卫，终其一生没有停过。

应舜仁记得，蒋介石当时用红铅笔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一个钩。一周之后，他就正式调任侍卫工作。应舜仁是浙江人。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原本几乎是清一色的浙江籍，但是到了台湾之后，随着新老交替，侍卫当中也有了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而蒋介石本人浓重的浙江口音就成了“新科”侍卫的难题。应舜仁说，作为一名侍卫，“听话”是最基本的要求，“听话”不仅是要懂得蒋介石的口音，更是要懂得百分之百地服从。

应舜仁：老先生办公的时候要回形针，但他不叫回形针，叫“插销”。一般人想应该是门上那个插销吧，结果错了。老先生又讲“拿绢头”，绢头是什么？上海人讲手帕，宁波人才讲绢头。一个武官去拿什么？去拿了块砖头来。

听错了话，老先生会生气的，这时候你就得听话、得服从。如果辩一句，他就要发脾气了：“强辩，强辩！”他觉得，你对我来讲是用人，不应该在我这个主人面前强辩你的理由。结果有一次山东武官听成了“枪毙”，吓得发抖发慌，怎么这样就要被枪毙？副官跟他讲，我像你这样子“枪毙”，早就被枪毙十几次了。

曾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也在蒋介石身边服过役。郝柏村是江苏盐城人，到台湾之前只是军中的一名营长，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因为驻守小金门有功，受到蒋介石父子的赏识。1965年，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命，46岁的郝柏村来到台北士林官邸，成为蒋介石身边第一位非浙江籍的中将侍卫长。

郝柏村：有一天，经国先生打电话叫我到台北来见他一趟。我坐火车到他家里，见面以后他说，你调任侍卫长。第二天，老“总统”就见我，说你马上到职。于是我就到“总统府”来担任侍卫长了。

郝柏村说，侍卫长并不是侍卫，他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秘书，还

要负责蒋介石和家人的安全保卫。此外，他还是士林官邸的“大总管”，吃、穿、住、行诸项事宜都得经手。

对于自己获得重用，郝柏村认为除了能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军中背景单纯，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而他被任命为侍卫长是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决定的，如此重大的任命，使得郝柏村格外小心翼翼。

郝柏村：选我做侍卫长，我想他当然有培养我的意思。因为过去侍卫长一般都是浙江人，而且很少有带兵的，没什么当过师长、军长的人来做，我是例外，既不是浙江人，又带过兵。

曹景行：所以您上任的时候，自己感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郝柏村：对，重大转变。怎么讲呢？这是个成败的关键。人家说“伴君如伴虎”，你在他旁边做好了，当然他可以让你上去，那要做不好，马上就要下台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发展机会了。因为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很小心谨慎，做得很好，老“总统”蛮喜欢我的。

〇在士林官邸，老先生对夫人真是百依百顺

身为蒋介石的侍卫，也常常有机会见到宋美龄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第一夫人”。事实上，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蒋介石已经有过婚姻。14岁时，他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比他大5岁的同乡女子毛福梅。从日本回国后，他结识了歌女姚冶诚，并将其纳为妾室。1921年，他又在上海与陈洁如结婚。尽管如此，当蒋介石第一次在孙中山家中见到宋美龄时，立刻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嫁给了银行家孔祥熙，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哥哥宋子文也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娶宋美龄，对蒋介石会有很大帮助，外界也一直盛传这是一段政治婚姻。《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胡霖曾说：“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一位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28年年初，下野后的蒋介石重新执掌权力，继续领导北伐并取得胜利，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宋美龄也开始在交际活动中崭露头角，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事变中，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有的主张轰炸西安，有的要求重新选举领袖。尽管意见众多，但宋美龄明白事情必须尽快解决，才能挽救蒋介石。12月20日，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捎来的宋美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12月22日，她冒着生命危险赶到西安。下飞机前，宋美龄交给随从一把手枪，嘱咐他如果军队要抓她就一枪把她打死。当她走进囚禁蒋介石的卧室时，蒋介石甚至觉得是在做梦，惊呼乃至泪流满面。当时的情景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乍见惊讶，如在梦寐……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在宋美龄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或许到这个时候，这段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婚姻，悄然发生了变化。

宋美龄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开始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一向反对他们的婚姻的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后也对友人说："以前没有爱情，但现在有了，宋真心诚意地爱着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着宋。"

随着日军侵华局势的日益严峻，蒋介石开始筹划建立中国的空军。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宋美龄。尽管宋美龄的军事知识和经验都有限，但为了组建空军，她投入了大量精力学习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1937年春，宋美龄还写信给美国的陈纳德 [1] 将军，邀请他来中国担任空军顾问。陈纳德应邀来到中国，帮助宋美龄组建中国空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身份指挥作战，宋美龄则经常冒着炮火上前线慰问战士。因为财政的匮乏、军事的落后，宋美龄又帮助蒋介石积极寻求美国的援助。1942年2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秘密出访印度。访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来一份电报，美国将为中国提供贷款。随后，英国也宣布为中国提供贷款。经过多次协商后，美国和英国还自愿放弃了清末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这次事件，让中国的国际声望迅速提升，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战火纷飞当中，蒋介石夫妇始终携手共进。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经历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永别大陆，飞抵台湾。他所乘坐的专机，就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美龄号"。第二年，在美国寻求援助无果的宋美龄也来到台湾。那一年，蒋介石63岁，宋美龄53岁。

应舜仁亲眼见证了这对夫妇的台湾岁月，甚至在蒋介石去世之后，他还继续担任了10年宋美龄的侍卫官。在应舜仁看来，蒋介石对宋美龄，可以称得上是百依百顺。

应舜仁：老先生在阳明山官邸办公的时候，有个给夫人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叫张瑞香——他经常给夫人做旗袍。有一天他做好衣服以后拿给夫人看，夫人非常满意，说"这褂好，这褂合身，就这样子！"很高兴。于是张先生很得意，出来以后就唱黄梅调了——那时候黄梅调很流行。

那个小走廊走出来就是办公室，老先生正在办公，听到了，就骂："混账东西，谁唱歌啊？谁唱歌？"副官就去跟张瑞香讲，不好了，你被老先生骂了。他就害怕了，怕以后怎么办呢？去跟夫人报告，"报告夫人，老先生骂我了"。夫人问："为什么骂你？""他说刚才我唱歌。"夫人说："好了，你下回不要唱就好了。"然后夫人就走到老先生面前去，她叫老先生"达令"，老先生也叫夫人"达令"，两个都叫达令。她说："达令，你怎么骂张瑞香？"老先生说："他唱歌，他混账东西。"夫人说："他是粗人，粗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去怪他，以后不要唱就好了。"夫人这样一句话，就没事了。在士林官邸，老先生对夫人真是百依百顺。

应舜仁所说的达令，就是英语中的darling（亲爱的）。蒋介石虽然不会英文，但是受宋美龄的影响，彼此会用"达令"称呼对方。美国政治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件趣事：蒋介石的侍卫总是无意中听到蒋介石叫宋美龄"达令"这个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这是上流社会称呼"太太"或"夫人"的一种时髦说法。有一天宋美龄让一名侍卫给蒋介石捎带个口信。这名侍卫见到蒋介石以后，毕恭毕敬地说："先生，达令让我告诉您……"蒋介石听到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名侍卫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于是摆摆手，让他走开了。

在台湾，蒋介石的生活相当规律，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做一小时的体操，7点钟准时开饭。而宋美龄习惯每天夜里一两点钟才睡，早起很困难，但是每天早晨她都会睡眼惺忪地准时出现在饭厅里，陪蒋介石吃早饭，蒋介石是清粥小菜，宋美龄则习惯牛奶、面包。等到8点钟蒋介石工作了，她再回去补睡两三个钟头。中午12点两人一起吃午饭，蒋介石以中餐为主，宋美龄偏好西餐。这也是他们交流最多的时候，常会谈一些生活琐事。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宋美龄会亲自送甜点及饮料到蒋介石的书房，如果时间允许，下午5点两人会坐车到台北近郊散步。不宴客的时候，她也会陪伴蒋介石用晚餐。

为了排遣寂寞，抒发思乡之情，宋美龄到台湾没几年就开始学习国画，士林官邸特意为她请来台湾最知名的画家教学。宋美龄很有天赋，进步很快，水平也颇高。有时候宋美龄作画，蒋介石也会停下手头的工作，从办公室出来，站在宋美龄身边静静地看，宋美龄也不说话，默默地画画。这时候除非有特别紧急的大事，侍卫们一般不会进去打扰。

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的时候，曾向宋母倪桂珍许诺，他会试着

开始了解基督教，并阅读《圣经》。到了晚年，蒋介石更是虔诚地潜心研读，每周日还会陪宋美龄上教堂做礼拜。牧师周联华说：“蒋公做完礼拜出去的时候，对左右的人打个招呼笑笑，但通常他不停下来跟任何人讲话，可蒋夫人出去的时候，她会跟很多人讲话，假如刚好一个家庭里头有点什么事，她一定会注意到，一定会跑到那个人面前跟他讲几句话。”

闲暇时，蒋介石还常常会去角板山。角板山位于桃园县复兴乡，海拔约636米。此地气候温和，加之群峰罗列，溪谷萦回，素有“台湾庐山”的美誉。因为道路崎岖，宋美龄不喜欢，所以蒋介石经常独自一人前往。

角板山梅林遍布，喜爱梅花的蒋介石常常会到梅树底下转来转去，找到几枝好花后，便吩咐侍卫官把花剪下来。回去之后，他总是把那些梅花送到宋美龄的房间。而每当两个人闹矛盾的时候，蒋介石也会到角板山小住散心。

应舜仁：老先生非常听夫人的话，但是不听的时候也有。不听的时候，两个人也不会吵嘴，老先生就闷在肚子里，自己到复兴乡去，到角板山去。那边是老先生经常去的，那儿有一个溪口台，也有个瀑布，很像溪口的瀑布。老先生不和她讲话就到那边住上三天。经国先生假使知道就一定会来，住个一两天，老先生又回到官邸去，就没有事了。

〇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蒋经国不仅是蒋介石的长子，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他执掌党权，控制情报治案保卫单位，并且逐渐参与并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力。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蒋经国将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曹景行：在您看来，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郝柏村：他们关系很好。他（蒋介石）经常同经国先生商量问题。谈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坐车出去，在车上谈。因为车子中间是有玻璃挡着的，坐在前面的坐乘侍卫官是听不到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谈话就比较安全，不用怕人偷听。包括蒋夫人（宋美龄）有什么事情要谈的，他们都到车上去，那是最保密的地方。我的车子就跟在后面，负责安全。虽然他们关系很好，但是作风并不一样。老“总统”是非常严肃的人，旁人看来威严得很。经国先生则是很随和、很亲民的人，见到人就握手。同老“总统”握手的中国人恐怕很少，他只有接待外宾才握手。

曹景行：您跟他握过手吗？

郝柏村：没有，从来没有。

曹景行：他不喜欢跟人握手是吗？

郝柏村：好像也不是，他见到外宾、外国客人，都会主动伸出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国内的人，都是“部下”，他是“元首”，他不伸手，别人也不敢去握手，而他也没有这个习惯。经国先生是不管这些的，每次见到人都主动地把手伸过去，这个就不一样。

蒋介石有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蒋经国小时候是在生母，也就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身边度过的；蒋纬国则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一手带大。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蒋介石曾经说人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兄弟二人确实也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蒋经国15岁便被蒋介石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然而随着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不断打击共产党，蒋经国就成为扣押在苏联的人质，蒋经国始终没有办法回国。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国共

决定合作抗日，斯大林才解除了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1937年4月，蒋经国带着他的俄国妻子蒋方良回到家中。此时，他已经在俄国待了整整12年。

蒋经国说：“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画线标明了。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在蒋介石的培养下，蒋经国逐渐成为父亲的左右手。

蒋纬国比蒋经国小6岁，自幼颇受父亲宠爱。蒋纬国曾经很自豪地说：“从小父亲就是我最好的师长、最要好的朋友！他只要在家就会教我读书、陪我练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从不曾打过或大声责骂我。是对或错，他都会清清楚楚地从正面教导我，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最记得，每当他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他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纾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蒋纬国从小便学习少林拳、太极拳，立志要做一名军人。1934年，他中学毕业后，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随后因病无法接受入伍训练，蒋介石专门安慰他：“既然决定做一个现代的职业军人，不妨先打好理工基础，懂得政治、经济、社会之后再为伍。”遂转考入东吴大学物理系就读，主修物理，辅修数学。1936年，德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n）到中国协助训练陆军，蒋介石就将蒋纬国介绍给他，希望他帮助蒋纬国到德国学习军事。

同年10月，20岁的蒋纬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两年后又前往美国陆军航空对空战战术训练班，接受空军战术训练。结业后又到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1年结训后回到中国，进入军队服务。尽管从小得到父亲的百般疼爱，但是与蒋经国不同，蒋纬国一直待在军队中，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权力核心。

1964年，蒋纬国负责的装甲兵部队发生“湖口事件”，将一向低调的蒋纬国推上了风口浪尖。11月21日，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新竹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力斥“政府”和军界贪污无能、生

活腐化，号召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训话完毕后，赵志华询问台下谁敢跟他一起去，无人回答。赵志华掏出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再次询问谁敢跟他一起去，但很快就被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抓住送进了司令部。得知这个消息，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当即下令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

根据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刘安祺的回忆，湖口事件“既不是兵谏，也不是兵变，是装甲兵副司令一时糊涂而造成的；他对蒋纬国的某项措置不满”。而蒋纬国则认为“赵志华赵副司令是个很内向的人，不过，不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在平时教育训练各方面他的表现都不错。那次出事情，完全是因为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但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第一次将领号召哗变的事件，因此被视为谋反案处理。赵志华先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无期。在服刑期间，蒋纬国经常去探望他，并帮他照顾家属。由于赵志华是蒋纬国一手提携的将领，虽然此时蒋纬国已经调离装甲兵部队，但是蒋介石依然认为蒋纬国“不识人”，是“不堪造就之才”，让蒋纬国离开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带过兵，也再没有得到晋升。他的中将军衔整整挂了15年，直到1975年才晋升为上将。

在应舜仁看来，蒋纬国和哥哥蒋经国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

应舜仁：对待经国先生跟纬国先生，老先生是有差别的。两个人的思想稍微有点不同，一个是德国教育，一个是苏俄教育，苏俄的教育偏向于一种阴性的刑暴管制。那么德国教育呢，是服从，非常服从别人，做事情也很开朗。

比如说纬国先生几天没有看老先生了，他就跑到官邸去，陪陪老先生，一起散散步。有一次老先生在前面走，我们侍卫人员跟在后面，纬国先生还在我们的后面。结果呢，老先生旁边的蒋孝武、蒋孝勇就在旁边讲，叔叔来了，老先生就回头一看。看老先生回过头看他，纬国先生三五步就跑上去：“阿爹你好。”

老先生问：“你这两天干什么？”他说：“我到南部看演习。”“看演习了，那么演习好不好？”纬国先生这个人直肚肠，说不好。“不好？”老先生就有点不对劲了：“怎么不好？为什么不好？”他说：“这个演习都是假的。”“怎么假了？”他说：“我看到美国人要演习，就当天从部队抽人出来马上去演习。我们可是军、师、团、营，早几个礼拜以前，天天就在那边练习了。”老先生就不高兴了。如果是经国先生来看老先生，老先生

问：“你最近干什么？”“我看演习。”“演习好不好？”“阿爹，效果好。”“哪里好？”他就说怎么样好怎么样好。老先生很高兴，老人家就喜欢听好的。

〇老先生是军人的个性，意志很坚定

尽管有亲人的陪伴，蒋介石在台湾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就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是孤独的。早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夕，诸多“党国要员”已经丧失了信心，纷纷逃往海外，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很大一部分寓居海外。而他最有力的两大经济支柱——孔祥熙、宋子文均前往美国定居。

为了守住风雨飘摇的台湾，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此外，还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违者军法处置。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等一百多种强化“戒严”的法规条令。

从此，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要么进监狱，要么被枪毙。

尽管牢牢掌握了台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诸多自由，各种风波仍然不断发生，一次次冲击着蒋介石。1957年3月20日，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打字员刘自然与妻子奥特华参加完同事的婚礼，回家途中，被埋伏在路旁竹林里的美军上士罗伯特·雷诺连击两枪，击中头部和胸部，随即死亡。雷诺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担任医药补给官，他利用职务之便，从美国运来毒品交给刘自然转售。不料事情败露，美国决定将雷诺调回国内审讯。刘自然得知这一消息后，趁机对雷诺进行敲诈勒索，二人因分赃不均发生矛盾，雷诺于是杀害了刘自然。

事件发生后，多家报纸进行了报道。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四点处理意见：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和新闻局立即通知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社，不准再报道刘自然事件，也不准广播、宣传、刊登与此事有关的文章；二、由“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台“大使馆”，中方不会因刘自然的死，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只要求美方给刘自然

亲属适当的金钱补助；三、将雷诺调离台湾；四、派一政府官员到刘自然家安抚其家属，劝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把事态扩大。

5月22日，美方以“治外法权”的名义，在台湾对雷诺进行审判。法庭上，被告雷诺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答辩词：“5月20日晚上，我去关门，正在浴室淋浴的太太突然大声呼叫起来。我循声望去，发现一只大蜘蛛从浴室内爬出来。我以为是太太怕蜘蛛咬伤了她，便安抚她不要怕，也不要紧张。太太却连连说不是怕蜘蛛，而是窗外有坏人窥她淋浴。我听说此事后，心里十分愤慨，连忙跑进卧室取手枪，想威吓窥浴人，或抓住送到警察所。当初，我并没有把他打死的念头，只是我持枪冲出门后，发现对方手持木棍向我冲来，并高高地扬起木棍要打我，为使自己不受对方攻击，我便扣动扳机打了一枪。对方中弹后，跑了几步才摔倒在竹林边。我见对方倒了下去，急忙跑回屋中叫太太，打电话通知宪兵。当我再次走出室外时，又发现对方侧身弯腰向我屋里走来，我担心他身上有枪，急忙又向对方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对方当即倒地。这时，我才发现死者是刘自然。我认为，刘自然被击毙，主因是他不道德，窥女人淋浴，他的行为被人发现后，又企图用木棍击我，这是他错上加错。我开枪打死他，是被迫的，属于正当防卫，未构成犯罪。原告刘奥特华的指控不符合事实，希望法庭审判此案时，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上述申诉。”

雷诺最终获得了无罪释放，美方人员在法庭内热烈鼓掌。这样的审判结果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5月23日，奥特华前往“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得到大批群众的声援。“美国大使馆”想用金钱解决，遭到了严词拒绝。下午，台北市警察局来了十多名警察，想把示威群众驱散，还要逮捕奥特华，结果被愤怒的群众赶走了。

5月24日，“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的群众增加到两万多人。这时又传来消息，“美国军事顾问团”打算租用一架陆军专用飞机，把雷诺全家送往菲律宾，再转乘民航班机返回美国。正在群众万分激愤之时，50多名学生代表高举“杀人偿命”“打倒美国佬”等标语牌，率先冲进“大使馆”，撕毁美国国旗，砸烂办公室的家具，一些来不及逃走的使馆工作人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晚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情况才得到控制。

应舜仁：从我们的立场来讲，认为打得对，为什么？美国人太看不起人了，你打死人了就应该受到惩罚，凭什么无罪释放？当场的时候，他们美国人还鼓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新闻记者、广播公司什么的，都

口口声声说美国人好像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善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来讲，打就打了，心理上很痛快。

“美国大使馆”被砸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行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台北发生的事情。

应舜仁：武官接到电话，说“美国大使馆”被打了，群众运动起来了。武官一报告老先生，老先生就发脾气了，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台北来。

由于民众抗议的时候去了很多佩戴臂章的“救国团”青年学生，而蒋经国正是“救国团”的领导人，所以当时美国媒体矛头直指蒋经国和台湾当局。1957年5月25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应舜仁在台北士林官邸见到了当时的几位负责治安的高官，却没有见到蒋经国。

应舜仁：见到了“参谋总长”彭孟缉、“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还有一个是“警务处处长”乐干。

曹景行：经国先生来了吗？

应舜仁：经国先生没有来。老先生是住在楼上的，他从楼上气冲冲地下来。当时正好是我当班，所以我都看到了。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使“国家”丢脸，没有面子。老先生的火起来了，他把那个棒头拿起来好像要打人，牙齿也咬起来，很凶的样子。我在外边看到了以后都吓得发抖了。

彭孟缉就讲：“这个事情我早就下令‘宪兵司令’要将民众运动隔离，换句话讲，防患未然为上策，镇压暴动已经是下策了，为什么宪兵、警察不去隔离、分散，使事情不致发生？”

刘炜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参谋总长这样子讲，我还能怎么办？”刘炜是广东人，这个人个性很犟的，他始终坚持说：“我一接到命令，部队、宪兵马上就出来了。”这个迟与早只有彭孟缉跟他自己他们两个知道，谁晓得呢？

此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台湾当局向美方道歉、赔偿，同时蒋介石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警务处处长”乐干的职务。这样风波才慢慢平息。

刘自然事件只是蒋介石在台湾面临的无休止的纷扰中的一个插曲。二战以后，在美、日等国的扶植下，台湾逐渐兴起一股鼓吹“独立”的政治势力，蒋介石一直都对“台独”采取坚决制裁的政策。他曾公开宣称：“谁要搞台独，我要他的脑袋。”在他的强力主导下，台湾岛内曾破获多起“台独事件”，被判刑者也是数以千计。为此，“台独分子”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还曾经筹划刺杀蒋介石，因计划败露才不得不作罢。尽管晚年生活波澜起伏，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被击垮。郝柏村也觉得，晚年的蒋介石虽然性格比较平和，但仍然是军人性格。

曹景行：在您眼中，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郝柏村：我跟他的时候，他岁数已经大了，也不像外面说的年轻时候的那个脾气，基本上是很慈祥的。当然老“总统”他是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像“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打则已，一打，绝对没有中途妥协。

1965年，应舜仁陪同蒋介石乘坐“洛阳”号军舰从马祖返回台湾，又一次见识到了蒋介石的个性。

应舜仁：刮9级风，那是很大了。按照“海军”（规定），9级风应该不动，要动只有逆风才可以走，如果顺风走，船的安全就有顾虑。武官报告老先生，老先生说没有关系，试试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先生个性很犟，是军人的个性，冒险的个性，一旦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意志很坚定。

曹景行：像这样的风，在船上很难受吗？

应舜仁：非常难受。我们当班的在门口站也站不稳，栏杆都拉不牢，只能用绳子捆起来，在门外边的，绳子就捆在外边，结果大家都吐了。

曹景行：老先生晕不晕？

应舜仁：老先生他吃了一点东西就不吃了，也吐。这个船翻得很厉害。曹景行：经国先生晕船吗？

应舜仁：经国先生在里边，都捆在床铺上了。

〇先生流鼻血了，牙齿也流血，夫人脚这边流血了

那么多的大风大浪，蒋介石都幸运地挺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悄悄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69年9月16日下午，和往常一样，蒋介石与宋美龄一起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5点左右，二人兜风归来，座车向阳明山驶去。这时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站牌处等候乘客上车。同时，这天在阳明山有一个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当蒋介石车队的“先导车”——第一辆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距离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两三百米的时候，忽然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从客运班车的左后方超车蹿出，迎面朝“先导车”急驶而来。“先导车”的司机当下立刻踩刹车，与这辆吉普车擦身而过。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但是可能是一时分神，也可能是紧张过度，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座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去。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的后车厢，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早年台湾尚未有坐车须系安全带的规定，况且“总统”座车绝对没有安全顾虑，所以两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上安全带。更糟糕的是，蒋介石的座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蒋介石乘车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又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力度相对加大了。

车祸来得太突然，蒋介石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驾驶座后侧的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他的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而宋美龄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所幸没有骨折。

应舜仁：当时先生流鼻血了，牙齿也流血，夫人则是脚这边流血了。

坐在后面一辆车里的侍卫长孔令晟，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急忙下车查看情况。他紧急将蒋介石夫妇送到“荣民总医院”，随后立即通知蒋经国，并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道路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

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而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因为宋美龄主张宽恕徐达生，她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而侍卫长孔令晟则受到了“停升一年”的处分。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医院急救后，医生在初步诊察时，仅发现蒋介石的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胸部没有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得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儿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后来，心脏专科医生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介石的心脏主动脉瓣膜曾受到重创。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一旦破裂，就像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液升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但是，蒋介石和当时的医生都没有察觉撞击瞬间所带来的这一大后遗症。

车祸发生时，蒋介石已经82岁。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自己也承认：“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副手严家淦[2]说，这场车祸，至少让他自己少活10年。

阳明山车祸两年后，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消息传到台北时，蒋介石刚好在大溪宾馆，正在外面散步。他坐在亭子里面，武官来报告说：“联合国我们退出了。”当时蒋介石头上戴着帽子，应舜仁看到他手在头上一摸，帽子就被摔到地上去了。一个副官就在蒋介石旁边，替他把帽子捡了起来。过了几秒种，这个副官惊慌失措地走到应舜仁身边，对他说：“总统流眼泪，他流眼泪……”

随后，蒋介石以“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口号，强行安定了台湾民心。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心理上还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毕竟当初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今却是这种遭遇。还没有从退出联合国的阴霾中走出，11月份，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又发生了问题。

应舜仁：老先生他经常便秘。以前有医官的嘛，医官就用甘油来治疗——有一种甘油，放进肛门就可以通大便。刚好那天没有医官，就一

个钱如标副官当班。老先生上厕所，他后面跟着就去了。结果老先生便秘，叫他拿甘油射进去。

这个讲起来也不好怪他，为什么？他不是医务人员呀，一个副官嘛，粗手粗脚的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弄。他弄偏了，一挤进去，大便就流了血一样。他有点慌了，老先生就骂他了："混账东西，这个不行了，你再换一个甘油再挤。"他给老先生一骂就紧张了，拼命挤，一挤以后，又出血了。出血以后，老先生下午就发烧了。

当天蒋介石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确定伤口发炎，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卧床一个多月。闯祸的副官也因此被关了起来。

应舜仁：这个钱副官，他当天做了工作以后，下午休假，就到高雄去玩去了，第二天才回来。我在楼上当班，透过窗户，老远就看到他晃晃悠悠地回来了，我说这个阿弟要倒霉了，老先生都骂了，他要倒霉了。但是这个话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又不敢讲。结果老先生就叫侍卫长——那时候是孔令晟侍卫长，把他关起来。孔先生人很不错，很爱护部下，和他的交情也很好，他就顶下来了。

老先生说，把他送到陆军监狱去。孔先生很机警，他说，送到陆军监狱去关，到底这个人什么罪名，要有个证明才行，这恐怕不好办，不如关到我们士林官邸吧。他说士林官邸的军衣警卫队那儿有个禁闭室，可以把他关在那边。好，老先生就同意了，下午就派人，把这个钱副官抓了交给警卫队，关在那边。不料一关4年多。关到什么时候？到老先生过世以后，1975年以后才把他放出来。

闯祸的副官钱如标原本在士林官邸专门负责为蒋介石剃头发、刮胡须，官邸的人都戏称他是"天下第一刀"。被关禁闭之后，蒋介石一方面痛恨钱如标让他受伤，一方面又怕他在剃头发、刮胡须时做出莽撞之事，所以也就免去了他"天下第一刀"的职务。

钱如标当年尽管在士林官邸工作，但还经营了一家传播公司。在电视媒体刚起步、电子媒体仍由台湾当局一手独揽的台湾，钱如标的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收入颇丰。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台北市几乎还没有什么私家车的时候，他已经买了一部进口轿车，作为平日代步之用。在一般的侍从人员还是一袭中山装时，他已经天天西装革履，红光满面，十分招摇地进出士林官邸。而且钱如标本人善于交际，士林官邸的很多

人都跟他交情深厚，侍卫室的长官甚至特许他在夜归时把汽车开进官邸，停在横山指挥部要塞门口。也因此，当他闯祸之后，侍卫长孔令晟肯帮他的忙。

钱如标被关的几年里，虽然名义上是关禁闭，但是因为与官邸工作人员的交情，大家私底下经常为他开后门、行方便，他并没有吃什么苦头。然而这次事故，却让蒋介石原本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病症开始显现出来。

应舜仁：车祸以及肛门出血这两件事情以后，他自己也感觉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就有病症了，心脏总是好好坏坏，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心电图，跳跳跳，一下子又平平平，不跳了，等一下又跳了，就是这样子。到了晚期，更是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哭的声音

从1972年开始，蒋介石有3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原来身体好的时候，蒋介石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心情好，他还会边走边唱早年的军歌，或是到台湾后学会的新歌。即便是生病之后，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在庭院里转一转。应舜仁记得，1975年4月5日这一天，通知蒋介石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响起，侍卫们站到各自的岗位上等待，但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出现。

应舜仁：后来到了晚上，8点钟新闻广播结束，接下来就要播一部华视的电影《保镖》了。大家都在那边，全副武装的，枪都备好了，等着打铃子就出来。后来打铃子了，短时间内铃子连续打起来了，大家就觉得奇怪，怎么是连续铃子？因为我们铃子有记号，几声几声是什么意思，连续铃子就是有紧急情况，大家赶紧出动。既然紧急命令下来了，那么大家就都出来。出来一看，没有人啊，人没有出来啊。我就在大会客室外边的走廊上走动，看到里边灯火通明，亮得很。总觉得很奇怪，怎么还不出来呢？那么就有人说笑，说先生想起来又不想起来，想起来又不想起来，就反反复复。实际在那天晚上，老先生的心脏已经跳动得很低频了。

我在那个屋檐下，只看到里边的副官他们匆匆忙忙地上上下下。孝武、孝勇也是上上下下，很紧张的样子。后来就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的声音，夫人哭的。夫人一哭，我也很惊慌，怎么夫人会哭？接下来就是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我心里明白，老先生一定是不好了。接下来就是一阵大雷雨。那天晚上明明月亮很大的，月光很亮的，怎么就下雨了？雷雨像倾倒一样下个不停，结果我一身衣服一下子就湿了。

后来大客厅的人就多了起来，全厅都是人，来来去去的。我看到王永树“安全局局长”、赖铭汤“参谋总长”，还有严加淦“副总统”，他们都来了，还有一个秦秘书秦孝仪，他在那边跑上跑下。那时候遗嘱已经写好了，他们来签名了。

早在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深感来日无多，由秘书秦孝仪记录，口述遗嘱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3]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当晚，台湾党政军要员齐集士林官邸，举行在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宋美龄签字，然后依次是“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供民众瞻仰遗容。

应舜仁：早就可以送到“荣民总医院”去，可是后来拖到快到1点钟，为什么？纬国先生不在，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到处打电话找，后来找到了，在台中。他为什么去台中呢？那天4月5日清明节，他去给姚夫人（姚冶诚）扫墓，姚夫人的墓在那里。找到以后在电话里又不能讲，因为还没有宣布蒋公过世，就要他回来，他就问回来什么事。就告诉他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这样一句话，他实际上心里就有数了，说我现在没有车，车子借给人家了。他又去借朋友的车子，结果后来到两点多钟，从台中赶回来了。先到官邸，夫人说你到荣总。他赶到荣总，（遗体）已经放到冰库了，他要拉出来看。一看到他就跪下来：“阿爹，我对不起你，我没有送你。”眼泪就流下来了。其实等他等了很久，所以纬国先生后来讲，他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给阿爹送终，纬国先生去世以前就讲这个话。

4月16日，台湾为蒋介石举行大殓典礼。严家淦恭读祭文后，8位国民党元老在灵柩上覆盖国民党党旗，严家淦和“五院院长”覆盖“中华民国国旗”。随后，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举行了追思礼拜和安灵礼。接着灵柩运往慈湖，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满是下跪的民众，穿着孝服，哭得很伤心。“没有组织动员，大家其实都是自动自觉。”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回忆，“对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来说，蒋‘总统’就是心里唯一

的依靠。现在他突然倒下了，人们大吃一惊：没有领袖的日子，要怎么办？”

对于蒋介石的去世，美国总统福特发表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随后，美国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吊唁。日本媒体也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称他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则以自名党总裁的身份发来唁电，并派前首相佐藤荣作来台吊唁。而瑞典的《今日新闻》则发表文章说：“逝去的只是一个老顽固，这老顽固在一段长得荒谬的时间里，曾经赢取过他完全不配得到的同情。”《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则《蒋介石死了》的报道，称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第二章　陈履安：主政台湾的『陈诚伯』

讲述人　陈履安

陈履安，陈诚之子，1937年出生，『国民党四公子』[4]之一。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纽约大学数学系硕士，后获得数学系博士学位。1970年返台，出任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第一任院长，不久便投身政坛。1978年起，陈履安先后担任台湾『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近5年。1996年因与李登辉政见不和，退出国民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总统』。失利后，逐渐淡出政界，从事文教工作，担任化育基金会董事长、陈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2001年恢复党籍。

陈诚（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育副官、炮兵

连长，东征、北伐期间多次立功。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远征军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任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东北行辕主任。1948年年初被免职，到台湾养病。

1949年接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实行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大力发展台湾经济，成效显著。1957年被推选为国民党副总裁，身兼“副总统”、副总裁、“行政院长”三职，成为台湾位居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二号人物”。

1965年3月5日病逝于台北。

曹景行：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叫“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说的是他自己，而辞修，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后来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从一介炮兵连长，逐步升级为高级将领。到了晚年，官拜国民党副总裁、台湾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可谓“权倾一时”。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后，他是少有的能获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而提起父亲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陈履安总是欷歔不已。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代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此时东北战场的情形并不乐观，国民党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国共双方的实力也是此消彼长，差距逐渐加大。

抗日战争胜利伊始，共产党就在苏联的支持下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装备，而陈诚又下令遣散东北地区的伪军，此举给国民党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正如李宗仁所说：“东北伪军40万均由日本装备训练，极有基础。他们久处日军铁蹄之下，含愤莫雪，一旦抗日胜利，无不摩拳擦掌，希为中央政府效命，一雪做伪军之耻。当时政府如善加绥抚，晓以大义，这40万伪军只需一声号令，即可保东北于无虞。无奈陈诚仰承上峰旨意，竟下令遣散。熊式辉若是一个有眼光而勇于负责的干员，未尝不可把这道命令暂时搁置。殊不知熊式辉就是一位只知做官的人物，他

竟把陈诚这道糊涂命令通令全体伪军。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迨中央发现其错误企图加以纠正时，已来不及了。”

凡此种种，早已为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因而对于此次任命、对于蒋介石夺取东北的寄望，陈诚充满了悲观的态度，他在《家书》一书当中坦陈：“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陈诚还是遵从蒋介石的调派，前往东北战场赴任。陈履安说，这是他的父亲陈诚无法推却的一次任命。而这，也是这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毕生最后一次指挥军事作战。

陈履安：大家都劝我父亲不要去，讲那个局面不可能挽回了，而且我父亲已经十二指肠溃疡，经常躺到床上。老蒋一定要我父亲去。我父亲觉得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鞠躬尽瘁嘛，他就去了。

陈诚上任后，立刻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整改，力图整肃军纪。他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部，由行辕全权负责东北的军事与政治，原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调职北平，副司令郑洞国改任没有实权的行辕副主任，辽宁省主席徐箴、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刘玉章则被撤职。

通过这一番调整，陈诚将东北地区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然而，东北官员多是熊式辉提拔的，军中将领也主要是杜聿明的老部下，陈诚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不久，第七兵团中将司令陈明仁[5]又因纵兵抢粮被陈诚论罪撤职，闲居南京。在此前的四平之战中，陈明仁因为击退林彪，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他被撤职，让很多东北国民党军将士不服，当时就有人说：“陈明仁胸前挂勋章，手中拿撤职令，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杜聿明回忆，熊式辉后来也认为：“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由于将士们的抵触，陈诚在东北的工作，其实并不好开展。

雪上加霜的是，1947年年底，陈诚的胃病再次复发。此时他正忙着组织机动兵团和东北解放军主力作战，只能带病坚持工作，因此病情日渐严重，胃部时常出血，蒋介石为此还专门派权威医生到沈阳为他治病。

陈履安：去了才一两个月，胃病就发了，经常躺到床上，就这么一

个情况。

尽管陈诚耗尽心血，可国民党军队还是在东北连吃败仗，丢盔弃甲，元气大伤。在1948年1月的公主屯战役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更是遭到了被全歼的下场。当时陈诚还对众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

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震撼了南京国民政府，愤怒不已的蒋介石亲自召开会议，追究战败责任。陈履安说，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是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国人”。但蒋介石多次强调“东北失利，与辞修无关，责任在我”，这场风波才慢慢平息，不过陈诚也无法再指挥军队，只好遵从命令，将指挥权完全移交给卫立煌。被迫离开东北之时，他已经是贫病交加。

陈履安：离开东北时，我父亲一切职务都被免除了。当时他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没钱。他是没有积蓄的一个人。

陈诚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亟待治疗，但手头又没有任何积蓄。最后他来到了上海，住进了上海江湾医院。

陈履安：他在上海江湾住院。开刀之前，蒋老“总统”去看他。有一次，两个人坐下来谈了三小时，谈了很多事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父亲把很多话都实话实说。他有时候有些遗憾，说这个“总统”啊，听不进去，很多失败的因素早就埋在那里了。

〇蒋“总统”再来电：做台湾省主席，这是命令，你非接不可

1948年春的那次谈话，是陈诚与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交谈。从黄埔军校的师生生涯算起，此时的陈诚已经追随蒋介石20多年了。对于陈诚日后的工作，蒋介石为他作出了新的安排。

陈履安：我父亲在江湾动了手术之后，他就考虑到哪儿去，他想回（老家）青田去，但是医疗设备比较落后，不方便；到上海又住不起。后来“总统”给了我父亲一点钱，叫他到台湾来养病，他就到台湾了，他那时候没有任何职务。

1948年10月，陈诚到达台湾。一个月后，还在南京金陵中学就读的陈履安跟着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来到了台湾，与父亲相聚。

陈履安：11月接到通知，说到台北来看父亲。我们6个孩子就飞着来了，从南京飞到台北。那时候坐的是军用飞机，像伞兵部队坐的那个飞机一样，两边是铁的座位，飞不很高，里面温度调节也不好，很热。

抵达台湾后，陈履安第一感觉还是热。相比南京来说，11月的台北依然跟夏天一样。

陈履安：我们在南京都穿的是大衣。到了台北，气候不一样。见到父亲后，父亲很高兴。他住在阳明山，那时候叫草山，我们到了这里，就没有再回大陆。

一家人重聚之后，陈家从阳明山迁到了台北市延平南路的一栋二层楼房里。养病之余，已经卸去全部职务的陈诚常跟当地的政要、学者见面聊天，排遣寂寞。陈诚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揶揄说：“我自认谈天的本领可打80分，可是辞修先生谈天的本领比我还强。”

不过，那时陈履安并不知道，父亲陈诚在台湾养病的时光即将结束。很快，他要面对一项新的使命了。

陈履安：其实我父亲不是个很严肃的人。听张治中他们讲，他年轻

的时候是很幽默、风趣的一个人。但他是个军人，这个职务让他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样子，所以大家很怕他。他那时候没有任何职务，反而跟台湾地方上的人谈啊，了解了很多事情。

陈诚在台湾休养期间，大陆的国民党军队也在节节败退。1948年年底，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面失守。蒋介石也面临着交出领导权的压力。1948年12月29日，在台湾养病的陈诚，接到了蒋介石的一个命令。

陈履安：一到台湾，大陆就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特别快。1948年年底就得到消息，要我父亲做台湾省主席。我父亲接任主席之前，他先把当时的主席魏道明请来再谈一次。要他接任台湾省主席这个消息就是魏道明告诉他的。

我父亲在跟魏道明谈过之后就回电，讲魏道明绝对可以胜任，应该让他继续做，我来辅导他，帮他的忙。结果（蒋介石）再来电：“这是命令，你非接不可。”魏道明也拿电报给我父亲看，“一定要你接”。这样，我父亲在1949年1月4日才接了台湾省主席的职务。

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任命的几天后，蒋介石发布“求和”文告，宣布下野。陈履安说，根据父亲陈诚的回忆，蒋介石早已注意到了与大陆相隔几百里的海峡彼岸的台湾，并且准备把那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

曹景行：蒋介石那个时候坚持要您的父亲做台湾省主席，这个决策是不是让您父亲先把台湾这里准备好？

陈履安：做个退路。

曹景行：是不是这样？

陈履安：我相信是这样。

〇这样喊来喊去，把两个师喊过来了

东北之战，陈诚几乎身败名裂。不过，蒋介石在最关键的时刻，依旧把开辟退路的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陈诚。陈履安说，他的父亲陈诚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为什么蒋介石会对陈诚有着如此高的信任？这还要从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渊源说起。

1919年，陈诚经人推荐参加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考试。因为成绩差，身材矮小，没有被录取，只被列为备取生。巧的是，考第一名的刘亦琨，临时改变主意，投考北京大学。于是陈诚侥幸以备取第一名的身份补录入保定军校炮科，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23年，陈诚前往广东参加革命，担任上尉连长，负责守卫孙中山的大元帅府。5月，他随孙中山出征讨伐西江沈鸿英叛军，不幸胸部负伤，被送往肇庆医院治疗。时值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医院来慰问伤员，这是二人之间匆匆的第一次接触。

1924年，陈诚被黄埔军校任命为教育副官。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因为外出访友，陈诚到深夜才回来。回来之后，因为一时睡不着，眼看天又快亮了，陈诚索性带上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到操场上，准备先练习一会儿单杠后，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恰好，习惯清晨早起散步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来到了操场。看到陈诚和那本《三民主义》后，蒋介石随手拿起来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写满了读书心得，这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让蒋介石十分欣赏。

他详细询问了陈诚的个人情况，并勉励他好好努力。这次奇妙的操场偶遇，使得陈诚在蒋介石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后，陈诚立即被任命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

陈履安：他那时候年纪很轻，23岁，就做了少尉连长。到33岁，10年之间，已经做到了上将。

1924年冬天，趁着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开广州北上之际，广东的陈炯明自任“救粤军总司令”，下令进攻广州。1925年1月，广州革命政府下令东征，讨伐陈炯明。

3月12日，陈炯明所部林虎率两万余兵力，与陈诚所在的只有一千多人的东征军教导第一团在棉湖展开激战。此役一旦失败，对整个东征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蒋介石也说："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首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正当敌军步步逼近之时，右臂受伤的陈诚冲上炮台，亲自拉火开炮。炮弹直接命中敌指挥部所，让全连士兵士气大振。后来人们说，棉湖之役最终能够获胜，陈诚的炮兵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棉湖之役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小很小规模的战斗，但在当时，却是吃力的一仗，那时的炮兵不像现在，有马匹或车辆拉拽，那时的炮，要由人扛抬。在那种情况下，身为炮兵连连长的辞公，不论步兵行军多么快，他总使他的炮兵跟得上，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炮弹有限，但他弹无虚发，对促使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最有功的人士之一。"

——何应钦

陈诚以此军功，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人称"三炮起家"[6]。对此，也有人评论说："大炮一响，前途无量。"

1925年9月，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趁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发动叛乱。广州革命政府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双方以惠州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激战。惠州有天险之称，前临西湖，后枕东江，三面环水，"有宋以来，从未攻下"，《惠州县志》称惠州"铁练锁狐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在由蒋介石督战的惠州战役中，陈诚亲自率领炮兵部队，打开城墙缺口，使攻城部队顺利攻克惠州。

陈履安：100年以来，惠州城没有被打下来过，结果惠州之役，我父亲三发炮弹就打破了惠州城墙，革命军就进去了。所以作为战役来讲，那一战，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惠州之役后，陈诚进一步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将他提升为少校炮兵营长，连升三级，奖励500银圆。1926年，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一年后，陈诚因功升任为少将副师长。

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前，蒋介石特意召见陈诚，询问他的意见。陈诚表示坚决拥护蒋的决策。此举令蒋介石更加相信，陈诚值得好

好培养。而陈诚也确实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蒋介石这边，为巩固蒋介石的实力而冲锋陷阵。

1929年，因为编遣问题，蒋介石先后与桂系李宗仁、西北的冯玉祥展开激战。蒋桂、蒋冯战争结束后，蒋系部队元气大伤。12月，唐生智又在郑州通电反蒋。蒋唐战争爆发了。蒋介石毫无准备，急调陈诚等人迎击唐生智。两军在河南确山遭遇，就地展开厮杀。适时正值隆冬，积雪深厚，双方部队作战都很艰辛。

陈履安：跟唐生智打仗的时候，也有很有趣味的故事。唐生智有五个师，其中有三个师是广东师——广东部队。我父亲同广东人的关系特别好。像张发奎、薛岳这些人，跟老蒋“总统”搞不来，他们就跟着我父亲。所以我父亲跟广东人交了朋友。

他一听（唐生智）有三个广东师，就派人到前线对这些军人喊话，讲你们为什么走反革命的路啊？不做革命军人了？对方就喊过来说，我们也不要做反革命啊，我们也想革命，我们是不得已。这边就喊，说我们可以商量商量。他们说，好啊。就这样喊来喊去，把两个师喊过来了。还剩了一个广东师，唐生智就派他的一个师去监督剩下来的那个广东师，它的战力就完全没有了。结果那一仗没有打，唐生智就退了。

在各路蒋军的进攻下，唐生智宣布下野，陈诚收编了唐部三个团。没多久，蒋冯阎战争爆发。陈诚又成功招降了冯玉祥的部下刘茂恩，使蒋军未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河南的宁陵和睢县，并得到了九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的兵力及装备。就连冯玉祥的得力干将，抗日名将孙连仲也是通过陈诚，归降南京政府的。

对于陈诚的突出表现，蒋介石十分满意。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兼任十一师师长。从此，陈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人称“土木系”。“土”字由“十”与“一”组成，“木”字由“十”与“八”组成，意思是陈诚是靠十一师和十八军起家的。

○“不贪污，不怕死。”你做得到就来，做不到你别来

蒋介石用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介石自己就是靠黄埔系起家的；第二是重用浙江的同乡；第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

在大陆时期，飞黄腾达的国民党人，不是蒋介石的门生，就是他的同乡，至少是对他绝对忠诚的人。唯有陈诚三者兼备。尤其是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在国民党中可谓无人不知。西安事变的时候，陈诚和蒋介石一同被扣，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张学良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讲，只有一句话，赶快送委员长回南京。”“如果委员长遇害，你就早一点把我枪毙。”这段“共患难”的经历，让蒋介石更加确信陈诚对自己的忠心。

作为一名军事将领，陈诚的用人之道也深得蒋介石的首肯。他的用人原则是：只要是人才，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就会接纳任用。对方哪怕曾经是敌人或是和他在仕途上有竞争，他都照用不误，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有黄埔新生来投他，只要挺胸收腹，姿态昂然，并且表态说愿意跟老师革命，陈诚也一定收留。

陈履安：当时大陆上（国民党军队）有什么习惯呢？就是一个部队真的会带枪投靠的。一个军有三个师，一个师有三个团，一个团有三个连。可能整个一个连带了枪、带了部队来投奔我父亲。他为什么跑过来？因为那边单位不发军饷。

对于吹牛拍马、贪污腐败的人，陈诚则十分痛恨。他主张清廉，本人也以身作则，生活十分简朴，从来不讲排场，每天的饮食简单到被人戏称为“和尚”的地步。甚至他在做中下层军官的时候，就常常戴斗笠、穿草鞋和士兵一同行军。因此，他的土木系也是国民党最廉洁的部队之一。向来与陈诚不和睦的何应钦也说：“辞修是个奉公守法而又廉洁的人。当时一般军队受旧军阀影响，风气并不好。假报销很多，但辞修的十八军，每次都按期据实报销。”

陈履安：我父亲时常讲，军人不怕死，文人不要钱，这个政府就有

救，国家有救，民族有救。他甚至有个要求，对投奔他的这些军官，对他自己的部队，他都交代得很清楚。六个字：“不贪污，不怕死。”你做得到就来，做不到你别来。他一直觉得这个很简单，大家都能懂的。

曹景行：那这么多部队投靠他的话，他发饷怎么发呢？

陈履安：那个时代，你真正将多人多，你能够打仗，老蒋“总统”——那时候叫委员长，他有特别费用给你的。这也是说，我父亲跟老蒋“总统”的关系不寻常，老蒋“总统”非常倚重他。

除了上述种种原因，陈诚和蒋介石还有着另外一层的特殊关系。1931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

谭祥，小字曼怡，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女。1922年，陈炯明叛变之时，谭延闿变卖家产将孙中山迎往上海，随后又召集人马讨伐陈炯明。谭延闿的全力扶持令落难的孙中山十分感激，不仅请宋老夫人倪桂珍认谭延闿为义子，还有意将已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宋美龄介绍给他。但谭延闿以答应亡妻不再娶为由，拒绝了这门亲事。

孙中山去世之后，谭延闿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就是谭延闿做的介绍人。二人私交甚笃，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蒋介石夫妇也颇为喜爱谭祥。

1930年，谭延闿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嘱托蒋介石夫妇在青年军官中为谭祥择夫。当时的青年将领中，以陈诚和胡宗南最为出色。蒋介石夫妇最终选定了陈诚。陈诚在家乡已有妻子，但一直感情不和，遂办理离婚手续，迎娶谭祥。

陈履安：我父亲跟母亲的婚姻，是蒋老先生跟蒋夫人他们做的媒。介绍人是他们两个——虽然证书上不这么写，但事实上是他们两个人介绍的。我外祖父跟蒋“总统”非常要好，曾经有人做媒要把蒋夫人配给我外祖父，我外祖父表示他不续弦，所以有这样一个交情。我外祖父去世的时候，就有把我母亲托给蒋夫人这样一个感觉，所以蒋夫人对我母亲也一直照顾。

陈谭结合，使陈诚与蒋介石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的关系。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陈履安说，每次，父

亲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但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这一点也深得蒋介石的赏识，遂逐渐将陈诚视为心腹。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训练团，召集国民党内高级军官集训。他亲自担任训练团团长，陈诚被任命为副主任。蒋介石显露了自己有意培养陈诚的意向。此后，陈诚开始在各种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先后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湖北省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许多时候甚至是身兼数职。

陈履安：他那时候不知道身兼多少职务，又做湖北省主席，又做第九战区司令，又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身兼六七个职务。那时候，我父亲去跟“总统”报告很多次，说你让我就做一件事吧，我这个到处兼着，很难做事，而且人家也会批评，你怎么一件都做不好。

陈诚虽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在国民党内却十分孤立。除了与何应钦不和，他也因为自认是蒋介石嫡系，自视甚高，看不起非中央系的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韩复榘等地方派系，把他们称为“封建势力”，这些“封建势力”也对他很不满，私下称他“陈小鬼”。对把持国民党组织系统和党务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陈诚也屡次加以批评。并且他跟胡宗南、汤恩伯也存在矛盾。因此，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陈诚树敌甚多。几次军事战斗失利后，就有人向蒋介石提出：“辞修骄横，目中无人，惨遭失败，其责非浅。”

陈履安：我父亲一直是被批评的对象，因为在那个大时代，能被重用，所以也遭人家嫉恨。

1940年，因为宜昌失守，陈诚被解除一切兼职。9月，他抵达恩施，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以湖北省主席的身份亲自主持省政。亲自主政后，陈诚在湖北积极开展战时建设。为了保护佃农利益，他主导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提出“二五减租”，即佃农向地主交租的时候，“由总收获量先提二成五归佃，所余七成五由主、佃对分”。此举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同时，陈诚还采取了全面禁止鸦片、改革兵役、计口授盐等措施，改善民众生活。此外，他又创办联合中学，亲自

担任校长，实行计划教育。所谓计划教育，就是“由政府有计划地负起培育和发挥国民才能的一种教育”。对学生给予公费待遇，统筹升学就业，使得将近两万流离失所的战区青年又恢复了求学的机会。

陈履安：对他来讲，在抗战八年中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做湖北省主席时，真正地展现了照顾老百姓的这一面。第一个是教育，他怎么照顾教育？流亡学生到湖北来，我全部收容，住校一律免费。后来，毕业的那一批学生到台湾后，就变成台湾发展的一个主力。第二个，照顾农民。抗战时候物质非常缺乏，那时候我父亲就开始照顾农民，“耕者有其田”，叫二五减租。

从1940年9月开始，到1943年年初因为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离开。陈诚在湖北主持省政的时间，一共是两年零五个月。时间虽然不长，却让湖北在战乱当中获得了稳定的发展。不过，陈诚那时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在湖北的建设经验会运用到台湾。

〇我们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毕竟你把人家家里的钱全搬过来了

早在1946年，蒋介石巡视台湾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那时候他也没想到，自己要到台湾度过一生最后的岁月。

但那时候的蒋介石，就意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后来在一篇报告中，他说：“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1949年1月11日，陈诚出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刚刚一周，蒋介石就致电陈诚，告知治台方略：今后治台方针，一要多方引用台籍资深人士参加政府；二要培植台湾有为青年；三要收抚人心，安定地方；四要处事稳重，不可操之过急，不可多订计划，要脚踏实地，多做事情，少发议论；五要特别注意各种制度的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要勤求己过，用人自辅。

在这封电报中，蒋介石言辞之恳切，安排之具体，一反往日作风。这让陈诚明白了蒋介石对台湾的看重，更感到重任在肩。后来，陈诚在案头的一张便条纸上，写下这么一段话：“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可再有如在大陆上尚可撤退之念。”陈履安回忆说，那个时候，他的父亲首先要解决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问题，而后要奠定“反攻复国”的基础，遵照蒋介石的建议，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

陈履安：他一接“省主席”，很多事情都开始推动起来。那一年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整个基础都打下来了。我父亲把他在湖北抗战时期做省主席的经验，很快地都拿到台湾来实践。“中央政府”又不在，那么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速度特别快。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的人口，到了1949年年初，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陈诚，此时面临着蜂拥而来的迁徙人潮。

1949年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此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不仅台湾民众表示反感，部分“立法委员”也认为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国

民迁徙自由的规定。他们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终止。在陈诚的大力劝阻下，这项议案最终因为提案人数不足没有通过。

陈履安：出入境的管制，这在当时是不可以的。都是“中华民国”的，怎么可以说广东就不能到台湾去呢？可那时候要是不管制，台湾就垮掉了。那时候粮食也不够，什么条件都没有，难民如果全来的话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专门研究法律的人讲，你不能这样做，但是紧急状态下就做了。这样台湾就安定了，否则吃都吃光了。

陈诚宣布入台管制，虽然成效显著，但也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陈履安说，父亲陈诚在晚年回顾起当年初到台湾的往事，总会提起他实行入台管制时的一幕情景：1949年，在台湾基隆港边，很多人的船抵达了港口，但是不能上岸，只能原船回头。这幕情景，在陈诚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到1949年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也已经开始。那个时候，进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系统。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进入台湾的部队，一律先解除武装、取消番号，到台湾后再重新整编。

陈履安：当时各个部队坐了不同的船到台湾，一下码头，不管你是哪一个部队，哪怕是打过胜仗，有辉煌战功的这种部队。一下船，枪支丢在一边，人走另外一边。这个事情也得罪了很多人。

曹景行：这个事情谁决定这么做的？

陈履安：我父亲决定的，当然也得到老“总统”同意了，但是责任我父亲背。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乱成一团嘛，大家带枪进了台湾，安全就没保障了。所以这是使台湾安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陈诚很清楚，自己的这种做法，是一件犯众怒的事情。但是，这一举措最明显的效果，就是避免了国民党将领拥兵自重，避免了山头林立、派系林立的情况在台湾出现。据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党抵达台湾的军队超过60万人。经过重新整编后，取消了20多个军的番号和10多个总司令的职务。

陈履安：“中央政府”一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批人全换掉，解甲归田了。

在整编军队的同时，陈诚也下大力气整饬军纪，严惩违纪士兵。军队刚撤退到台湾时，由于受溃败影响，军心不振，大批军人横行不法，整天开着军车在街头横冲直撞，几乎每天都有撞死老百姓的事情发生。陈诚下令，凡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士兵，开车撞死百姓，一律就地正法。禁令下达后不久，一名士兵开着吉普车在台北南昌街撞死了人。陈诚得知情况后，当即将这名士兵押赴肇事地点枪决。经过这一番铁腕整顿，军队违纪事件大大减少。

不过，大批军队和国民党机关迁台，由于一切费用都由台湾省政府垫付，台湾银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弥补亏空。此举使得本就因为与大陆金圆券挂钩而贬值的台币进一步贬值，一时间，台湾金融界陷入一片恐慌。为了避免经济方面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蒋介石命令陈诚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台湾受到大陆经济崩溃的影响，陈诚决定割断台湾与大陆在货币上的联系，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

陈履安：哎哟，这个是很难的，就是发行新台币来代替大陆的法币。当时发台币的时候——那时还叫金圆券，宋子文他们就有意见，说你不能这样，应该把福建、广东包含在一起。我父亲说不行，那又套在一堆了，我们都看见通货膨胀的可怕了。结果两个月，货币稳定了。

曹景行：他靠什么稳定？

陈履安：靠黄金。

根据资料记载，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之后，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是黄金部分，就有390万盎司被运送到台湾，共计美元5亿元。蒋经国后来说：“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人心，曾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无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货币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之局面。”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为了推行币值改革，陈诚向国民党中央申请到了80万两黄金的借贷作为改革基金。由于准备金充足，台湾的财政金融危机很快迎刃而解，经济秩序恢复正常。

陈履安：当年把黄金运到台湾，确实救了台湾。当时我父亲就告诉台湾所有的银楼：你告诉所有人，如果你要拿货币去换黄金，银楼可以换。银楼到我“中央”来换，给大家方便。这个消息一出去，大家就有信心了——银楼在地方上多半都有人脉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时常提醒台湾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把黄金搬到台湾来。我们饮水思源，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毕竟你把人家家里的钱全搬过来了嘛。

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仿照之前湖北的“二五减租”，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即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交佃租不得超过佃农生产所获的375‰。而在此之前，台湾最高的佃租高达700‰，少的也有600‰以上。陈履安回忆说，陈诚当时颁布的这项政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陈诚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失败，就是失去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而失去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土地政策的失败。为了避免在台湾出现类似的情况，就必须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保证农民的生活。

“卅八年予奉命主持台湾省政，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

——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

经过调查，在台湾当时700多万的人口中，380万是农民，而其中超过75%都是佃农。因此，陈诚此举虽然遭到地主的反对，却广受台湾农民的拥护。

陈履安：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那时候先作了一个调查，哪些是自己有地的，哪些是农民，哪些是佃农，是替人家耕地的。

那时候就派人出去调查。到现在还有这种人，很老了还写回忆录。讲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动机，能够让他们在大热天，没日没夜地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很快，一个多月，资料全有了，掌控资料之后，就开始分配

地。

为了顺利推行“三七五减租”，陈诚专门召集地主开会，给他们做工作。此外，还把几家国营公司转为民营，以发行公司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代价，鼓励地主投资工业。

陈履安：当然对地主来讲，是很不高兴的事情了，因为中国人是特别爱护土地的。突然之间要分配给别人，他当然不喜欢。但是把“政府”的四个公司[7]，日本留下来四个公司的股票分给地主，也算有条件的交换。当时人家不懂什么是股票，根本不在乎。后来很多人拿了股票，就变成大企业家了。这个事情很成功，就那一年，粮食马上增加50%。

种种举措，使得陈诚在台湾赢得了一定的民心，人们普遍对陈诚个人抱有好感，即使在陈诚去世之后，也常有农民到陈诚的墓前拜祭，把陈诚称做“陈诚伯”。

〇那些老师，在课堂里面教着教着就哭起来了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永远告别中国大陆，飞往台湾。由此开始了蒋家王朝偏安于台湾的岁月。这时，陈诚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初步的改革，稳住了局面，为国民党政权自大陆撤退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

尽管对台湾的初期建设立下了大功，但陈诚还是很快就失去了台湾政府省主席的身份。1949年12月15日，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任命“民主先生”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省政府主席。陈履安说，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让国民党找到了生存的契机。

陈履安：1949年年底，从情报治安保卫单位来了个消息，就是美国放消息出来，如果能够让吴国桢做台湾省政府主席，美援就可以到。吴国桢是亲美派嘛，这个人跟美国人很好。我父亲跟老“总统”他们商量，我父亲就讲，让给他做。有美援，这太重要了。蒋“总统”怎么说呢，这样子好了，你不要辞掉，暂时不做，让他代理。我父亲说，那不行，那美国人就唬不到，你们搞假的嘛。

他坚决辞掉，就不做了，又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吴国桢就来做这个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做了以后，马上去求证（美援），美国人否认，没这个事。后来韩战爆发了，美援才开始来。每年都有1亿美元，给我们很多机器、设备，从美国买。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正式恢复“总统”的职务，至此，国民党混乱一年多的局面总算稍稍安顿。不久，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接替阎锡山成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那一年，陈履安13岁，已经开始在台北上中学了。对当时的台湾，他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

陈履安：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基本上是没有汽车的，连三轮车都不多，因为三轮车算是高度机械化的一个设备，那时候人力车比较多。省政府主席有汽车，汽车的品牌叫派克，跟那个钢笔的品牌一样，有八个汽缸，总是坏，坏了没零件，也不怎么好开。所以那时候还是坐军车、坐吉普比较多。那时候台湾的公共汽车也不多，居然是用电池的，都是很奇特的事情。居民那时候都是农民，全台湾也不过700万人。

陈履安说，那时的台湾，有近200万人来自大陆的大江南北。他们当中，有军人、学生、国民党官员和眷属，这些人漂洋过海，跑到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安身立命。

陈履安：来了很多军人、政府的官员、公务员。医界的人就是协和医院，我父亲派了两条船，把医生跟设备接过来，建立了台湾的一个医疗基础。商人来得很少，工业家来了那么几位，不多。教授来了一群，这些教授有的还把传承带来了，这个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在中学读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珍惜那个阶段。我在初中的地理老师，居然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我在中学读历史，历史老师是熊公哲 [8] 教授，那时候大学不够，位置不够，他们都到中学来教书。所以我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不照课本教，上来就跟我们说王安石变法。还有北大的一些高才生，也教我们课程，在课堂里面教着教着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忧国忧民，国家怎么办？民族怎么办？我回去也会讲给父亲听，因为我父亲就忧国忧民，他在台湾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人民至上，民生第一。

秉持着“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观念，陈诚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地主的田地以合理补偿的方式，分配到农民的手中。

陈履安：“中央政府”来了，意见就多了嘛。当时有些人认为应该用一个兵农政策，几十万阿兵哥到了台湾，如果把田分给他，他就可以安居下来。打仗的时候就用他打仗，平常就耕田。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争执。老先生（蒋介石）对兵农政策也不反对的，因为他觉得让这些兵有个出路嘛。我父亲讲，那就不叫耕者有其田，他不会耕田嘛，你这样子搞，粮食生产也是问题，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你对台湾老百姓怎么交代？

我父亲非常坚持的，就是一定要让农民有田。兵归兵，农归农，我们来照顾老兵，所以就坚持“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把田分给这些实际耕田的农民。这造成了全世界后来都在学习的土地改革的一种方式，我父亲这个土地改革的书，也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到了世界各国。但是能不能学到？学不到。我们也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之下进行的，台湾刚刚光复不太久，手上有筹码，才能够完成这个“耕者有其田”政策。

陈履安说，就是在那时，陈诚在台湾的施政开始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认同，陈诚也因此结交了一批学界名人。

陈履安：我父亲对学术界的人很尊重，他交朋友也是这样，所以俞大维跟我父亲是非常有交情的。他是弹道学专家，在那个时代是很难的。他跟我父亲建议，要多派一些人到“国”外去留学，我父亲同意了。那时候就推荐了吴大猷、杨振宁他们这一批人出“国”，是我父亲拨款给他们出“国”的。

除去建设台湾取得的各项成就，陈诚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早推动了台湾进行基层选举。

陈履安：他在年底开始推动的一个事情，叫“地方自治”，部署选举。先从这个县市地方单位选县议员，再选省议员，这样一步步选上来。很多人反对，觉得现在你搞什么选举啊？他说一定要还政于民。

至于说民主改革这些，他听谁的？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做湖北省主席，他就听很多政治界的人，读书人的话，对英国制度有一个相当的研究。他在江湾养病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些书。所以一到台湾，他就推行这些，继续推行在湖北没有完成的事情。

那个时候没有人肯出来选，怎么办呢？我父亲讲，两个条件就可以，第一个在地方上要有声望，第二个是要孝顺。所以到地方上打听，有声望，又孝顺，就要他出来。这人不肯出来抛头露面——读书人不干这种事啊，我父亲亲自去拜访，笑笑地跟他讲，哎，拜托你出来，你不出来我就派人抓你好不好，这样跟人家商量。后来这个人说不敢当，不敢当，勉为其难才出来。

〇孙立人马上把衣服拉开来，身上全都是伤疤

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后来的际遇各有不同。比如何应钦，在台湾只有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的闲差；又比如汤恩伯，被蒋介石派到日本当军事代表，1959年客死东京；再比如常与蒋介石唱反调的桂系大将，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在1966年郁郁而终。和他们相比，陈诚的命运格外与众不同。

从来到台湾开始，蒋氏政权便形成了“蒋陈体制”，陈诚以蒋介石的左右手的身份，出现在台湾的政坛上。经过蒋介石一手提拔，陈诚成为国民党副总裁，两度出任“行政院长”，三度当选“国民政府副总统”，到了晚年，他甚至兼任副总裁、“副总统”和“行政院长”于一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人戏称陈诚为“小委员长”，甚至把他看做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之一。那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曹景行：您跟您父亲的朋友，或者是跟蒋先生接触多不多？

陈履安：跟蒋先生接触多，朋友接触不多。跟蒋先生接触是过年过节，他都会邀请我们一家人到他家里去，尤其过圣诞节，就去了。我的小弟弟也陪蒋老先生下下棋，他不要我们和他下，他下不过，他找这个最小的弟弟下。蒋老先生、蒋夫人对我们都很好，我们看到他们都觉得是很慈祥的长者的感觉，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不过，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并不是如外界猜测的那般亲密，他们之间依然有矛盾存在，甚至有时候冲突非常厉害。陈履安说，他从未听父亲陈诚提起过他个人对于蒋介石的评价，直到父亲去世之后，他才从父亲的一些老同事那里，得知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陈履安：他跟老“总统”有没有什么过节？应该还是有一点的。他最早一次很不舒服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个是很早了，一九三几年了。为了一个什么人呢？为了邓演达。他跟邓演达很好，邓演达后来搞第三势力，他是个社会改革者，老“总统”把他抓起来枪毙，我父亲保他，可还是枪毙了。我父亲非常不愉快，那时候我父亲对老“总统”枪毙这种人很不满意。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1927年因国共关系破裂逃亡欧洲。1930年回国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9]，从事反蒋活动。1931年8月被逮捕，11月被秘密处死。

陈诚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邓演达是他的区队长，因此二人有师生之谊。陈诚毕业后，就到粤军当中投奔邓演达。讨伐沈鸿英的时候，陈诚胸部中弹，是邓演达率部将他从战场上抢救下来，后来陈诚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也是因为邓演达的推荐。因此，二人有着十分深厚的情谊。

得知邓演达被捕，陈诚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他“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介石也表示会宽大处理，这让陈诚“深信总座之伟大，绝不我欺”。邓演达被处死后，陈诚正在江西主持军事，得知这一消息，他向蒋介石表示：“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希望能够“即日离职赴京请罪。”被蒋介石训斥“因私害公，因友忘党，有负职责”。

此后，陈诚不再提及此事，但对邓演达却始终有着高度评价。陈诚对蒋介石的忠诚虽然没有受到影响，但在他内心，却留下了一道阴影。不想，来到台湾以后，这样的憾事再度上演。

陈履安：（蒋先生）到台湾，我父亲就做“行政院长”。“党政军情”，他除了“政”，做了“行政院长”之外，“党”“情报治安保卫”单位他不管的。但是很多事情，作好决定了，就要他出面来处理。让他来背黑锅，孙立人案子也是这样。

陈诚曾亲领印缅远征军，孙立人是他的旧部下。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在入缅作战期间，以不足1000的兵力，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取得仁安羌大捷，解除了7000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美国罗斯福总统授予他“丰功”勋章，英国王室也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因此，孙立人与英美一向关系十分良好，更是国民党内坚定的亲美派。

1949年年初，孙立人被派往台湾任防卫司令。到国民党兵败来台后，他的部队是保存最完好的，随后他便升任“陆军总司令”。早在国民党迁台之前，美国就有推翻蒋介石的想法。在台湾，美国认为孙立人是接替蒋介石最为合适的人选。他们多次派员拜访孙立人，但都没有说服他。

不过，蒋介石还是对孙立人心存疑虑。1954年，孙立人被解除“陆军总司令”一职，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失去兵权。第二年，孙立人的部下郭廷亮被捕，很快传出孙立人获美国支持，欲发动兵谏的消息。他的部分旧部下被判为“匪谍”，一时间牵连300余人，史称“孙立人案”。

陈履安：孙立人他是不服人的，他对我父亲还算不错。他对黄埔系统的，不太看得上，那有什么，一两年就毕业了，他觉得很土。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出来的，很彪悍、很帅的这种人，带兵也很严。结果他被告造反。

“孙立人案”发生后，蒋介石下令由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吴忠信九人组成调查委员会，陈诚任主任，负责调查此案。

陈履安：我父亲把孙立人找到我家来，他们两人就谈。孙立人说绝对没有这个事情。他讲我们军人出生入死，一个忠字是最重要的，马上把衣服拉开来，全都是伤痕。我父亲也是，被子弹打的、刀砍的都有。我怎么会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往往这个争斗，不是本人，是他的部下，我们看过很多这个事情。所以我父亲就力保他。

根据陈履安的回忆，1954年9月，陈诚领衔的“九人调查小组”提出一份报告，指称孙立人对部下“确有疏忽”，但其本人“忠诚无虞”。然而陈诚的这份报告并未改变孙立人的命运。蒋介石对孙立人实行“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立场，使得此后的岁月里，孙立人在台中被软禁了33年。

陈履安：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我父亲看这么厚的案子，交给谁去看呢？当时的上校刘和谦。我父亲交代他看这个案子，他不肯看，他说我一个上校，我的军阶在这里，怎能去看一个上将的事情？我父亲说，就是要你看，因为你一张白纸，没有关系，让你看，你看了向我报告。刘和谦就看了，告诉我父亲，孙立人没有事。他讲了这个话之后，我父亲就力保孙立人。

○老“总统”一句话不讲

孙立人案仅仅是一个序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因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陈履安说，父亲陈诚早已知道，蒋介石虽然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也早有意将继承人的重责交给蒋经国。

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他就作了深思熟虑的安排。一方面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又让蒋经国担任国民党台湾党部的书记。通过中央银行向台湾运送黄金等重要物资的事宜，也交由蒋经国负责。1949年12月，蒋介石败走台湾，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蒋经国陪在蒋介石的身边。

陈诚曾经回忆说，对于蒋介石而言，身处台湾，他只有两件最重要的心事，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

陈履安：我想老“总统”早就要把权力交给经国先生。1935年，经国先生从俄国回到江西，就开始培养他。那个时代，老“总统”身边有个侍从室，权力很大，等于是个小组织，“党政军情”都在里面。

这些人都是谨言慎行的人，绝对小心，不对外讲话的，而且不求个人的名利，不做关系，当时像唐纵 [10] 这种人在里面负责。慢慢地大家就感觉出来了，老“总统”要把一些权力交给经国先生，包括情报治安保卫单位，因为情报治安是耳目。唐纵他们都很懂事，所以这些老人慢慢就退掉了，权力就在经国先生手上。

那时候有一个关于情报方面的石排训练班，专门培养情报人员，是唐纵在培养，然后交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一来，头三期的资历都不算了，从他开始重新培养。从这你就看得出来，老“总统”要把实际的权力交给他，一步一步来。这大家都知道的，那我父亲当然知道，但他不讲的。

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蒋经国曾和陈诚一起，负责国民党的改造，就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0年后，又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副部长”。随着蒋经国越来越接近权力核心，他与陈诚的关系也就微妙起来。

陈履安：经国先生始终没有说跟我父亲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我父亲从来也不提。父亲那时候跟党的关系并不多，一直到台湾，他做了（国民党）副总裁，党里事他都不太管的。我父亲的性格是这样，你不交给他管，他就不管，他不过问的。

不过国民党的七中全会，还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很多党政的高阶层跟我父亲都有点关系，结果那次中央委员，25个人改成16个人，把跟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

曹景行：常委？

陈履安：常委，中央常委。我父亲也不做声，就过去了。九中全会有一件事我父亲就蛮生气的了。这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当时他的“部长”是李国鼎，还有陶声洋，居然都没有做到中常委，他非常不愉快。那个时候是经国先生在主动安排一切嘛，我父亲内心觉得，他一直没有什么事跟经国先生是敌对的。

但事实上，在政治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离开，人家就上不来，你就变成一个目标了。哪怕经国先生不把我父亲当目标，他底下的人也迫不急待地要推。

很多这种事情出来，所以我父亲也懂，他要退，他不做了。可是辞职，（蒋介石）又不让他辞。这是他心中的一种苦闷，党部都不去了。

他有段时候非常不愉快。我们的老家人冉光营冉副官还记得，他讲，“副总统”时常跟我笑笑地讲，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去耕田去，找一块田，耕田。我父亲很向往农村生活，但他这一生都没有可能。

“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

——江南《蒋经国传》

尽管处境尴尬，但这都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在陈履安看来，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

陈履安：第一次“总统”大选，在台湾的“总统”大选，没有问题，因为照“宪法”，老“总统”可以连任。但是第二次（连任）就有点问题了。

第二次选举是1960年。

1959年就要提名了，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怎么办？老“总统”不说，不提、不谈这个事情，你们看着办。时间越来越迫切了，我父亲就找了些大老来研商，因为他是“副总统”，要找大家研商，最后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把这个部署都做好了，报上去给老“总统”。老“总统”还是不讲话，就这样子，直到他当选了，一句话不讲。

陈履安回忆说，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他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

陈履安：1960年7月，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得到消息，说军中讲本来要加薪，“行政院”决定不加了，尤其军人不加薪。这对我父亲来讲，是打击他在军中的声望。何必呢！

我父亲很不高兴，就亲自飞到金门去，待在那里，不回台湾了。那时候媒体没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什么报道，只知道他跑到金门去，这很不寻常。“行政院长”走了，辞职不做了，求他回来，不回来。后来张群秘书长亲自到金门，告诉我父亲，老“总统”要你回去，而且交代，一定要回去。念着革命的感情，还讲了一句话，难道要我跪下来求你吗？这个我父亲受不了，马上就跟张群一起飞回台北。

回到台北的第二天，陈诚面见了蒋介石。在蒋介石开口之前，陈诚先向蒋介石作了一个道歉。

陈履安：先向老“总统”道歉，给他增添麻烦。老“总统”就讲了一段话，你以前跟胡适之、梅贻琦、王世杰，还有蒋梦麟，你们一起到中南部去，我就不放心。

老“总统”说跟这种人怎么能搞在一起？他（蒋介石）说，这是为什么我要连任的原因。他把连任的理由说成我父亲跟这种文人在一起。

1958年，胡适由美国回到台湾地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中国改造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早在1952年，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回台湾讲学，在和蒋介石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就要求蒋介石改良政治，多一点民主自由。

此番在“总统”竞选提名前回台，胡適就打算支持陈诚竞选“总统”，阻止蒋介石连任，他甚至公开说：“国大即将召开，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转移政权之典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陈诚与胡適一向关系十分密切，胡適的做法让无意参选的他十分尴尬，只能沉默以对。在好友王世杰的劝说下，胡適才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意见。

1958年陈诚六十大寿寿辰之日，他和胡適、蒋梦麟、梅贻琦、王世杰四人结伴南下旅行庆祝。当时人们把五人结伴南行一事，比喻为“汉惠帝和商山四皓”。“商山四皓”为秦末汉初避乱于陕西商县南山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以汉惠帝为傀儡，“四皓”支持汉惠帝，力斥吕家势力。蒋介石后来虽然连任成功，但却对此事难以释怀。

陈履安：那时候他们称这四个人叫做商山四皓。我父亲是在1958年过生日的时候，跟了他们这四位一起去度假，结果就被说成带来谋士，要来夺权。所以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很感触、很感叹，说老“总统”对我的期望还是很殷切，但是对我的疑虑实在是太深。

我想那时候我父亲就不想做了，说我本来就不要做，你一定要我做，跟这些人来往又有什么罪过呢？当然，胡適之先生他话也特别多。他告诉人家，等我父亲做“总统”，他就到台湾去定居。他行李都打包好了。

这个当然也使老“总统”不高兴，他不喜欢这些人。我父亲从阳明山下来，就真的不想做了，很灰心，不要做了。王世杰劝我父亲，这个时候不能辞。我父亲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在关键时候会帮他忙的朋友，至于说劝他不辞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说为“国家”想，不要搞僵掉。

〇他从来不讲痛，还是军人性格，我死都不怕还怕痛啊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

这年秋天，陈诚在一篇日记中记下了他做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却陷入了中共军队的层层包围当中，急迫中，他惊醒了；过一会儿他再度入睡，又陷入了另一个梦境，这个梦里边，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陷地。但是，在一次出营巡视时，却被民众包围，民众问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里一无所有。

陈履安：他在1964年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读博士，正开始写论文。大概在秋天的时候，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就有时间陪在他身边了，每一天都陪他聊天。我问他有什么话要讲，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他口里面，他没有批评人，没有抱怨，他只有一种遗憾：这个事要这样做就更好，那个事要那样做就更好。我父母一样，从来不谈人家的是是非非。他们的看法就是，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不要传到下一代。这个对我们有很正面的影响。

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这个要求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发布了陈诚病危的公告。

陈履安：他身体就是劳累过度，很多医生都跟我们讲，他太累了。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在前线作战，操劳过度。加上那个时代的人都喝酒，大碗干杯，烈酒都这么喝的，胃也不好。所以抗战胜利之后，就在上海江湾把胃开了刀，十二指肠也割了。到台湾以后，从1964年开始，身体就不行了，肝也不好。

他从来不讲痛，医生非常清楚，看到他皱着眉头很严肃的时候，就会帮他打一点止痛针。他也不拒绝，还是军人性格，我死都不怕，还怕

痛啊？绝不讲一点痛，他一点病态都没有。他一直维持，绝不让别人操心，最后帮他上了氧气。当医师决定拿开氧气，他就很安详地过去了。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蒋介石当天发布了“总统令”，命国民政府要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为陈诚“敬谨治丧”。蒋介石为陈诚手书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半生戎马，绕了大半个中国，陈诚最后葬于台湾。

陈履安：他去世的时候，很多善后的事情由我来照顾了。真的看见这个人情冷暖啊，很清楚！刚去世，已经有批要员到我家里来，说是替我父亲谈治丧的问题，我亲耳听到，已经有在分配权力的感觉。

我母亲很懂事，知道这些政界的人最关心的是我父亲资料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母亲那时候心脏病发了，躺到床上，要我把所有有关军事的资料整理好，送回“国防部”。老“总统”的文件、亲笔稿非常多，全部整理出来后，我和母亲亲自送到“总统府”，交给老“总统”。

人情冷暖让陈履安内心五味杂陈。而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一件东西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

陈履安：我父亲去世之后，我看到一个名单，就是我父亲把特支费（特别费预算及交出项目的别名，也即接待费），居然分给了33个人。他做“副总统”，有一笔钱可以来用的嘛，就是按规定他可以动用的钱。我们现在做“部长”也有特支费，做主管都有特支费，做连长也有一万块钱特支费。我父亲把钱全部分给这33个人。

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呢，我一个一个去拜访，告诉他们这个钱要断掉了。其中有一个在大陆上做过省主席的，一生傲骨，绝不求人，一个人只身到了台湾，在卖烧饼。任何人给他帮助，都不接受，就我父亲给，可以接受。所以他这些部下对他没话讲，后来他没有这个力量，有些人保不住了，他也没办法，心里很痛苦。

陈履安还记得，在父亲陈诚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前往台北市殡仪馆吊祭的民众络绎不绝。

陈履安：我还记得那一天，出殡的那一天，许多人自动地跪在路的两边，祭拜他。在那一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

了不走，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1965年了，台湾最热闹的一条街叫衡阳街。当时俞大维语重心长，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辞修啊，这个时候走，在衡阳街下车了，我们都坐到个破牛车上面，辞修在衡阳街下车，我们将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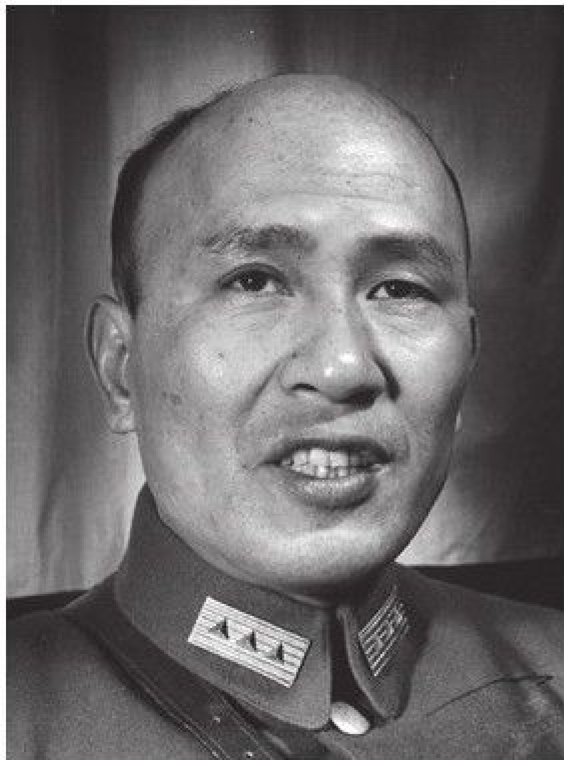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白先勇：白崇禧的孤寂晚年

讲述人　白先勇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1937年出生，回族，作家。幼年在父亲的影响下，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1952年随家人迁往台湾，后考入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其间与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是[12]杂志，并发表月梦玉卿嫂等多篇小说。1963年，前往美国艾奥瓦大学留学，随后进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部教授中国语言文学。1964年，因芝加哥之死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推崇，开始在华人文坛崭露头角，尔后蜚声海内外。

1966年，白崇禧在台湾抑郁而终，白先勇因身在美国未能送别。父亲去世多年后，白先勇逐渐开始追忆往事，翻阅档案，为父亲白崇禧撰文立传。晚年转而致力于改编、推广昆曲，2005年编排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引起轰动，许多美国戏剧行家观看后表示：『这是1930年梅兰芳来美演出后，中国传统戏曲在美国最大规模及最轰动的演出。』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



1924年与李宗仁合作统一广西，二人合称“李白”，成为国民党桂系骨干。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于战场上多次力挫军阀孙传芳。北伐之后，成为中国西南军政的统领者之一，割据一方，实力堪与蒋介石相抗衡。

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崇禧与李宗仁一致摒弃前嫌，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共同抗日，受命掌控国民党最高军权，人称“战神”。先后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等多场战役，战功显著。

解放战争初期，曾指挥国民党军在四平击败林彪部队，但终因受蒋介石猜忌而功败垂成。1949年12月底，应蒋介石之邀，退居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闲职，从此一蹶不振。1966年12月2日，在台北家中去世。

曹景行：白崇禧是民国时期一位著名的军事将领，具有杰出的计谋和军事能力，素有“小诸葛”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把他称做“战神”，毛泽东则说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他是国民党内部最具实力的地方势力桂系的首脑人物之一，与桂系另一首脑李宗仁合

称“李白”。

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同年12月30日，新年未始，退守海南岛的白崇禧应蒋介石共商善后的邀请，乘专机飞往台湾岛。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

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此时的国民党已是一败涂地，只剩下三支主力军。一支是退守西南的胡宗南部队，一支是陈诚留在东南沿海的部分人马，还有一支就是白崇禧的队伍。当时白崇禧手里掌握着15个军25万人马，还有40多艘军舰和几十架飞机，主要负责从江西湖口到湖北宜昌长江中游及中南地区的防务。

当年夏天，经过慎重考虑，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退守长沙，策划在湖南进行防御。谁知湖南省主席陈明仁突然宣告起义，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陈明仁的响应下，强势挺进到江西省南部和湖南省东北部地区。衡宝战役[13]失败后，白崇禧只得率领部队进入广西。

〇父亲晚年很寂寞，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失落

1949年10月15日，起义的白崇禧旧部给白崇禧发来电报，告知："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白崇禧回电："余已决心与党国共存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除了准备对历史有所交代以外，不作其他任何考虑。"

11月初，解放军开始进攻贵州及广东南路，对广西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态势。至11月底，广西大部分解放，桂系精锐几乎全部被歼灭，只余3万余人退入越南。进入越南后，全体人员立即被解除武装，被送到一个小岛上，1952年才被运往台湾。失去兵力的白崇禧被迫退守海南岛，12月底，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台湾。

白先勇：我父亲跟中共军队打仗，从广西打到海南。他和林彪一路打下来，打到广西，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撤退到海南，在海南岛还在等广西的军队撤退出来会合。那是我父亲的军队，都是我父亲带出来的。最后都没有出来，在广西没有出来。后来蒋介石就派人请我父亲去台湾。

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但两人从来不和。北伐结束后，白崇禧的桂系和蒋介石的部队在战场上曾多次交锋。虽然战争都以桂系失败而告终，却也让蒋介石吃了不少苦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双方虽然暂时达成和解，但矛盾始终存在。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白崇禧此去台湾，前途未卜。

白先勇：到台湾去是我父亲一生非常关键的决定之一。那时候中美协防也没签，台湾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蒋介石要我父亲到台湾去，我父亲下了个决定就去了。其实他也知道到台湾会怎样，毕竟他跟蒋介石相处了那么几十年，心里面很清楚蒋介石是怎样的人。

曹景行：您后来问过他这件事情吗？

白先勇：我问过他的。我说到台湾去是很艰难的一个决定啊。我问，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他说，他是去跟国民党共存亡！

18岁参加学生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国民党，白崇禧从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最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副参谋总长、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他的一生都是和中华民国息息相关的。

白先勇：他自己跟我讲就说，他是向历史交代。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只好撤到台湾去了。对于他自己，我觉得他是这个看法：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已经完成了一生的历史，最后选择到台湾。我想父亲他是一个聪明人，到台湾去的处境如何这一点必然也考虑到了，他是觉得到台湾去可能还有贡献，在军事上他还可以发挥一些才能。

曹景行：他应该也是不大甘心就这么找一个地方待下来，后半生就这么养老。

白先勇：我想是的。我现在想，他的个性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曹景行：您问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伤感？

白先勇：我想他的伤感不是个人的。父亲在晚年很寂寞，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失落。我观察到也感受到他的感伤，我想这跟整个国民党的存亡有关系。

〇我们家从小都遵守教规，不吃猪肉的

白崇禧来到台湾时，没有带一兵一卒。桂系的大部人马，都留在他经营了大半生的广西，他的日常生活，也与他熟悉的战场渐行渐远。

在台湾的“国民政府里，这位”陆军一级上将“只担任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闲职。虽然在一些公开活动中，比如军事演习，白崇禧会被安排坐在蒋介石的身边，以示他的重要性。但这都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貌举动，到了台湾之后的白崇禧，在军事和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

白先勇：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就进入比较孤独的状态。但这种孤独是内心的孤独，他各种活动还是照常参加。常常跟何应钦、顾祝同他们一起去参加筵席啊，参加空军什么典礼啊这些。毕竟名义上他还是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四星上将”，他在军队里面的声誉也还在那里，因为军队都很讲传统的。

一方面他是责任心很重的一个人，毕竟名义上还是拿薪水什么的；另外一点，我觉得他有他的骄傲、自尊，所以他还是要保持和平常一样。

早年投笔从军，一直到1949年离开大陆，白崇禧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行军打仗中度过的。退守台湾之后，尽管这位国共双方都视之为军事天才的“小诸葛”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不过，他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在一起安静地生活了。

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共育有10个子女，白先勇是他们的第八个孩子。

1952年年初，还在香港喇沙书院上中学的白先勇，从香港乘船来到台北，与父母团聚。那年他15岁。

曹景行：您到台湾是您父亲的决定吗？

白先勇：是，能够回去和家里人团聚我也挺高兴的，因为很久没见到家人了。我那时候对国家大事只是比较懵懂地知道一点，具体的还是不了解，但是回到家去总是蛮高兴的，又能见到父亲母亲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台北松江路，住满了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白崇禧的家也安在了松江路。他的公馆和其他公务人员一样，是一所普通的绿色木板房。

白先勇：我们住的宅院长长的，因为人多嘛，所以是两栋房子合在一起，但也就是普通公家人员的宿舍。这样子，一直住到我父亲过世都在里头。

曹景行：他自己也没有想另外找地方住？

白先勇：没有。说到这一点，我父亲母亲对这种住的地方都不是很在意。我后来到南京去过，看到他当国防部长时住的房子。小时候还不怎么觉得，现在看觉得挺小的，和他当时的身份挺不符的。他根本就不注重这些，我们在台湾住的那个房子很普通，台风来了还漏水，但就一直这么住下去了。

白崇禧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进入广西省立师范和保定军校，这种求学的经历让他颇具儒将之风，行军作战之余也总是“手不释卷”，尤其喜欢读《左传》，曾经甚至有人说他是“半部《左传》治广西”。这样的经历让白崇禧非常看重对后代的教育，甚至在前线的时候，他都经常打电话回家询问孩子们的成绩。因此在白崇禧的家里，成绩单往往成为10个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排行表。

白先勇：我知道我父亲这样子，所以我就拼命念书，因为念得好，家庭地位就比较高。我的哥哥姐姐都是母亲带的，功课都很好，要超过他们非常不容易。到了台湾以后，父亲为了不让母亲再辛苦，就说他来带弟弟。结果弟弟的功课不太好，母亲还取笑他说：“这就是你调教的孩子！”

曹景行：那您从您父亲那里受到的教育影响主要是哪方面呢？

白先勇：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父亲对我是有很深远的影响。他要求我们念古文，也常常给我们讲那些经典。他喜欢《史记》《资治通鉴》这些东西，记性也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有时候也会跟我们谈谈历史。对于我们自己过去的辉煌传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他是很感叹的，这种感叹我从他的思维也感受得到。他还喜欢读世界战役战史，像拿破仑侵俄史、俾斯麦的战争策略，他都常常研究。

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都是回族。据白家的族谱记载，白家最早的先祖叫做伯克鲁丁，是元朝的官员，一直到明朝，这个家族才改称汉姓白。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在这个家里也被严格地保留了下来。

曹景行：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您现在还是伊斯兰教的习惯吗？

白先勇：我父亲是非常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一直遵守到底，不过我们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曹景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有这个习惯的？

白先勇：从小就知道。我们家从小都遵守教规，不吃猪肉的。尤其在台湾，我父亲比较有时间，就到清真寺去主麻 14 ，每个礼拜他都会去，斋戒的时候也会守斋。

在大陆的时候，白崇禧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理事长，算是中国伊斯兰教界领袖。来到台湾后，白崇禧继续担任台湾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发扬伊斯兰教文化。对于身处低谷的白崇禧来说，虔诚的宗教信仰是内心莫大的安慰。不过最让白先勇钦佩的，是他父亲积极的人生态度。

白先勇：来台湾以后，他基本上没什么事了嘛，主要就是看看书、下下棋。我母亲喜欢花草，以前在桂林的家中，就种了满园的花草，所以父亲就在家里养了二三十盆兰花。素心兰开花的时候，满屋生香，这都是他每天细心照料的成果。

但他是做事的人，一辈子做的都是大事，又怎么耐得住清闲呢？我父亲很喜欢下围棋，是台湾围棋理事会的会长。台湾著名的围棋选手林海峰，那时候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父亲就筹款把他送到日本去拜名师学艺，后来他果然成了围棋大师。台湾大学的改制也是他极力促成的，他认为有必要扩大招生，所以他就去谏言。原来台湾是没有清真寺的，后来他去交涉，清真寺就建起来了。他还凭着他在国民党中的老关系，常常为伊斯兰教协会争取一些经费。协会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也从不推诿，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解决。为此，教徒们非常感激，有什么活动总是把他作为贵宾，特别邀请他参加。反正他常常觉得这个事情有益就会去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身处逆境的时候，有的人会抱怨，有的人会消极对待，但是他无论是大事小事，一直都很积极。

〇撤退的时候，他坐在马上睡着了，好几次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到田里头

正如白先勇所说，白崇禧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在硝烟弥漫的近代中国，白崇禧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这也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尽管桂系与蒋介石曾多次开战，甚至在双方矛盾最为激化的时候，蒋介石曾经下令抓到白崇禧就处死，但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都会派白崇禧出马。事实证明，他离不开这位卓越的军事人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便电召身在桂林的白崇禧“共赴国难”。白崇禧的部属、亲人担心此行会对他不利，纷纷劝他不要去，只有夫人马佩璋鼓励他自己拿主意。白崇禧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

于是，白崇禧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1937年8月4日，他从桂林乘蒋介石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到南京，参与制订对日作战计划。第二天，日本报纸立刻作了报道，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随后白崇禧受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等要职。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人硬拼难以持久，白崇禧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这些建议都被蒋介石采纳。

抗日战争初期，白崇禧撰写的《游击战纲要》一书，还被作为国军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他所制定的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也成为各战区作战的参考。

1938年，随着日军进攻的加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此时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已沦陷。身为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面对并不乐观的战场形势，也是日夜操劳，蒋介石侍从副官居亦侨后来回忆说：“我常见白崇禧由于睡眠很少，眼睛布满血丝，忙得腰酸背疼，坐在汽车里还用拳头捶打腰部。”

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日军更加不可一世，准备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会师武汉。在这场战役中，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的徐州，成为日军首要攻取的目标。徐州位于黄淮两水间，鲁、豫、皖、苏四省交界处，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津浦、陇海铁路在这里交会。日军占领徐州，中国大半江山必将失守，因此徐州战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抗战大局。

1938年2月，国民政府与日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战，史称徐州会战。此时第五战区的负责人是李宗仁，他带领的装备落后的杂牌部队，成为阻挡日军进攻的主要力量。战前，白崇禧随同蒋介石来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抗战。

白先勇：台儿庄战役之前，他跟蒋介石飞到徐州去，蒋介石让我父亲在徐州就待下来了，帮助李宗仁指挥打这个台儿庄。前期的军队调动都是我父亲在进行的，因为他当时是副参谋总长。其实当时的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但是真正的军事幕僚都是我父亲跟蒋介石这边的，所以好多决策都是我父亲在做。

那时候李宗仁的军队不够，我父亲说服了蒋介石，把军队调到徐州去，调到第五战区帮助李宗仁打那一仗。其实我父亲很多策略的成功，都是跟李宗仁合作促成的。他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军队的调度。

我父亲有一个长处就是善于部署大的军队，他自己说的，军队越大，他越能够成功地进行战略部署。百万军队调动起来，挥洒自如，我觉得光是想象就颇有大将之风。

台儿庄一战，中国投入兵力将近10万人，日军投入约3万人。双方激战半个多月，中国军队以伤亡近3万人的代价，毙敌1万余人，缴获坦克、大炮、战车、装甲车、机枪等大量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第一次胜利，也是当时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更是日军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战场上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

白先勇：这仗打完下来以后，日本人被激怒了。日本人头一次吃了大败仗，非同小可，所以就倾巢而出派大军来反击。这下子我父亲就决定下来，跟李宗仁说快撤，不正面迎击。要把军队整体保持下来，撤掉让日本人扑空。所以打了个胜仗以后马上撤退，当时我父亲为了部署这个撤退，几天几夜都没能合眼，所以撤退的时候，他坐在马上睡着了，

好几次都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到田里头。

当时打仗打得虽然很惨烈，但是撤退很及时，没有让日本人报复成功，重要的是把军队也保持住了，所以那一仗打得是相当漂亮。台儿庄一战以后，全国士气大振，那时候在武汉多少万人上街游行，把父亲跟李宗仁的大相片拉着满大街去游行。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则迁往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8年6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再次投入12个师团，以35万余人的总兵力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江北防务。

因为指挥徐州会战昼夜辛苦，李宗仁牙病复发，十分痛苦。最后不得不住院动手术进行治疗。从1938年7月中旬到9月中旬，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官职务，为减轻正面守军的压力，白崇禧以部分兵力夹击敌人后方，同时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中日双方又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斗。

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12月25日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防御阶段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此后，日军虽然最终得以攻占武汉，但其以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达成迅速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由此受挫。抗日战争也进入残酷的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任命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下辖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第四战区和第九战区，彰显了对白崇禧的器重，正如程思远[15]在《政坛回忆》中所说：“蒋介石几乎把半个中国交给了白，信任之专，一时无两。”

八年抗战，身负重任的白崇禧始终奔波在前线，与家人见面的次数十分有限。偶尔回家，也是为了探望自己年迈的老母亲。对于幼年的白先勇来说，因为长年见不到父亲，父亲几乎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符号。

但是父子间不多的见面，总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有一回不知道父亲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一起去乡下探望祖母。我们坐在汽车里一路颠簸前行，远处还不时传来轰隆的炮火声，父亲突然扯开嗓门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我们受到感染，一路跟着唱。

现在想来，当时那首歌应该是我父亲根据自己的心境唱的。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又是如此艰难，父亲教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多么悲壮的情景啊！

○每次谈到四平街会战他都跺脚

尽管白崇禧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蒋桂之间的矛盾却让蒋介石始终放不下，对白崇禧可谓“爱其才，却恨其不能彻底臣服”，因此对白崇禧的任用也难免有所顾忌。这一点从四平街会战时，白崇禧突然调任国防部长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却毗邻东北地区。鉴于东北是日本经营多年的重工业基地，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蒋介石担心共产党会抢先进入东北，并依托苏联的支持，夺取东北的重工业，因此急于收复东北。

日本投降的前一天，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东北主权应由苏联方面交给国民政府。10月初，国民政府派员进驻长春，与苏联交涉具体接收事宜。通过协商，双方商定苏军撤退延至1946年2月1日。

根据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与英美达成的协议，中国东北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一贯执行不进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政策，也明确表示不能让美国的一兵一卒进入东北地区。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反苏亲美的倾向，让苏联大为不满。尤其是在1945年9月，美军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前往东北，使苏联怀疑美国有染指东北的企图。为了抵制美蒋联合，苏联暗中扶助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控制东北。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10万共产党部队开赴东北。

1946年2月，美英舆论单方面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这让苏联更加不满。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苏联撤军一直拖延到1946年3月8日，并突然离开，不向国民政府通报，使国民党军队无法运送部队前去东北，完成接收工作。同时苏联却为共产党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并明确表示援助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开战。

1946年4月，苏联军队从四平街撤退。3天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武装攻占了这个处于南北通衢的咽喉要地，国民政府任命的辽

北省主席、张学良前部下刘翰东等人则成了俘虏。四平街会战就此展开。这场从4月18日一直打到5月18日的战争，也成为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第一个重大回合的军事较量。

白先勇：那时候两边都差不多有10万的军队吧。1946年，两边正胶着的时候，蒋介石派我父亲去督战。我父亲就飞到沈阳，给他们开完军事会议就亲自上前线去了，跟杜聿明他们一起督战。

那时候的东北政治部主任是余纪中[16]，他当时也在场。我后来见过他，他亲口跟我讲了很多。

他说我父亲一去的时候士气大振，那些（国民党）军队就往前打，就把四平街攻下来了，我父亲就力主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哈尔滨、齐齐哈尔这些地方，把东北打下来，把林彪军队打出东北。我父亲说他也希望能够在东北指挥，亲自督战指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同时要求他立刻返回南京。

四平之战，共产党损失上万人，原本还准备继续抵抗，再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没有想到，“前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脱逃叛变，致使整个撤退作战计划泄露。林彪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指挥部队径直北撤，放弃东北重镇长春。很快，共产党的部队就退过了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作好了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面对共产党的撤退，白崇禧主张乘胜追击，他认为，对共产党军队“倘能一鼓扫荡，不难根绝”。

攻下四平和长春以后，蒋介石却坚信不会有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此时的他对共产党依然抱着轻视的态度，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而且蒋介石深感白崇禧的才干越突出，对自己的威胁越大，因此，他将白崇禧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名义上是军事系统的最高决策人，实际上却远离了战场。对于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蒋介石自然也没有采纳。

1946年6月6日，蒋介石下达了休战命令。正是这一纸休战令，使东北的共产党部队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并得以继续占据北满。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发展壮大，由守势转入攻势，不仅夺得了整个东北，更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解放战争的结局。这是蒋介石之前万

万没有想到的。

白先勇：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谈过三次，每次谈到这个事情都跺脚的。我父亲不是很容易喜怒形于色的人，我没看到过他对过去的事有什么情绪，但是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跺脚。他说这是最好的机会，他向蒋介石建议应该乘胜追击。而且孙立人的新一军当时已经到松花江了，直逼哈尔滨，胜利已经在望了，可以过去了。

蒋介石呢，说你回南京当你的国防部长去吧。一定要我父亲回南京。我父亲觉得，这是整个战略上最大失策的一次。后来我们果然也看到一些文件，毛泽东已经下令，准备要从哈尔滨撤退了，要放弃哈尔滨了。后来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说这是他在国共大战里头最大的一次错误。

○“国安局”到家里来查抄，连地板都被揭开来检查

来到台湾后，尽管脱离了战场，远离了政治，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白崇禧却没有得到平静，各种烦扰纷至沓来。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七大”，所有在台国民党六届常委都被选为“评议委员”，唯独没有白崇禧。这是蒋介石故意给白崇禧难堪。一些国民党元老觉得这样做颇为不公，便推德高望重的于右任、居正向蒋介石陈情。然而蒋介石在听于右任和居正说明来意之后，只是说了句：“健生的事，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走了，从此再无下文。

就在这一年，白崇禧的家也被“国安局”查抄，家里的东西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也被揭开来检查。白崇禧给负责情报治安部门的蒋经国打电话，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蒋经国让他直接去问自己的父亲蒋介石。蒋介石则告诉他：“我知道此事，不仅对你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白崇禧无奈之下，只有接受。

1954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在台北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宋希濂的幕僚但衡今等人弹劾白崇禧，罗列的罪状有三条：第一是私吞中央银行黄金7万两，第二是私吞汉口中央银行的库存白银370余万两，第三是在淮海战役徐州会战中，不遵守调令，拥兵自重。受到这样的屈辱和打击，白崇禧自然心有不甘。身为“国大代表”的他马上进行反击，给每位会议代表发了一份答复书，一一驳斥对他的弹劾。

但代表衡今等所提‘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案’，谨依据事实分复如下：

（一）关于经费（1）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三十七年（1948年）夏，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7万余两，地方上为维持币信，多主留存汉口，适逢国防部何前部长电话转达蒋总统面谕，以中央改革币制使用金圆券，需要黄金以为准备，崇禧力排众议，当经遵令转运中央，有案可查。这是汉口地方人士的希望，保留黄金，并非华中扣留黄金。

（2）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银圆——三十八年（1949年）春，本署驻防武汉，适值金圆券急遽贬值，中央已汇发到汉口之军政各费，汉口中央银行因券料运济不及，库存告罄，不能兑取，华中长官公署为维持辖区秩序，经呈报行政院，并电请汉口中央银行转报该行总行，将库存银

圆查照应付款项分别缓急酌予搭发。本署经费系按照中委核定预算向联勤总部驻汉收支处具领，并未向该行提支分文。凡此经过，崇禧来台以后经奉行政院四十年（1951年）三月十六日院台财库（40）发第01269号代电，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财政部、审计部、联勤总部、中央银行等机关会同清结有案，计银圆三百七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三元。

……

（二）关于武汉军事责任部分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向兼程增援。又二十军（杨干才）、二十八军（李浡）两个军亦由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系华中主力，均系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此时华中兵力较弱，辖区仅留第三兵团（张淦）第七、第四十八两个军，于平汉铁路正面对刘匪伯诚两个纵队及孔从周匪部主力；皖省仅有四十六军对大别山区及皖东地区之共匪作战；至十四兵团（宋希濂）仅第二军（陈克非）战力较强，担任鄂西地区清剿阻止孔匪从周南犯，掩护川东门户，故无法抽调。嗣以徐蚌战区逆转，匪军分别由皖南及江阴各地渡江南犯，南京失陷，当时安庆及南浔线非华中防区，亦经派遣部队防守，但匪军渡江后，沿浙赣线西进，已越过赣江向长沙、醴陵方向进逼，威胁华中侧背，武汉形成孤立，华中部队奉令向汨罗江南岸转进，拒匪南犯，此乃华中奉命由武汉撤退之经过，并非坐观成败。

这份书面答复后来在香港《工商时报》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舆论明显偏向白崇禧。此案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白先勇：他受到了很多的清算和刁难，当年处理“二二八”事件[17]的时候，他就得罪了很多人，到台湾了人家自然要报复他，但是他一直都很坦然地面对。我到台湾时才十几岁，那时很多四五十岁的台湾人跟我讲“二二八”时说，要不是你父亲在这里，台湾人就遭殃了……父亲救了很多原本要被拉去枪毙的台湾人。

他当时下了几道重要的命令：制止滥杀、学生复学、请逃到山里的人下山。我父亲还跟蒋介石报告要撤职查办柯远芬[18]，因为柯远芬说“宁愿错杀九十九，不要放过一个”，马上被我父亲纠正“不行，宁放九

十九，不能错杀一个”。他的做法和政府主张的严厉镇压背道而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引起了别人很大的不满。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只要条件允许，一生之中都要去麦加做一次朝圣，这也是白崇禧的一个愿望。1955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中国台湾地区。他当面向台湾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崇禧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访问中东，做一次朝圣之旅。然而这件事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授意伊斯兰教协会改选会长。白崇禧不得不辞去已经担任二十多年的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一职。

除了种种刻意的刁难，白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得不到清静。根据白先勇回忆，便衣的监视可谓无时无刻不在。

白先勇：对我父亲是相当防范的。我们家对面是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员有不少就是特工人员。凡是来我们家的客人，常常要受到特务的跟踪和监视。父亲喜欢下棋，以前军务虽然繁忙，但只要一有空，他总要拉部下杀上几盘。来台湾后，也经常请人来陪他下棋。可后来，因为老要受情后治安人员的盘问，再也没有人敢来陪他下棋了。

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应该也派人监视我们了。我们在家里还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父亲出去的时候，总会有人跟踪。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看戏，我母亲察觉到了远处有便衣在观察我们，就多买了几张票，让我送给他们，请他们一起看戏，当时这几个便衣都一脸羞愧的表情。

除此之外，晚年的白崇禧还遭遇了亲人方面的重大打击。就在约旦国王来访的这一年，白崇禧在美国上学的女儿白先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回台湾。白先明是白崇禧夫妇三个女儿中年龄最小的，长得圆头圆脸，天真可爱。白崇禧十分疼爱这个女儿，亲昵地称她为“苹果妹”，还感叹在她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坏字眼。而生病这一年，白先明只有21岁。

“明姐的病，是我们全家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体的内疚。她的不幸，给父母亲晚年带来最沉重的打击。父母亲一生，于国于家，不知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大风大险，他们临危不乱、克服万难的魄力与信心，有时到达惊人的地步，可是面临亲生女儿遭罹这种人力无可挽回的厄难时，二位强人，竟也束手无策了。……那天在松山机场，我看见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痛之情，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

荷的程度。生性豁达如母亲，明姐的病痛，她至终未能释怀。我记得明姐返回一年间，母亲双鬓陡然冒出星星白发，忧伤中她深深自责，总认为明姐幼年时，没有给足她应得的母爱。”

——白先勇《第六只手指》

也许是为女儿的病情忧伤过度，也许是年轻时太过操劳，自此以后，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62年，陪伴白崇禧整整37年的马佩璋因病去世，令白崇禧在晚年饱受丧妻之痛。

马佩璋出身诗礼之家，曾读过师范，以品学才貌闻名四周，是当年桂林有名的美人。马佩璋的父亲是个非常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择婿条件非常严格，非教门之子不嫁。白崇禧祖居马家邻村，是同教中人，加上英俊有为，因此博得马父的好感，成为马家的乘龙快婿。

白崇禧与马佩璋在1925年结婚，那时正是白崇禧力战疆场，致力统一广西的艰苦岁月。以后数十年里，马佩璋相夫教子，一直伴随在白崇禧的身边。夫妻患难与共，感情甚笃。马佩璋对子女管教甚严，被白崇禧称为贤妻良母，他说：“与夫人结缡37年，子女10人，提携抚抱，以教以育，备极劬劳。今则进德修业，均有所成……夫人对子女教育，至为重视，无论家中任何喜庆，概不许请假，免致荒废学业。如有过失，则谆谆告诫，予以启迪……”

“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十六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

——白先勇《蓦然回首》

白先勇：我父母关系非常好。父亲是个很犟的人，但是他对母亲一直很谦让。两个人如果吵架了，母亲撒点娇，他就让了。在家里，是母亲做主，父亲很尊重她的意见。她出身大家闺秀，做人正派，但在小事

情上比我父亲好说话。我想，如果母亲不是一个很正派正直的人，我父亲也不会让她。

因为父亲的地位关系，人家要给她“国大代表”之类的官做，她什么都不要，说“我就是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她要在外面做什么。她到台湾以后，也根本不和官场接触，自己有一帮朋友，平时就和朋友打打麻将什么的。她是很豁达幽默的人，在台湾的时候常常说：“哎呀，现在处境挺好的，‘皇恩浩荡’嘛。”因为她的这种豁达乐观，我们也获益良多。

曹景行：您母亲去世这件事对您父亲影响大不大？

白先勇：影响很大，他们两个在精神上互相依靠。因为我父亲一直是在前方打仗嘛，整个家几乎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撑起来的，不光是我们家里，还有两家的老小，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在撑，母亲等于家里的一根柱子一样，很不容易。

所以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父亲受到的打击很大。他们也是患难夫妻了。我母亲最后是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很辛苦，她住院的时候父亲就一个人在家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整天跑医院，父亲也跑医院。

曹景行：我看到一些文章介绍，说您母亲去世后，举行的是伊斯兰教的葬礼。

白先勇：是，因为我母亲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她去世后也是伊斯兰教的葬礼。伊斯兰教的葬礼有一个绕墓的习俗，这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礼仪，每天要到墓上，阿訇要念经，念40天才完，父亲当时已经69岁了，也是每天都去。

“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

“母亲下葬后，按伊斯兰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

——白先勇《蓦然回首》

据熟悉白崇禧晚年生活的人讲，马佩璋下葬当天，“白将军眼泪几乎没有断过”。此后，白崇禧精神大不如前，“有时好像茫然有所失，一副在那里寻寻觅觅的模样”。

〇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

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大陆，受到了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这件事再次打破了白崇禧在台湾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生活。他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19]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白先勇：我听他们讲了，李宗仁回大陆这件事情，我父亲还写了信给他的。我父亲不赞成李宗仁回来，回来的话，他们的处境更很难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相识于1923年。当年，为了统一广西，白崇禧曾极力劝说陆荣廷的部下李宗仁加入讨贼军，并拥护李宗仁为首领。李宗仁接受了白崇禧的劝说，脱离陆荣廷，将讨贼军改名为定桂军。从那时起，他们的命运就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此后数十年，二人始终甘苦与共，有着深厚的友情。白崇禧还曾经对部下说：“一生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李德公。”

白先勇：他们两人是非常好的搭档。我想他们两个人互补不足，基本上处得很好。李宗仁很尊敬我父亲的，我父亲当然很礼让他，一直都把他当做广西的领袖。所以他们之间也是很难得，虽然他们常常也有不同的意见。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忌惮，与李宗仁以及他领导的桂系是分不开的。自从政之后，强大的桂系就是他的一块心病。一直以来，桂系力主保持自己的独立力量，与蒋介石各自为政。白崇禧原本是桂系首脑中与蒋介石关系最为亲近的，但蒋桂之间的矛盾也常常使他不得不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年深日久，蒋桂之间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26年北伐开始时，因为看重白崇禧的军事才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力邀他担任军队的副总参谋长，共同策划北伐的军事行动，李宗仁也率领桂系军队参战。此后，由于蒋介石排斥异己，引发桂系的不满。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二人联合汪精卫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后，以桂系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力

量得到扩充。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想要削弱各方的力量，便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提出裁减军队。实力强大的桂系成为他第一个裁减的对象。蒋桂矛盾也由此激发开来。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暗地收买桂系将领阵前倒戈，以致桂系大败，第四集团军解体，白崇禧被迫逃往越南。同年6月，李宗仁通电下野，逃往香港。

1929年11月，白崇禧、李宗仁二人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2月张发奎被陈济棠部队击败，李、白二人的反蒋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

1930年5月，阎锡山联合西北军冯玉祥和桂系再次打响倒蒋战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将冯阎战争”。由于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再次取得胜利，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桂系势力也由此受到严重打击。不过，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向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蒋桂之间得以暂时和平相处。

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公署督办，白崇禧随之出任副督办，和省主席黄旭初 [20] 成为广西三巨头。自此，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通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发展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据说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追击红军到湘江的时候，驻守湘江的桂系军队放开大路，朝天射击，让一部分红军安然渡过了湘江。随后，桂系还组织群众拍摄了《七千俘虏》的电影，搪塞蒋介石。

三巨头的努力，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在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的“模范省”，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36年6月，李宗仁与白崇禧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反蒋，史称“两广事变”。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1937年8月，桂系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暂时和解。

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想寻找机会削弱桂系实力。但白崇禧是副参谋总长，而李宗仁又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二人实权在握，难以动摇，几次暗中较量之下，蒋介石被迫承诺不干涉第五战区指挥，以此保证李宗仁在用人上的主动权，桂系精锐部队得以保存。李宗仁自己也承

认："我国有谚语'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嗣兼军训部长，此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李宗仁调往北平出任行辕主任，明升暗降。而后又将白崇禧调至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意图分化李、白二人，夺取桂系的兵权。为保存实力，无奈之下，李宗仁只好韬光养晦，前往北平。此后，李宗仁名为桂系领导人，但实际权力则开始转入白崇禧手中。蒋桂暂时相安无事，不料一场选举再次激化蒋桂矛盾，也将白崇禧推到了风口浪尖，双方再次走向对抗。

解放战争爆发后，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每每败在共产党军队手下。1947年，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中国，经过一番调查后，他认为蒋介石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要想复兴，一定要有感召力的领袖出现。而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观察，资历深厚又颇有民主名声的李宗仁是最佳人选。1948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决定重新公开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由于有美国人的支持，李宗仁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

蒋介石并不希望李宗仁参选，希望他能放弃，但遭到李宗仁的拒绝。蒋介石大怒，双方矛盾在国民党内部公开化。为了压制李宗仁，蒋介石抬出孙中山之子孙科，发动党内亲近派系全力支持，不仅亲自出马为孙科组织拉票，还指使陈立夫散布谣言，说李宗仁的竞选有政治企图，桂系的目的是逼领袖出国。更无中生有地污蔑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贩卖黄金，李宗仁利用职权高价出售运煤执照等。桂系也不甘示弱，收买相熟的报馆，大爆孙科的绯闻。双方竞争白热化。

白崇禧也不赞成李宗仁参选。早在选举前，他就劝告李宗仁："即或侥幸获选，恐亦造猜忌；不幸而失败，更何以善后？"无奈李宗仁执意要参选，白崇禧只能再次与蒋介石走向对抗，以支持自己的老上司李宗仁竞选。

白先勇：我父亲不赞成（他）出来选副总统的，我父亲跟我讲了。希望李宗仁不要出来选。因为他认为，李宗仁很少在中央做官，他都在外面，基本上李宗仁是个军人，所以他不赞成。我父亲中央的官做得多，他认为李宗仁在中央做官，这边的关系他恐怕弄不来。但是李宗仁没听他的忠告，一旦宣布了，那父亲逼不得已，非支持他不可。

4月19日，经过四轮投票，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孙科，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李宗仁后来回忆说，当蒋介石听到李宗仁的票数过半时，盛怒之下一脚就把收音机踢翻了，命令随从备车出巡。蒋介石烦闷时总是去中山陵园，所以司机就把车往中山陵园开，可是刚到陵园蒋介石突然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回到官邸，蒋介石才下车立刻又上车，这么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对于白崇禧帮助李宗仁竞选，蒋介石更是不能谅解，他当即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将他外调，对他也更加防范。

白先勇：我父亲当时的威望，对李宗仁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伊斯兰教方面的票啊，整个合起来非常可观。所以我父亲支持他，他就一定能选上的。蒋介石非常不谅解这件事情，所以马上就把我父亲调走了。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的惨败重创了蒋介石的中央军。而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的淮海战役，更使得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被歼。淮海战役之前，白崇禧曾主张将国民党华东、华中两部分军队合并，由他来指挥。蒋介石担心白崇禧兵权太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将属于华中军队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刘峙指挥。

刘峙就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后，徐州很快被解放军包围。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又寄希望于白崇禧挂帅。此时华中战事吃紧，白崇禧拒绝了蒋介石，回到武汉指挥华中战况。尽管如此，他还是派出华中总部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为解徐州之围出力。

刘伯承一看形势不对，下令迅速撤退，一日之内，向北退出两百华里。此时蒋介石又下令让白崇禧调兵增援，白崇禧拒不奉命，因为他知道，战局已定。而这，也为他后来在台湾遭到弹劾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的惨败使美国绝望，弃蒋扶李的政策也越发表面化。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建议蒋委员长让位给李宗仁。而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李宗仁再次打出了同共产党和谈的口号，这既符合美国的意愿，又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想法的提议。一时之间，蒋介石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

白崇禧也对身边的人说："这一仗（淮海战役），老蒋的老本丢得差不多，再也搞不下去了，我们要老蒋下野，德公上台，和共产党谈和，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他还先后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和谈。

据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回忆，蒋介石恨极桂系"逼宫"，在1948年年底，他甚至曾经密谋暗杀李宗仁、白崇禧。由于三大战役毁灭了蒋军嫡系，蒋介石不得不倚靠桂系抵抗中共部队的进攻，这才取消了暗杀令。

1949年元旦，蒋介石通电下野，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蒋桂之间的积怨进一步加深。就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的前一天，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在溪口设了七个电台，遥控着南京的一切。同时下野之前，蒋介石就着手把国库里的金银全数运往台湾，因此，李宗仁从上台的那一天起，就成了一个无权无钱的空头"总统"。党、政、军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失败的行政院长孙科，也一怒之下，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国民党顿时陷入一国三公的混乱局面。

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短短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力量烟消云散。1949年11月初，蒋介石的亲信找到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参与对蒋介石"劝进"，让蒋介石重新登上"总统"宝座。此时广西战事吃紧，白崇禧认为蒋、李分裂，国民党将彻底失去希望。如果二人携手，一致对外，还有可能挽回败局。于是白崇禧提议李宗仁到昆明巡视，由他居中调停。

李宗仁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飞往昆明。白崇禧拟定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蒋介石宣布复职；李宗仁同意回任"副总统"，但因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方案很快送到了台北的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回复同意复职。但由于担心李宗仁到美国，会继续进行倒蒋活动，因此对于李宗仁出国一事，蒋介石拒不答应。

蒋介石的猜忌，让李宗仁完全失望了。国民党彻底溃败后，他既没有按照当时的民国宪法卸任代"总统"一职，也没有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而是飞往美国。至此，李宗仁与蒋介石彻底地分道扬镳。

白先勇：对李宗仁去美国这件事情我父亲有意见。他觉得他应该先

到台湾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他那时候还是代“总统”嘛！就这么离开了，他不赞成。他说要把这个“总统”的位置交回给蒋介石，要有一个正当的程序这样子。我父亲的看法就是你应该到台湾去，就算要把代“总统”的位置交出来，也得有合法的程序。他非常非常在乎这个事情。

但李宗仁有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去台湾处境啊什么的不会好。李宗仁去了美国，他们也就没有来往了。可能也要避嫌吧，毕竟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台湾都清清楚楚的。

李宗仁拒不去台湾，他说：“台湾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我如果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张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

李宗仁既不肯辞去代“总统”之职，又不肯去台湾，这让蒋介石很是尴尬，却又拿他毫无办法，只能转而用身在台湾的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只要李宗仁在美国有什么动作，白崇禧就要公开发言表示反对。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发布公告，宣布“复职”。在此之前，白崇禧特致电李宗仁，“望保持缄默，勿表反对”。但李宗仁置之不理，在蒋介石宣布复职的当天下午，马上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蒋介石“复职”是“违宪”。为此，白崇禧又奉蒋之命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责备其不该唱反调。

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新中国建交。2月12日，李宗仁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仿效法国调整中美关系。蒋介石遂令白崇禧致电李宗仁，指责他“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交，为亲痛仇快”，“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肖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对白崇禧的上述言论，程思远认为：“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国民政府前地政部长吴尚鹰也说：“李宗仁与白崇禧自统一两广而至北伐抗战，甘苦与共，患难相扶持，数十年如一日。今李德邻身居海外，当能畅所欲言，而白健生困居台北，则无说话的自由，他实逼处此，不得不尔，言念及此，实可慨叹。”

曹景行：您父亲，特别是在晚年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谈起过他和老先生蒋介石的关系？

白先勇：说起来，我父亲跟蒋介石也有四十几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用好与不好一句话简单划分。他们的关系从北伐就开始了。北伐、抗日、国共、台湾这几个阶段，具体说起来，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很难说清楚。

有时候好像是，我父亲跟蒋介石之间有冲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又特别密切，可以说在非中央军、非黄埔系的将领中，蒋介石最倚重的是我父亲。从北伐当副总参谋长，抗战的时候当副参谋总长，当国防部长，他都是最高军事幕僚。但是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别人看到蒋先生都怕得不敢说话，我父亲则是平起平坐，该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候根本不顾他的颜面。蒋先生有时候会听他的，但也常常有犯了蒋先生的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没有真正处好，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〇要加害我父亲的话，不必等到那个时候

1966年12月2日，李宗仁回大陆后的第二年，白崇禧在台北的家中去世。由于李宗仁回归大陆的时代背景，以及蒋介石与桂系之间曾经有过的种种不和，使得白崇禧的死因一度披上迷离色彩，也留下种种传言。这些传言或多或少都与蒋介石有关。周恩来在接见回国的李宗仁时就曾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并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坊间传说，李宗仁回到大陆之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毛人凤对白氏直接采取制裁行动，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由此，各种有关白崇禧之死的传闻不胫而走。

一次，白崇禧去阿里山打猎。阿里山有上下山的小火车，由于铁路是单行线，火车每次出发之前都要先跟目的地作报备，以免发生事故。白崇禧坐上了上山的小火车，刚开出没多远，突然从山上急驶下来一列小火车，眼看两车就要撞上。幸好上山的火车刚出站没多远，速度还不是很快，白崇禧急忙跳出车外，这才幸免于难。此次事故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不得而知。不过以后白崇禧行事更加谨慎，没事绝不轻易外出。

还有一种说法是，白崇禧在夫人去世之后，为了排解忧伤烦闷，与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发生恋情。年近古稀的他去药店买壮阳药，被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的特务得知，买通大夫给他开了一帖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从药中得力，与张小姐频繁往来，终于在1966年12月2日这天发生悲剧，死于"马上风"。副官发现的时候，白崇禧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

另一种说法则是白崇禧死在卧室的地板上，遗体周身发紫，不像自然死亡，睡衣和床单也都被撕烂了。而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翼而飞。

白先勇：我想，以客观环境来讲，没有必要。毕竟那个时候，李宗仁已经到大陆了，到北京了，也没有特殊的事件，台湾岛内也没有任何的紧急的情况，我想他没必要对我父亲下手。况且要加害我父亲的话，

不必等到那个时候，我父亲一向有冠状动脉心脏肥大的症状。其实我们整个家族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也有心脏病，也开过刀，我哥哥心脏病也开过刀。我们整个家族都有这个遗传，有心脏梗死这个病。

曹景行：酒杯是怎么个说法？

白先勇：这个是传言，说是我父亲喝了一杯酒，酒里下了毒。为了不留下把柄，所以放在那里的酒杯不见了。我想如果要下毒的话，酒杯不会放那儿。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其实都是传言。有的说是药方什么的，我想不会那么笨吧，还留药方下来？要害一个人，有很多方法，都是很容易的。

曹景行：也有传言说是药酒有问题。

白先勇：不是不是。我父亲确实习惯晚上喝点药酒，那天喝的药酒大概还有一半剩在那里没喝完，怎么会有问题呢。

随着白崇禧的离世，蒋白之间的恩怨也落下帷幕。白崇禧死后，蒋介石是第一个前来祭拜的人。拜祭当天，蒋介石面带忧伤之色。他不但亲自题颁了“轸念勋猷”的挽联，以及“旌忠状”，还以“国葬”的规格为这位与自己恩怨纠葛数十年的“国军名将”送行。白先勇说，他父亲跟蒋介石之间很像汉高祖跟韩信，而他父亲始终认为，自己的一生所追随的是国民党，而不是蒋介石。

第四章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日子

讲述人　蒋孝严

蒋孝严，原名章孝严，蒋经国与秘书章亚若私生子，1942年出生于广西，由于出生于敏感时期，因此未能得到蒋家正式认可。蒋孝严出生后不久，母亲章亚若死于医疗事故。此后，蒋孝严与同胞弟弟蒋孝慈被寄养于外祖母家，之后全家移居台湾。直到外祖母去世，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但一直未能认祖归宗。

1964年，蒋孝严自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台湾『外交部门』工作，并获美国乔治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并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立法委员』。其间仅与父亲蒋经国有过一面之缘。2005年，63岁的蒋孝严在蒋孝武、蒋孝勇的支持下，才恢复蒋姓。

蒋孝严著有自传蒋家门外的孩子，被马英九誉为：『于叙情处，令人低回；于叙事处，使人神往；由于其经历宏富，观察深入，更有足供吾人参考学习者。』

蒋经国（1910-1988），字建丰，浙江奉化人，蒋介石之子。



15岁时，由李大钊引荐，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毕业后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被斯大林扣留在苏联当人质，下放到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蒋方良结婚，二人患难相守，情意深重。

1937年获准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主政赣南，颇受好评。其间与章亚若相识相爱，生下一对双胞胎，终因考虑到政治影响，二人不得不分开，一双麟儿只能寄养章家，从此天各一方。

解放战争后期，蒋经国到上海推行金圆券改革，并负责将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运台湾事宜。国民党迁台之初，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正式统筹台湾的情报治安工作，进入国民党内决策核心。

历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要职，并当选第六、七届“中华民国总统”。主政时期，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跻身“亚洲四小龙”。

晚年逐步开始自由化的改革，解除台湾地区“戒严”，开放部分台湾

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党禁、报禁，改革“国会”。

1988年病逝于台北。

曹景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姓，这代表了一个人和家庭、家族的关系，而这个姓也应该跟随一个人一辈子。但是蒋孝严先生有点不一样，他在年过花甲后，才得以恢复本姓，认祖归宗。

1942年，孝严、孝慈这一对孪生兄弟出生在广西桂林。由于他们是非婚生子，由于他们和当代中国最显赫的家族——蒋家的特殊关系，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兄弟两人就注定了要经历传奇般的人生。

蒋孝严说，他的最初记忆是从台湾新竹开始的，他跟弟弟孝慈和外婆一大家人住在一幢小小的两层楼里面。这是最普通的所谓外省人的家庭，他们做着小生意，赚的是微薄的收入，过的是简朴的生活。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个家里看不到孝严、孝慈的父母亲。

蒋孝严：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看到其他的同学，都是自己爸爸妈妈来送便当，我们是外婆送饭盒。同学们就说，哎，你爸爸妈妈怎么没有来送饭盒？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回去问外婆，我们的爸爸妈妈呢？

外婆讲得很简单，说你爸爸在大陆做县长，1949年来不及逃出来。你妈妈到台湾来了，然后又回去了，陪着你爸爸。先前逃难的时候，家庭四分五裂的，妻离子散的，很多嘛！她这一讲，我们没有任何好怀疑的，所以她就这样搪塞过去。

孝严、孝慈这一对小兄弟来到台湾的时候只有7岁，外婆和二舅章浣若给他们登记的名字分别是“章孝严、章孝慈”。并且故意把孝严的出生日期提前了一年，目的是掩盖他们是孪生兄弟的事实。即便如此，总还是会有人把孝严、孝慈与位于台湾权力巅峰的蒋家扯上关系。

蒋孝严：在新竹东门“国小”念书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去，走的是学校后门。后门有陆军眷村，我们经过眷村（军人家属住宅区）的时候，就听到有些老先生说，委员长的孩子，委员长的孩子！我们听到委员长这个词，那时候也听不懂，两三次以后，就回去问外婆。

外婆说胡说八道，不要听这些人发神经，讲一些神经病的话，我们

也就不当一回事，但是也有记忆。在初中的时候有些老师偶尔会提到，说这两个双胞胎跟蒋家有关系，回来又问舅舅，他说不要去听这些风言风语，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世总是觉得里面有很多的疑问。

大人们语焉不详的说法不能打消兄弟俩的疑虑，他们渴望弄明白自己的身世，见到自己的父母亲。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出生后没多久就已经去世了，而他们的父亲，正是在台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蒋经国。

〇她看到经国先生并无纯中国血统的孩子，自愿以身相许

1939年，蒋经国被调往赣州，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刚一上任，蒋经国立刻开始筹谋建设新赣南。为了表现赣南的新气象，他在会议室墙上贴上两条大标语，一条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解除痛苦”，一条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谋取幸福”。又在赣州城的四个城门挂上意见箱，收集群众意见，在专署设立“民众询问处”，接待群众来访，并多次出巡，实地考察了解情况。

由于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深入民心，他也赢得了“蒋青天”的称号。而他的种种举措，更是深深吸引了很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闲居在家的章亚若也萌生了到专署工作的念头。

通过招聘考试，章亚若被录取为专署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对待这份工作，年轻的章亚若十分用心，她不仅把图书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还写了许多革命标语贴在墙上。这些举措，都给常来借书的蒋经国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

不久，在专署举办的一次晚会上，章亚若演出京剧《投军别窑》。精湛的表演让蒋经国大为欣赏，不等晚会结束，他就找到章亚若，鼓励她将这出戏演到前方去，激励民众投身到抗日的前线。几天后，蒋经国又把章亚若调到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做文书，使她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的专长。

1939年11月，蒋经国主持开办赤珠岭青干班，章亚若也进入青干班学习。由于蒋经国兼职太多，青干班又是刚刚创办，事务繁多，经过学员一致推举，能力出众的章亚若成为蒋经国的助手。据青干班的同学回忆，章亚若“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是当时班上的灵魂人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

朝夕相处当中，蒋章二人的感情与日俱增。1939年12月12日，日军轰炸浙江奉化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遇难。这一噩耗让蒋经国悲

恸不已，他在溪口守灵直到过了“三七”才回到赣州，还亲手在毛福梅遇难处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立碑纪念。回到赣南后，美丽温柔的章亚若成为蒋经国莫大的安慰。为了感谢章亚若带给自己的温柔慰藉，蒋经国将毛福梅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了章亚若。章亚若视如珍宝，一直带在身边。

从赤珠岭青干班毕业后，蒋经国安排章亚若到专署秘书室做助理秘书的工作。去各县巡视的时候，也常常带上她。蒋经国甚至还将自己当年留苏时的日记手稿也交给了章亚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互相取了爱称：慧风（蒋经国）、慧云（章亚若），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的含义。蒋孝严说他念高三的时候，有一次在新竹家中看到一封二舅章浣若写好却没有寄出的信。这封信开头写的是“慧师吾兄钧鉴……”信封上的收信人却是“退辅会（国民党军退除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蒋主任委员经国先生钧启”。这也间接证实了蒋章二人之间爱称一说是存在的。

曾经担任蒋介石秘书，后来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也告诉蒋孝严，在蒋经国去世前一年，有一次他去探望蒋经国。蒋经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章亚若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还因为章亚若看到蒋经国并无纯中国血统的孩子，所以自愿以身相许。

蒋孝严：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于男女私情而已。

尽管这段恋情并未公开，但二人并不避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出现。蒋经国经常借走访下属之名到章亚若家来。每次来，蒋经国都会给章亚若的侄儿带一些玩具、糖果，还会和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说几句家常话。蒋孝严说，外婆曾经告诉他们兄弟俩：“蒋经国在赣州，每次只要有空，大多会在吃过晚饭的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看亚若，也和我聊聊天。”

据说，为了让这段恋情得到认可，蒋经国认为要先让章亚若和自己的俄国妻子蒋方良搞好关系，因此他特意安排章亚若去教蒋方良唱京剧。不知内情的蒋方良与章亚若确实相处甚欢，在她去重庆探视公婆的时候，还让章亚若代为照顾两个孩子。

1941年夏天，章亚若怀孕了。此时既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蒋经国在赣南最困难的时刻，由于赣南新政得罪了太多人，他的许多政治

对手一直在重庆告状。听闻章亚若怀孕的消息，蒋经国既欣喜又忐忑，他将章亚若的事情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为免授人以柄，训示蒋经国安排章亚若到其他地方秘密待产。于是，章亚若在闺中密友桂昌德的陪伴下，前往桂林。

1942年正月，章亚若在桂林生下一对双胞胎。为表纪念，章亚若将住处所在的丽狮路名字拆开，给两个孩子起乳名为“丽儿”“狮儿”。一周后，蒋经国赶来桂林探望，欣喜之余，给双生子另外起了小名“大毛”“小毛”。由于奶水不够吃，战时又物资匮乏，蒋经国便从美国设在重庆的援华物资供应机构购买美国产的克宁奶粉救急。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又带来了蒋介石钦定的学名：孝严、孝慈，因为蒋家第三代以“孝”字辈命名，但他们只能暂从母姓章。从此，双胞胎兄弟正式取名为：章孝严、章孝慈。蒋经国曾经答应章亚若，一定会让两个孩子认祖归宗。不想，这一诺言始终未能实现。

1942年8月15日，章亚若因为身体不舒服，步行到医院去就医。据说在医院里面，有一位神秘的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几小时之后，她就命赴黄泉了。

几十年来，对章亚若的死因众说纷纭。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章亚若是被人谋害的，但是究竟谁是凶手，谁是主谋，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章亚若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死于戴笠手下军统特务的毒针；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派人处死了章亚若，章亚若的好友桂昌德则是帮凶。

面对各种猜测，蒋孝严相信，凶手是父亲蒋经国某些非常亲近的下属，这些人为了维护蒋经国的声誉，便自作主张杀害了章亚若。蒋孝严还相信，父亲蒋经国和祖父蒋介石，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也不便声张，只好不了了之。于是，章亚若之死至今还是一桩无头公案。

“母亲之死并非一人所为，系一位极端聪明的人出于护主动机，另找了三四位同伙来进行。主谋指出先母在桂林产子之后，即以蒋夫人自居，且经国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事实上，在当地政治圈已引起谈论，并传到赣州，所以在事态扩大前，必须予以‘铲除’。这一番话，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与配合。几经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医院动手；而让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这项任务在短短几天当中，即交付桂林的同伙利落地执行完毕。原本考虑两个娃儿也不放过，但唯恐引起经国先生震怒而缩

手，况且后果冲击太大，可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反而难以收拾，才放过两条小生命。”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不过，章亚若蹊跷的死因，却给她的家人留下了厚重的阴影。在蒋孝严幼年的记忆当中，家里的大人总是对医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蒋孝严：外婆身体不好，有肾脏病，然后又有点咳嗽，肺也不很好，曾经送到医院去过，到新竹“省立”医院住了一晚。但是舅舅很快就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回来以后，舅舅就自己看一些书籍，看一些报纸，再去买成药来治病。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舅舅跟外婆对医院有恐惧，尤其是对打针害怕。特别叮咛我们，不要随便上医院，不要随便打针，尤其不要打血管针，这是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强烈的一个印象。

章亚若的长兄章浩若本是军人，从军中退伍后，蒋经国安排他当了贵州铜仁县县长。母亲章亚若去世后，外婆带着孝严兄弟俩，来到贵州，和大舅生活在一起。为了掩人耳目，大舅章浩若和大舅妈纪琛就成了孝严、孝慈户口上的父亲、母亲，使得年幼的兄弟俩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童年时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接收东北，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东北负责与苏联的“外交协调”工作，结果铩羽而归。回到南京后，苦闷的蒋经国给周锦华去信，要求见见两个孩子。于是大舅妈纪琛带着孝严、孝慈来到南京。这是章亚若去世后，兄弟俩第一次见到父亲，但终因年龄太小，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这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于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后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于和父亲在什么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的什么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这一段南京父子会面之行，大舅妈纪琛亲口在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于洛杉矶寓所见面时，向我和美伦[21]转述。”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〇外婆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我跟我弟弟当时难以置信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时，蒋经国也没有忘记他的这两个孩子。在他的安排下，1949年5月，兄弟俩跟随外婆、二舅章浣若、大舅妈纪琛搭乘运送黄金的军舰来到台湾，定居新竹。“父亲在万般困境里，并没有逃卸为人父的责任。”不久，纪琛因为思念没有来台的丈夫章浩若，再度返回大陆。自此，兄弟俩与外婆、二舅相依为命。

对于孝严、孝慈兄弟来说，在台湾，外婆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依靠。这个缠着小脚的老太太，“在大陆时，虽非大户人家，至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却要抛头露面地照顾店面，而且是卖杂货、摆香烟摊和委托行，对年逾花甲的外婆来说，委实难堪，她还是努力去适应”。

然而和生活上的辛劳相比，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里，外婆所拥有的是太多的疾病和太深的恐惧，还有关于兄弟俩身世的这个太大的秘密。

蒋孝严：从到新竹开始，我跟我弟弟还有外婆，我们三个人睡在一个房间，我跟我弟弟睡比较大一点的竹床，我外婆睡一个小的竹床，房间很小。我们上初中，初三以后，半夜有时候会被外婆哭泣的声音吵醒。我跟孝慈半夜听到外婆哭，我们就偷偷张开眼睛，她在一个孤灯下面，在那边掉眼泪，在那边抽搐、饮泣。我们不敢起来，我们又假装睡着，重复了几次。

有一天我们实在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起来跑到外婆旁边，说外婆，天这么冷，要注意身体。还帮外婆把她的破棉袄披在身上。想安慰她几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看到她手上拿了一张照片，在那边低声地哭泣，我们就问说，这是谁呀？她说，你们不要管。

曹景行：那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身世的呢？

蒋孝严：外婆过世之前，有一天早上，叫我跟孝慈坐在她床沿边上，因为我们连椅子、凳子都没有，所以就坐在她的床边，她把整个的故事给我们讲了一下。

曹景行：那个时候病已经蛮重了？

蒋孝严：病已经蛮重了。

曹景行：是哪个月份，还记得吗？

蒋孝严：是冬天，叫我们坐在她床沿边上，手上拿了一张照片，跟我还有孝慈讲，那时候她等于是边哭边叙述的，我相信她经过了一些挣扎。她跟我们说，大毛、小毛，这张照片就是你们的母亲，前几次你们看到我晚上起床，实际上就是想念你们的母亲。你们母亲在你们6个月大的时候就过世了。

然后她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在赣州跟你母亲认得的。反正只提到很短的一些叙述，我跟孝慈当然难以置信。蒋经国这三个字——那时候我在新竹中学念书，我们有“青年反共救国团”，救国团的主任就是经国先生，所以提到说自己的父亲是经国先生，我跟我弟弟当时难以置信。我跟外婆说，怎么会这样子，连问了两三遍。

外婆说，你们也不要多问，外面也不要讲出来，任何人问到你们都不要提。她说你母亲的命很苦，所以我常常会想到你母亲，而且你母亲死得很惨，她用“很惨”这样的词语。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数十年来，章家大小有多数的时间，过的是一种‘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身世。还记得在念初中时，听到二舅和外婆多次当面否认别人好奇的询问：‘这对双胞胎是不是蒋家的骨肉？’他们回以极不自然的笑容，却明确地说：‘不是，不是……不要乱讲。’我不懂这些对话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挂在他们脸上那种尴尬的表情。”

“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后，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于万一的。”

“她（外婆）不仅没有因为女儿为经国先生生了一对双胞胎，而攀龙附凤地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的，这一层关系带给她的，却是一连串心理上的惊吓、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质生活上的煎熬与痛苦。有几次在她对许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时，曾幽幽地跟孝慈和我说，

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后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〇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

外婆内心的煎熬让兄弟俩不知所措。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其实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地照顾着他们。

王升是蒋经国创办赤珠岭青干班时的学员，也是章亚若的好朋友，更是蒋经国与章亚若爱情故事的见证者。来到台湾后，他已是军方的“陆军二级上将”，掌管权倾一时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20世纪50年代，身居要职的他，时常轻车简从地出现在小城新竹，来完成一个秘密的任务。

蒋孝严：王升王将军，每次过年的时候，他都会到新竹来，开一部吉普车，停在离我们住的远一点的地方。他没有停到门口，怕引起注意，因为吉普车有军字牌照嘛，然后他再走过来。除了过年的时候来拜年，端午节、中秋节这些节日，他也一定会来。他来的时候，我们生活就不错。我记得我们念初中的时候，他一来，第二天就有鱼有肉，生活就改善一些。

后来有段时间情况就很差了，不仅菜不好，连米都没有了。我记得我跟孝慈还到东门市场——就我们住的附近，到米店去赊米，10斤、20斤的，跟老板说下次钱来了再给你们。因为新竹也不大，大家都认得。生活比一般人简直是要差很多，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

20年代50年代中期，二舅章浣若与王升因故闹翻，从台北送来的生活费由此中断。而此时，章浣若的生意又不断遭遇挫折，只能凭借微薄的积蓄，养活一家十几口人。这一段艰辛的时光，被蒋孝严称为“难民岁月”。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于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三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

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后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辞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借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作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三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后，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做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木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三四坪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于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后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于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目失明，直到二〇〇一年过世。临终前，他内心会不会还在奇怪这次‘逃难’，怎么会这么久还没结束？

二舅舅工作无着，一事无成，孩子却接二连三地生出来，他后来一共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在新竹中央路上，全家人数最高峰曾达到大小十三口之多，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可以用。光要解决每天一大早洗脸刷牙，就颇费周章，后来只好各自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痰盂来接漱口水解决。

另外，整幢两层楼的房子，只有楼下一间木板钉成的蹲式简陋茅房，如果不用几个夜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多人的如厕问题。每隔两个星期，还要找专门挑粪的乡下农夫，推着水肥车来挑走快要外溢的粪便，事后这位农夫好像会支付五块钱给二舅，可能是买水肥的费用。每当这位晒得黝黑来掏粪的老农夫出现时，整幢屋里至少一个多钟头会臭味熏天久久不散，连路人都要掩鼻而过。

我们连一间所谓的浴室都没有，孝慈和我只有在靠屋后的厨房旁，将原来装肥皂用的空木箱一个个堆起来，做成简易的隔间，这些小木箱原是二舅在卖烟酒和肥皂等杂货时剩下来的。要沐浴时，就把一个铝制的洗澡盆，摆在两排堆得一个人高的空肥皂木箱背后，然后用水壶倒进冷热水冲匀，人就坐到里面洗澡。一九六一年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么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么糟。

那十几年所过的日子，真只能用‘难民生活’来形容。经过了那段人生路程，再怎么样清苦的日子，都难不倒我，对任何低劣的物质条件，我都会很快适应而甘之如饴。同学们都觉得当兵很苦，在成功岭的预官训练期间，很多同学叫苦连天，但对我来说，比起新竹的状况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餐厅用膳、有床铺睡觉、有浴室洗澡、有干净的厕所如厕，我倒觉得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蒋孝严：以前我们住的那房子现在是一家杂货店。都改过了，都重建过了，号码也换了。

曹景行：那您还想得起来自己住哪一间吗？

蒋孝严：想得起来，我住二楼那一间，印象很深刻。整幢房子很小，没有客厅，也没有餐厅，连在一起了。后来没法住了，上面破了一个洞，从楼上面可以看到楼下，下雨的时候还会滴下来。

20世纪50年代，整个台湾的经济都非常困难，新竹地区更是贫穷，小孩子上学都是打赤脚。虽然生活条件不好，外婆还是想办法给兄弟俩一人做了一双黑布鞋，让他们能够穿着鞋去上学。衣服有破损，外婆都会及时缝补，绝不让兄弟俩穿着有破洞或脱线的衣服去学校。

孝严、孝慈也十分懂事，明白家里的困难，从不向外婆、舅舅要零花钱。当时正是贪玩的年龄，他们总是自己找玩具玩。蒋孝严回忆说，他们最常玩的是打弹球、打纸牌，或把细竹子削下来，中间掏空，一头插上细筷子，再以纸团做子弹，就变成玩具手枪；要不然就将铁罐当足球踢，有时，也用弹弓去打鸟。兄弟俩还喜欢游泳，没有钱去游泳馆，就每天中午到附近小溪里去游泳。即使生活很艰苦，他们依然懂得苦中

作乐。

“假设父亲真的晓得两个流落在新竹的儿子，竟然会三餐不继地过了好几年，他该会怎么想？又该会多么自责？他一定会气得去严词责备王升或宋时选。这种生活上的困顿，一直到我和孝慈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搬离新竹，有了自立能力后才渐次告结。”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1962年，外婆周锦华去世。也是在这一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孝严就读外文系，孝慈就读法律系。

蒋孝严：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连中午到自助餐店去吃饭都没有办法付钱，就记账。这个黑板上面常常有我跟孝慈的名字，而且欠一餐就打一杠，两餐打两杠，就用正字做记，像现在开选票一样的，我们的正字特别多。后来我们在大学自己找家教，利用下课的时间去教书，换一点外快，逐渐地才勉强地度过。

注册的时候没有钱交学费，二舅舅没有办法把钱汇过来，我们就跑到注册处申请缓交。我特别感谢有位姓申的教授，他出面替我们担保，说一定会补交注册费用。这种日子在高中、大学都是非常多的，对我跟孝慈来讲，可以说都是在清苦两个字当中度过的，不过现在回头想想还是蛮好的。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亲爹亲娘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来得不圆满和孤单得多，更不能去和蒋家其他几位同父异母兄弟相较。母亲早逝，又见不到父亲，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带大，几十年来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难处。除了要挣扎图存，更要去扭转起跑点上的劣势，还要有决心去把人生中许多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从小就自觉和同龄的孩子有许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恶劣境遇反而激发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绝不允许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会有邻居相信，那个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会当上‘部长’，还会出任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邻居到家里来串门子，向外婆当面夸奖我和孝慈说‘您这两个外孙长得好聪明，气质很不一样’，外婆就显得十分开心。她多么希望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有出息，让蒋家人看重。然而，在她过世时，我们大学都还没毕业，她没来得及看到我

们日后的成长和成就。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一共养育了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和小儿子蒋孝勇。蒋经国性格随和，喜欢热闹。在台北市长安东路的家里，他经常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则满屋乱跑。

而身为“王子皇孙”，蒋家几个子女的一举一动向来是整个台湾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那段患难与共的日子出生的，从小就受到父母特殊的关爱。因身为长房长子，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万事定于一，元者为大”，受到了祖父和父亲的悉心栽培。蒋介石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带他一起散步。然而，对于长辈的期许和厚望，蒋孝文并不理解。尽管蒋经国对他管束十分严格，但他依然成为了一名标准的纨绔子弟，是当时台湾地区有名的“混世魔王”。

念初中时就听人提过‘蒋孝文’，在报纸和杂志上也看过他和祖父在一起的照片。他在世时，我不曾和他见过面。进到大学后，就听到同学间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小道故事，绘声绘影地绕着他特殊的身份打转。

孝文长得挺拔帅气，聪明好动，像所有的长孙一样，总是受到祖父的特别宠爱。在新闻报道仍然受到钳制的时代里，有关蒋家的动态几乎都是由‘中央社’或‘军闻社’统一发稿，包括家居生活照片在内，在报上不时能看到孝文英挺地站在祖父身旁。他陪着祖父登上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旗舰的镜头，让人印象深刻，有人相信祖父一度对他的期许蛮高的。

……王升说，经国先生对子女的教养从不溺爱，只要发觉求学中的孝文有过分逾越情况，比方说有次半夜偷偷地把家中吉普车开出去而闯了祸，险些闹出人命，经国先生气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甚至用皮带抽打。

王升表示，祖父曾考虑培植孝文在军中发展，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念西点军校或弗吉尼亚军校，但均未能如愿。最后一九六〇年才安排他到了加州伯克莱分校念商，不久因故又转学到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均未念毕而中辍返台。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蒋孝严：跟其他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来讲，虽然那段时间有天壤之别，他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缺。你说我们羡慕嘛，很难说不羡慕；你说嫉妒嘛，我们当然也不会怎么嫉妒，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日子反正是要熬过去的；你说不平嘛，我们在大学时候看到同父异母兄弟的那种生活情况，心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不公平的感觉。尤其孝慈，他比较内向，有的时候我们谈起来，还会说，怎么会这么不公平？但是这也激励我们努力，激励我们加倍地奋发。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蒋孝严在“外交部”档案处接触到一份有关蒋孝文的专卷。里边详细提到，1960年1月23日，时年25岁、在加州大学读书的蒋孝文因为开车超速被沃克兰法庭判刑三天，后来由叶公超出面向美国国务院交涉，才以罚款解决。

“细读那份专卷，我只有一个感觉，孝慈和我都是蒋家后代，但我们真是活在另一个世界，在物质领域里和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羡慕或嫉妒过他们所拥有的。虽对自己的境遇深感不平，同样是经国先生的孩子，为什么孝慈和我为了起码的生活的维持，还要辛苦地挣扎，他们却生下来不是龙就是凤？我们只有自我鼓励，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后段的冲刺才更加重要。”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〇我们两个人就像两个“小虾米”，蒋家就像个“大鲸鱼”

面对同父异母兄弟与自己天壤之别的生活，孝严、孝慈只能无奈地做一个旁观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两兄弟想与父亲见面、认祖归宗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上大学之后，兄弟二人和王升的接触又渐渐多了起来，有时他们会去王升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家里吃饭。孝严、孝慈多次提出希望见父亲一面，然而这样的愿望总是落空。

蒋孝严：我们想的是，我们要跟父亲见个面，要让父亲知道一下我们的情况，也让他高兴一下，两个孩子还是很努力、很上进、很用功。我们并不是说想去跟他要什么，我们不是，从来没有这个念头。我们只是想跟父亲见面，是儿子对父亲的这种思念，因为在媒体上常常看到很多报道，很想见一面。为什么不能见面？我们跟王升也提到过，我们希望见个面，但是他都说现在不好安排。

曹景行：那您给您父亲那些信，他有没有一些回应？

蒋孝严：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到现在我都不敢确定，我请王升将军转达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信，他是否直接转达到父亲那边，我都不敢确定，我现在没有答案。王升将军现在还在，我有时候还去看他，这种话我不能启齿，我不好问，我只能相信他替我转达了，但是我没有直接从经国先生那边得到任何的回应啊。

甚至于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孝慈也讨论过我们认祖归宗的问题。因为外婆跟我们提到我们的身世的时候，就讲到说母亲希望我们要回到蒋家，因为经国先生答应她这两个孩子要回到蒋家，这我有很深的印象。

外婆过世以后，家里面的情况又是那样的困顿，我们回蒋家的念头是有，可是怎么做？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来进行。到念大学，我跟孝慈谈到回蒋家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没有答案啊，这很无奈，就是没有结果。等到了各自的职场，有工作了，我们也只能说希望尽快跟父亲见个面，什么时候能够认祖归宗。不过在当时来讲，这几乎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

两个人就像两个“小虾米”，蒋家就像个“大鲸鱼”啊。

蒋孝严的人生理想是从事对外交往的工作。1968年，他通过了“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正式进入对外交往的工作领域。弟弟孝慈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赴美留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并在学界得到了认可，成为著名的法学专家。

曾经有人怀疑是特殊的背景给了孝严、孝慈成功的机会，对此，蒋孝严说：“在我的‘外交’生涯的历程中，鲜为人知的是，家世常常是阻力，而非助力，每次内部调升或外放，都因为高层人士考虑到我的家世而有所延搁。”据蒋孝严回忆，孝慈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必须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打工赚钱来补贴学费。“他先后在餐厅先做带位生（Bus Boy），再做服务生（Waiter），也在仓库佩着手枪担任过夜间保安，大热天还到工厂搬钢条，搬到手套破洞、手掌破皮，流出来的血将手套都染红……孝慈就是经由如此近乎折磨的过程，才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可以说，兄弟二人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尽管兄弟俩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但是希望与父亲见面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

蒋孝严：一直到我们有了工作，进了“外交部”，孝慈到“国外”念书回来，我们结了婚，跟王升还要求，说希望跟父亲见面，但是都没有结果。王升都说，不很方便。那我们能讲什么？尤其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第一个孩子是女儿，我跟王升讲，我应当去看看父亲，他应当看看我，我太太，他的儿媳妇。而且他又有孙女了，应当可以让他更高兴。孝慈也结婚了，我说我们两家一起去，跟父亲见面。

我这种要求提出来，他说我来考虑一下，可是过了几天，答复还是说不方便。我们也尽量想办法去理解，因为毕竟经国先生在“政府”里面负有责任，有他的困难，还有他自己的家庭。我们总是设身处地去想这些事情，但是你说心里面能不失望吗？我们当然失望，心里面当然有挫折，可是我们还是吞下去。

孝慈这方面受的压抑就比较深，所以他身体一直就比我差，血压一直很高。他从美国念完书回来，我有几次接到他朋友的电话，说他喝醉了，要我开车送他回去。然后他那朋友跟我讲，他跟他们聚餐的时候，喜欢跟朋友们干杯，然后带了几分醉意，他就去点歌，要唱歌。那时候

台湾正好流行点唱机，每次唱，他就唱一首，他的招牌歌《心事谁人知》，就是谁知道他的心事。唱到后来他自己掉眼泪，朋友们都知道他心事重重。所以这件事情在内心来讲是有压力的。

（孝慈）进小学后一直到初高中，身体都还算不错，体力比一般的同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个性也算开朗。直到外婆向我们透露了有关母亲的事情后，孝慈才慢慢变得内向寡言，对外甚至有点羞怯。……孝慈眉宇间，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愁，他的身子显然因为长期的郁闷，无形中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不至于每天郁郁寡欢，但除了有时在一般假日和三五位好友偶尔聚叙聊天外，平常在比较热闹的场合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内心承受的苦闷，好像愈来愈重。

他原本在大学交了一位中文系的唐姓女友，关系算是密切，我也见过面。只是对方家境富裕，一定要女儿毕业后就出去留学，而孝慈无法确定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有能力留学，他的初恋因而被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件事对他是一次不轻的打击。

孝慈每次在餐会上都非常随性，酒量不错，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带醉意，就会情不自禁地固定点唱一首他很喜欢的歌，唱到激动处就会落泪，然后边流泪边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做《心事谁人知》，在场的朋友看到这情景无不动容。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爱唱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又在想些什么。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为他写的一样，道尽了他的心酸。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和孝慈相比，蒋孝严无疑是幸运的。几年之后，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遇到了父亲蒋经国。

蒋孝严：我法文讲得很好，我还做过严家淦先生——他是“副总统”，我做过他法文的传译。我在“欧洲司”主管对欧事务，包括比利时、法国、教廷这些业务。

每年教宗的生日，教廷有一个酒会。我虽然是科员，可是主管这个事务，也应邀参加这个酒会。这样，在1972年的教廷的酒会我看到父亲，他远远地在那里，那时候他是“院长”。因为教廷办酒会的地方也不是很大，各级的首长都在，所以当我看到他时，尽管我心里面真想过去叫他一声爸爸，可是我也不敢这么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目光有接触

一下，我也不知道他认出我来没有，我也不愿意让他有任何的尴尬，所以见到他，我反而从后面退出来，避开他的视线。就这么一次，公开地比较近距离地见过。

〇孝武旁边的人注意到了，对我们就有点防范

尽管兄弟俩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身世，20世纪70年代末期，孝严、孝慈与蒋家的故事还是逐渐被媒体披露出来。从此，“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是蒋经国的儿子”，成为台湾尽人皆知的秘密。

蒋孝严：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台湾的新闻还是受到钳制的，一些报道——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只有党外，党外的杂志对一些内幕比较喜欢。经国先生的孩子谁谁谁，孝严、孝慈现在境况怎么样怎么样，就喜欢写这些，好像抓到一个大题材，所以后来坊间慢慢才知道。这是到70年代末期，台湾才知道这些。

因为我们从来不跟外面提，我跟孝慈都只是自己清楚就好了。我是1977年回来的，孝慈比我还早半年回来的，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党外杂志的报道，孝武旁边的人注意到了，对我们就有点防范。我想这个也很自然，因为我看了很多历史故事，同父异母，甚至于亲兄弟之间的这种问题是很正常的。那旁边人说，哎，你看孝严、孝慈他们的表现不错，你要留意啊，不要等他们将来成了气候，你就来不及了。我想可能旁边是有一些人讲这些话。

所以孝慈在学校，以前常常发表一些意见，有时候还上广播公司、上电视评论一些事情，或者就司法方面写一些文章，后来“中广”居然下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决定，不能有孝严、孝慈的声音出现在“中广”的节目里面。那时候孝武是“中广”的总经理。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曾经受到排挤。

自幼生活环境便有着天壤之别，蒋经国与蒋方良的三个儿子和孝严、孝慈兄弟俩在表现和人生境遇上也是截然不同。

蒋孝文在留学期间与反清英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回台后在祖父和父亲的安排下开始从政，不料却染上酗酒的恶习，常常在酒后惹出事端。有一次甚至出了车祸，将门牙全部撞断，只好装了一口的假牙。为了让儿子戒酒，酷爱饮酒的蒋经国甚至以身作则，带头戒酒。然而蒋孝文积习难改，在1970年因为饮酒过量导致血糖过低昏迷，急救苏醒过来后，脑部受到损害，智力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此后的十几年，蒋孝文基本上一直缠绵病榻，全赖妻子徐乃锦悉心照料。

蒋孝武出生于抗日战争末期，自小便古灵精怪。蒋介石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蒋家为他取名“孝武”，也是希望他能在军事上有一番作为。

和哥哥蒋孝文一样，蒋孝武自小便十分顽劣，不爱读书。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全班最低。蒋介石将他送到德国学习军事，但是他自作主张改学了政治。等他回台湾时，蒋孝文身体状况已经出了问题，于是他便被作为接班人培养。蒋经国为他铺好了一条从政之路，让他在短短几年便进入好几个核心部门工作，并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

就在蒋孝武仕途得意之时，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家中遇刺身亡。一时之间，舆论一片哗然，矛头指向台湾当局。迫于压力，涉案的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和竹联帮头领陈启礼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又有舆论宣称蒋孝武才是幕后元凶。蒋孝武的名誉被毁，蒋经国无奈，只得将他派往新加坡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蒋孝武在政治上再也难有作为。

蒋孝勇是蒋经国最小的孩子，他出生于解放战争末期，也是蒋经国最为忙碌的时候。因此，来到台湾后，他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宠爱；就连蒋介石也是一有空闲，就给他逐字逐句地讲解《论语》《大学》《中庸》；在几个孙子当中，宋美龄更是最为疼爱他。

16岁时，蒋孝勇放弃考大学，考入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学生班，打算投身军界。此举让蒋介石大为欢喜。蒋孝勇在《哀思与憾事》当中曾经回忆了祖父对他的期望：“忆及当将要离开台北到凤山报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书房，除勉励之外，还打开皮包，拿出钱袋，数之再三，给了我两百块钱，说‘你独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这是两百块钱，钱包里我也有这么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应用’。”

在军校，蒋孝勇的表现非常优秀，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然而，一年级下学期，他在一次夜间军训时不慎扭伤了脚。这次脚伤让他一辈子都只能依靠两根钢钉辅助行走，失去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从而也失去了在军界发展的机会。迫不得已，蒋孝勇只好改读台大政治系，毕业后在父亲的栽培下投身商界，从事党营和公营事业。

意外的是，蒋家三个孙辈权力之路的这种不顺畅，反倒使得蒋孝严与几个异母兄弟的关系逐渐和缓。早在大学三年级暑假，蒋孝严到政工干校接受预备军官的基础训练，刚刚高中毕业的蒋孝武也来参加，二人被编在同一个连队和同一个小组。据蒋孝严回忆，有一天开小组会时，蒋孝武一时无聊还帮蒋孝严画了一张像。这是兄弟二人第一次接触。

1986年，因为受“江南案”牵连，蒋孝武被派往新加坡。此后的一段时间，蒋孝严和蒋孝武见面的机会逐渐增多。

蒋孝严：至于孝武，那见面更频繁。他一到新加坡去，我等于是他的长官——我是“外交部次长”，主管亚太事务，主管新加坡。他每次回来我都去接飞机，我们处得非常好，很快就找回以前失去的那种兄弟的感情。他到新加坡担任代表的时候，邀请我还有美伦，我们全家到那边去过年。他从新加坡调到东京做代表，又马上邀我们全家到东京跟他一起过年，我们处得很好。

“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几位司处长在国宾饭店二楼为他接风，饭前我俩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说有笑，非常开怀而亲切，在场采访的《中国时报》外交记者张慧英看在眼里，有感而发地问孝武：‘你们看起来聊得蛮开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驳她说：‘你错了，我和章次长不是’情同手足‘，我们本来’就是手足‘！’这是孝武第一次公开而自豪地承认，我们是兄弟。”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通过蒋孝武，蒋孝严也跟蒋孝勇建立了联系。1987年，蒋孝勇还通过旁人转告孝严，希望正式认他做哥哥。7月15日，二人在友人处聚餐，蒋孝勇当场叫他“孝严哥”。

“事后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美伦、孝慈和秦孝仪，他们也都很高兴。秦孝仪后来还告诉我，他曾把这件事转报了父亲，经国先生笑笑点点头，虽然没说什么，显然很愉快。秦孝仪说，看来孝勇这个决定，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经国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诚了。”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〇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跟孝慈很激动，泪如雨下，跪在那面磕头

在和几个同父异母兄弟的关系日趋和缓的同时，孝严、孝慈两兄弟内心还是有着遗憾，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办法见自己的父亲一面。

由于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对兄弟俩的存在一无所知，此事只能一再搁置。蒋孝勇曾经说过，他的母亲蒋方良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这个原名芬娜的俄罗斯女子，自从随蒋经国来到中国后，50多年间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追随在蒋经国的身后。如果说章亚若为蒋经国付出了生命，那么蒋方良则为蒋经国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蒋经国，她总是十分顺从，从不违背，甘心长期隐藏在蒋经国的光环背后。无怪乎在她50岁生日的时候，蒋介石写了“贤良慈孝”四个字送给她。宋美龄也曾经对她说：“女人当要强，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束缚自己？”她只是轻轻地回答：“我已经习惯了。”

为了避免对毫不知情的母亲的伤害，孝武后来在和孝严谈到“认祖归宗”的问题时，曾经请求他等到母亲百年之后再处理，孝勇也持同样的意见。对此，蒋孝严表示同意。

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0分，蒋经国因大量吐血，引发心脏衰竭而逝世。三天后，孝勇约见蒋孝严，告诉他：“父亲生前曾把你们的事告诉过我，而且对你感到骄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晓得。”

蒋孝严：他在过世后，孝武从新加坡赶回来，孝勇很快也跟我见面，他问我跟孝慈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说我们希望跟父亲见最后的一面，我们没有别的什么要求。然后他们说，当天不行，找一个适当的时候。

所以孝勇就在经国先生过世后，第四天晚上11点，安排车子载我跟孝慈一起到“荣总医院”，晚上到那边都11点半了，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只有几位七海的侍卫在那里。然后我们绕过灵堂，到冰柜那边——我父亲遗体放在冰柜里。孝勇把他抽出来，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当时我跟孝慈很激动，泪如雨下，我们跪在那里磕头。然后，我们再一起把他推上去，把他放好，我们再出来。这是人生很悲惨的一

幕，但是我们总算见到了最后的一面。这是孝武跟孝勇他们的安排。

1989年4月14日，孝文去世；

1991年7月01日，孝武去世；

1996年2月24日，孝慈去世；

1996年12月22日，孝勇去世；

2000年12月28日，孝严到浙江奉化溪口去祭祖；

2002年12月12日，孝严领到了新身份证，父亲一栏终于填上了蒋经国的名字；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去世；

2005年3月2日，孝严完成身份证改姓程序，正式恢复“蒋姓”。

第五章　孔令仪：家族最后的守望者

讲述人　孔令仪

孔令仪，1915年生于山西，孔祥熙与宋霭龄长女，人称『孔大小姐』。因外貌、性格均与孔祥熙相似，因此最受孔祥熙的宠爱。13岁离开山西，就读南京金陵女子中学，此后5年寄居蒋介石官邸，与『蒋、宋、孔、陈』家的各位长者十分亲近，更备受蒋介石夫妇的疼爱。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宋美龄迁居美国，此后30年间，孔令仪奉之如母，成为宋美龄人生暮年最亲近的人。晚年后，孔令仪更成为家族主要事务的掌管者。2005年，在捐献孔氏家族档案时，她表示『是非功过，由历史判断』。3年后的2008年8月22日，孔令仪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93岁。

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来自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指的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蒋介石执政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家族。由他们掌握的国民政府金融机构，控制了全国高达90%的存款，成为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毛泽东秘书陈伯达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由于四大家族之间荣宠共担、相生相依的关系，民间曾有顺口溜：“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但关于四大家族的说法，一直仅在大陆流行。目前，大陆学术界亦认为此种说法并不妥当，蒋、陈虽有家产，但从经济上考察微不足道；孔、宋是大财团，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虽然借助过国有资产，但仍然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的。

陈晓楠：“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仅存模糊的印象；然而，四大家族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孔令仪是孔祥熙的大女儿，在美国照顾宋美龄长达30年。

自从宋美龄病逝后，蒋、宋、孔的第二代，便只剩下孔家的大小姐孔令仪。2008年，孔令仪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93岁。她的离去，宣告了蒋、宋、孔家族的正式终结，也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1915年9月19日，山西太谷孔家大宅院里，降生了一个女孩。她一出生，便注定了不平凡的命运，她就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

孔令仪的父亲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家族从清朝时期便以经营票号起家。孔祥熙自幼进入教会学校就读，后来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因为毕业成绩优异，他被推荐前往美国留学深造。1905年，26岁的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孙中山，并很快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一心想要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

孙中山曾经告诉孔祥熙："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1907年秋天，受到孙中山教诲的孔祥熙毕业回国后，回到家乡太谷创办了当地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自任校长，教授历史、地理和体育，又聘请外国传教士授课，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式人才。"铭贤学堂"成为今天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

除了办学之外，孔祥熙还负责为孙中山募款，他的经商之路也由此顺利展开。由于当时火油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夜间照明的必需品，孔祥熙便成立祥记公司，以40万银圆的保证金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营"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火油起家，孔祥熙的生意越做越大。

〇家里很严格，我们一年只能出去两次，平时是不许去外面的

孔令仪：我父亲家是一直做生意的，在我们山西做了很多，内蒙古、俄国、纽约也去，生意做得很大。

除了父亲拥有雄厚的财力，孔令仪的母亲也有着令人瞩目的家世。她的母亲宋霭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的大姐，14岁时便赴美留学，还曾经出席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宴会，并当众质问罗斯福有关国家歧视与公民自由的问题，以聪明、大胆著称。

宋霭龄的父亲宋嘉树原是从美国回来的传教士，后来经商发家，与孙中山结识后，开始长期资助他的革命活动。由于父亲的关系，宋霭龄大学毕业回国之后，一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十分受孙中山的喜爱。在后来的相处中，宋霭龄更见证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惊世爱情。

“二次革命”失败后，宋氏一家全部跟随孙中山逃往日本。同年，新近丧妻的孔祥熙也来到日本，出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以此掩护孙中山等人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由此结识了宋霭龄，并与之相爱。1914年春天，两人在日本横滨结为夫妇。

1915年，袁世凯筹划复辟帝制，孙中山派遣孔祥熙夫妇回国，秘密从事反袁活动。二人以增设铭贤学堂大学预科的名义回到太谷，并带回了专门为学校购买的大批教学资料和教学仪器。由于反袁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孔祥熙转而专注于大学预科的筹备。

铭贤学堂开学前夕，原来聘请的一位柏林大学教授临时变卦，不愿来中国任教。这让本就师资力量不足的铭贤学堂陷入窘迫境地。无奈之下，从未执教的宋霭龄拿起教鞭走上讲台，担任英文教师和代理校长。据当时学生的回忆，宋霭龄执教时，已经身怀六甲，可是她坚持上课，直到孔令仪出世，才结束了这一段教师生涯。

对于自己的出生地太谷，孔令仪仅存模糊的印象，她只记得那是个有许多道门的大宅院，因为没有多久，她就跟着母亲宋霭龄搬回了上海，童年的记忆也从这里真正开始。

孔令仪：家里很严格，我们一年只能出去两次，平时是不许去外面的，只能待在家里，在花园里面玩，骑脚踏车。那个花园挺大的，大概有12亩地那么大，two acreages（两英亩），6亩一个acreage嘛。

记者：当时家里有多少用人啊？你知不知道？

孔令仪：那我不记得了，车夫啦、侍卫啦，很多人。

孔令仪1岁的时候，母亲宋霭龄生下了大弟弟孔令侃；4岁时，孔令仪又多了个妹妹孔令伟；6岁大时，小弟孔令杰出生。出于宋家的教育传统和孔家的家世渊源，宋霭龄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孔令仪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弹琴的经历。

孔令仪：我第一个幼儿园是法国的，后来不念了，法文都忘了。我母亲就叫我们到英文先生、法文先生那里弹琴。弹琴要我命的，每天要练一个钟点，又要去上课，我最不喜欢那个。我妹妹令伟弹得不错，在上海比赛的时候，她是第三名，她有天分，但是我没有。可是每天先生还会押着你练习，所以我很痛苦。但是母亲又是very strict（非常严格），今天要做什么，就一定要完成。比如说弹琴，不喜欢弹也要学。我两个兄弟也是嘣棱嘣棱学。我虽然学了8年琴，可是一个音符都不熟，因为我不喜欢。Youdont like something（你知道不喜欢一个东西的感觉）。you know（你也知道），你被逼着硬做的，总是不欣赏。

宋霭龄对孩子的严格教育，使得孔令仪对母亲充满了敬畏。相较于严厉的母亲，在孔令仪的心中，父亲是温暖的臂膀。然而，因为父亲总是那么忙碌，她能够见到父亲的时间，其实十分有限。

孔令仪：我父亲样子虽然看起来有点古板，但并不传统，不像一般中国的父亲这么严肃，跟我们小孩都是经常随便聊聊什么的。

记者：他也很幽默，跟你们在一起是很能说话的？

孔令仪：很能说话，而且他喜欢跟我们说笑话，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话。

〇他（孙中山）总是先喝汤，然后再吃饭……他比较西洋化

年幼的孔令仪不知道，父亲除了忙于商业经营，也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孔令仪出生的第二年，为了拉拢阎锡山，孔祥熙受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大力推行村政改革。1923年，他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赴东北结交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推行“联奉反直”的斗争策略。1924年，他秘密携带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潜入北平，策反直系干将冯玉祥……

这些忠实追随孙中山的行动，不仅让孔祥熙结交了一批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也为他在国民党内部未来的政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赴北平共商国是。谁知次年1月，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住进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此后，孙中山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只能暂住在外交官顾维钧家中休养。在此期间，孔祥熙一直守护在孙中山的病榻前，最终成为《总理遗训》的证明人之一。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总理遗训》

这一年，孔令仪刚刚10岁。初春，她和母亲来到北平，和姨丈孙中山作最后的道别。

孔令仪：他是肝病嘛，平常老是觉得疼，就摸这里。后来他到北京去看病，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那个房子里面。我们那时候住在北京饭店，他每天都叫我们去。

有一天，他大概病得很重了，他们就叫我们去跟他say goodbye（说再见）。那么我就去，他摸着我的手，我跟他say

goodbye，他说yes。孙科的两个儿子也去了，孙治平、孙治强也在那儿。他那个时候希望有办法治，但是没有法子治好。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在北平病逝，享年59岁。那一天，孔令仪陪伴二姨宋庆龄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夜晚。

孔令仪：我陪孙夫人，孙夫人什么东西都讲到总理，可能这样她心里觉得会有点安慰。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都叫我Baby，好像小名一样，家里人、上一辈人都叫我Baby。那么她说，父父——就是姨父了，她说："父父睡的枕头，你怕不怕？"我心里是有点怕，可是我说不怕不怕。好像总理用过的东西，她都很爱惜。

宋庆龄和孙中山这段婚姻发生在1915年。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宋霭龄便向孙中山建议由不久前刚从美国回来的二妹宋庆龄接替她的秘书工作。从此之后，宋庆龄便走入了孙中山的生活，并为他分担了许多繁重的工作，成为他有力的助手。孙中山也同样十分信赖宋庆龄，他将所有机要通信密码都交给她保管，一切对外联络工作也由她担任。

这份秘书的工作，让宋庆龄十分充实，她的心中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在写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小妹宋美龄的信中，她这样说道："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朝夕相处中，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孙中山与宋庆龄最终走到了一起。1915年6月，宋庆龄为了自己的婚事特地回到上海征求家人的意见，孙中山也与自己的前妻卢慕贞办理了离婚手续。不想，这桩婚事却遭到了宋家的极力反对。

孔令仪：她跟国父结婚，我grandmother（外祖母）他们都不赞成的，因为总理跟我grandfather（外祖父）是朋友，和孙夫人年纪差很多，所以家里不赞成。外边知道不知道我是无所谓，不过他们确实是不赞成的。

尽管家人一致反对，宋庆龄还是坚持与孙中山结婚，她说："我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对于女儿的固执己见，宋嘉树无能为力，只好把她反锁在房间里，并匆匆忙忙地为她选了一门亲事，对外界宣布“庆龄和一个名门子弟正式订婚”。对家人的干涉，宋庆龄十分愤怒。最后，她在女佣的帮助下，从窗户爬扶梯逃出，当夜乘船前往日本。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宋庆龄便与孙中山办理了结婚手续，从此一直陪伴孙中山，直到他去世。

宋庆龄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出人意料的，甚至是有些惊世骇俗的。不过，在年仅10岁的孔令仪眼里，二姨却是安静而内敛的，很难将她和当初那个为了爱情大胆抗争的女子联系在一起。

孔令仪：她不多讲话，有什么她（都）不大讲的，很内向。Not very sociable（不善交际）。

记者：跟蒋夫人比呢？

孔令仪：蒋夫人比较外向。孙夫人不大多讲话，跟家里人也是这样。

至于孙中山，孔令仪只记得这个留着两撇胡子的二姨丈，作风相当西化。

孔令仪：他是广东人，吃饭的时候，四个菜一个汤，他先喝汤。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先喝汤的，但是他总是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四个菜，上面有一条咸鱼盖在上面。他用的碗是暖碗，底下搁水的，上面搁菜。他比较西洋化。

〇我们几个学生在那里演讲，一大堆人围着我们。蒋公侍卫的车子经过那里，见一堆人围着我，以为出了事情

孙中山病逝后，孔祥熙受命担任治丧处主任，负责料理孙中山后事。不久，北方政局趋于混乱，于是，孔祥熙暂时退出政坛，前往美国游历，同时也为铭贤学堂筹集办学基金。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孔祥熙从美国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蒋介石走到了一起。

1927年9月，外祖母倪桂珍带着孔令仪到日本神户探望好友，就在孔令仪所住的温泉旅馆里，蒋介石突然造访。直到年老，孔令仪依然清晰地记得9月29日的那个大清早。

孔令仪：我跟我弟弟睡一个房间，他一早起来，把我们门——外面不是有一个阳台吗，他把门打开来："起来起来起来"：叫我们起来。那时候挺小，十一二岁吧。

刚满12岁的孔令仪很快得知，这个突然造访的陌生男性是为了她的小姨宋美龄而来的。

宋氏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便是宋美龄。她从小就跟着二姐宋庆龄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威尔斯利学院就读，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毕业后，她回到上海，从事教会工作。父亲宋嘉树去世后，她开始协助母亲处理家中事务。

1922年，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家里第一次见到宋美龄，便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对蒋介石的追求，开始时，宋美龄并不热心，只是提出双方可以保持信函联系，以增进了解和沟通。两人的通信一直保持到1927年。

对于二人的交往，除了宋霭龄夫妇，宋家上下均表示不赞成，因为除了蒋介石复杂的婚姻状况，他们还认为，蒋介石对宋美龄的追求很可能是出于不可避免的政治目的。

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宣布“下野”。随后，天津《益世报》刊登了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一封情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曰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情书公开后，被传诵一时。在宋霭龄的支持下，宋美龄最终答应了蒋介石的求婚。9月16日，宋霭龄在上海西摩路的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讯。此前持反对意见的宋子文已经被宋霭龄说服，宋庆龄也答应对这桩婚事保持沉默，只有宋母倪桂珍还没有应允。

这位被称为宋家“佘太君”的老夫人不仅一直反对这门婚事，而且极力回避同蒋介石当面谈论这个问题，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与蒋介石见面。为了避开蒋介石，她更带着外孙们东渡日本访友。婚讯公开后，为了得到宋母的许可，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日本，当面向宋母求允婚事。同时，宋霭龄和宋子文也写信给母亲，说明蒋宋联姻对小妹和整个家族的意义。在蒋介石向宋母保证会试着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这桩婚事终于获得了她的首肯。

1927年11月3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了一场世纪婚礼，花童正是孔令仪。这场婚礼聚集了当时中国的政界名流，但蒋宋两家的家长并没有出席。根据蒋介石的《爱记》上描述，他们原本要在日本举行婚礼，因为倪桂珍不同意，后来才改在上海结婚。

蒋宋联姻第二年，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就在这年夏天，宋美龄来到孔家做客，发现私塾先生的授课方式十分不恰当，便向大姐宋霭龄提出，要将孔令仪带到南京亲自督导教育。就这样，孔令仪离开了上海的家，住进了小姨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京的官邸。在这里，她度过了几乎整个少女时期。

孔令仪：蒋夫人来家里面做客，看私塾老师给我们上课，光《孟子见梁惠王》就读了三天。蒋夫人说不行，叫我到南京去跟她们住。那么我就进金陵女子附属中学——金陵女大有一个科系是教书的，所以有一个附中，给她们练习。那个时候，我就跟蒋夫人她们住了五年。

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尽管外界有很多解读，但在孔令仪的眼里，小姨宋美龄和姨丈蒋介石就是她生活中相亲相爱的教父教母。在南京，小姨和姨丈都非常疼爱她，她甚至比蒋经国还要受宠，不但可以不敲门就闯进他们的卧室，就算在床上乱跳也没有关系。

孔令仪：夫人说母亲负责生我们，她则负责养我们，她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孔令仪每天都由官邸侍从接送上下学。下课后，蒋介石则总爱拉着她在南京市区兜风。

孔令仪：学校放学了，那时候4点钟，夫人的车子来接了我回去，他（蒋介石）就叫我陪他去兜兜，那时候南京汤山那一段路很不好，夫人就说，哎呀，你老是叫Baby陪你，她来不及用功啊。老头子说："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

有时为了政务不在南京时，蒋介石也是像一个父亲一样挂念着家里的孔令仪。在写回南京的家书里，他常常会提到这个心爱的外甥女。

"民十七年九月蒋夫人亲鉴转佩佩 [22] 诸甥：黄君带来函件水果，均接到，甚为欣喜，望你们勤读孝友，余在阵中甚好，勿念。中正"。

"民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蒋夫人亲鉴：兄已安抵南昌，佩佩生日请代贺。兄中正"。

"民十九年五月十日，上海蒋夫人亲鉴：兄今午回徐，暂驻徐州，前方情形甚好。岳母及大姐均请问候，佩佩想已愈愈矣。兄中正"。

——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家书由于小姨和姨丈的宠爱，孔令仪的少女时期过得无忧无虑。然而，当此时节，中国却是内忧外患不断。对于这种气氛，身处政治中心南京的孔令仪自然也有着极为深刻的亲身感受。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

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日军迅速侵占了沈阳、长春等地。到1932年年初，东北全境沦陷，各地的知识青年四处抗议游行，孔令仪也走进了游行的队伍中。但由于她的身份特殊，阻拦不了的侍从只好从

旁加紧戒备。

孔令仪：东北给日本人拿去了，那时候学生出来游行嘛，我们都出去游行，不能不去的，都要到街上去。有一天我们就去了，在辛亥路上，我们几个学生在那里演讲，一大堆人围着我们。蒋公侍卫的车子经过那里，见一堆人围着我，以为出了事情，就下来看看。我跟他们摇手，叫他们走：“你们走，你们走，没有事情，没有事情。”

〇我们家里头，小孩是学外国的。小孩子只听不说

外患不断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政局也是动荡不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明争暗斗。蒋汪二人同属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后，汪精卫被孙中山遗命认定为国民党的继任领导人，蒋介石则掌握了军权。此后，汪精卫秉承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继续推行国共合作，准备北伐。

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到黄埔军校交通股长欧阳钟传达的指令，要求立刻驾驶舰艇前往黄埔执行任务。谁知，中山舰到达黄埔，李之龙向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时，邓演达却表示全不知情。李之龙又请示蒋介石调中山舰回广州，以供苏联代表团参观，蒋介石当时也没有反对。

两天之后的3月20日，蒋介石突然下令全城戒严，称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可能要兵变，同时下令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周恩来等共产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

尽管蒋介石对外宣称自己“唯革命是从”，这次行动只是针对个别人，自己对于联俄容共政策并未动摇，但对于蒋介石突然采取的做法，汪精卫怒不可遏，随后愤而辞职，远走法国。在后来与别人通信时，汪精卫提到此事依然愤愤不平：“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汪精卫去职之后，诸多拥汪的国民党人纷纷去电挽留，请汪复职。在众人的呼声中，1927年汪精卫回国，就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在容共问题上，蒋、汪产生分歧，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然而，仅仅几个月，在各方的共同夹击之下，蒋介石还是不得不宣告下野。在第一局的较量中，汪精卫胜出。

1928年年初，依靠宋家的实力，蒋介石再度上台，执掌政权。但他和汪精卫的争斗并未停止，汪精卫也多次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各派积极反蒋。1931年，汪精卫等人赴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预备9月初再次北伐。谁知，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与汪精卫这才表面上达成和解，共组联合政府。12月

底，蒋介石又一次下野，孙科出任行政院长。由于指挥不动蒋的人马，只好再度请蒋出山。

与蒋介石密切合作的孔祥熙一直周旋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两大派系之间。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之后，孔祥熙便被任命为实业部长。1928年，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之后，他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两年后改任实业部长。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为了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孔祥熙也于同月辞去实业部长一职。蒋介石再次上台之后，孔祥熙便就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进而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在父亲与姨丈息息相关的政坛风云变幻中，孔令仪渐渐长大，成为上海沪江大学的一名女大学生。在她记忆中，当时全家都住在上海，忙碌的父亲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南京，只有假日才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

蒋、汪合作建立新政府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变数。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中日矛盾激化。汪精卫主张对日和谈，遭到国民党主战派的一致挞伐。为了确定国民党内外方针，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的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就在全体委员合影之际，摄影记者当中突然有一人举枪射击，汪精卫当场中弹倒地。

一时之间，“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轰动程度甚至盖过了四届六中全会本身。因为此前蒋、汪之间矛盾重重，舆论纷纷指向了当天虽然亲到会场却没有参加合影的蒋介石。

然而，这起当时震撼中国的政治事件，在孔家的餐桌上却完全听不到任何端倪。

孔令仪：我们家里头，小孩是学外国的，Children ought to be seen, not heard（小孩子只听不说）。我们家里吃饭的时候，小孩不能唧唧喳喳的，没有这种事情的，也从来不问大人的事情。比方像南京有人刺汪精卫，张学良在旁边一脚把那个人踢出去了。这件事情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可是father（父亲）从来什么都不讲的。

我一看，霎时间的事，这张继 [23] 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个人，就抱那个凶手。那个凶手也不是太厉害的，厉害是拿枪打人厉害，别的他不厉害，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左轮枪，他的枪里呀，装了三个子弹，也不是四个子弹，子弹是勃朗宁的子弹，你也懂得吗？打出来是一样打出

来，但是没有力量哪。他大概是买不到，也许是误会了，一想那勃朗宁是钢的，钢弹比铅弹有劲儿。因为勃朗宁子弹不能走来复线，不能转呐。它松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个人，看得很清楚，这么抱住，那个人就拿着手枪，这么打他，他抱着他么。

哎呀！这个张溥泉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来这个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热闹。

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下去，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么个经过。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不久，案件宣告侦破，原来此事是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所为，他因为强烈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便伪装成记者，企图以记者采访的便利，接近蒋介石，将其刺杀。不料蒋介石并没有出现，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

〇父亲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的

汪精卫遇刺受到重创，只好暂时移居欧洲疗养，行政院长一职便落到了蒋介石头上。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将国民政府行政大权移交到了副院长孔祥熙手中，同时让他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孔祥熙成为抗战时期领导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

根据《中央机构调整案》的规定，孔祥熙将行政院所辖机构作出精简，从而克服了行政院以往机构庞杂、职能部门交叉、令出多门的弊病。接着，他又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了《非常时期经济政策之商榷》的讲话，提出“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并据此对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业、工业、交通、外贸等各项经济建设事业作出政策性规划，采取积极措施，比如发放工业和农业贷款、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和恢复生产、以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在大后方发展小工业和手工业、加强大后方交通建设，等等。

在努力建设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同时，1940年年底，孔祥熙又提出“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对外关系准则，力图通过以亲美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来获取抗战时期中国所需的各种援助。在他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在1940至1942年间，陆续从美国获得了总额近6亿美元的借款，以及大批物资援助，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经济需求大量输血。

1944年，孔祥熙率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他们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最终为中国争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并使中国成为国际开发银行12董事国之一。其间，经过多次交涉，他还与美国协商购买2亿美元黄金，用于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并迫使美方同意以2.2亿美元结清国民政府为驻华美军垫付的军费开支；应蒋介石要求，他又说服罗斯福总统撤换了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

这一年，孔祥熙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政治生命出现了由盛而衰的转折。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使得民众的生活困苦到极点。与此同时，有关孔祥熙与其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人披

露。1944年，在参政会上，学者傅斯年更是公开向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元公债中贪污舞弊的行为。美国方面也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更换财政部长。

民怨沸腾，满城风雨，在多方面压力下，孔祥熙只好辞去财政部长一职，次年又相继辞去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至此，孔祥熙只剩下了中国银行董事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他与蒋介石多年的亲密合作关系走到了尽头，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结束。

孔祥熙淡出政坛后，他的大儿子孔令侃创办了扬子公司。没想到，这家公司后来却成为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对象。无奈之下，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也定居美国。

孔令仪：夫人飞回去的时候，美国派了一个飞机送她回去。她跟那个飞机厂很熟，所以他（孔令侃）就在佛罗里达投资买了一个厂——就是修飞机的那个厂。以后他就在附近买了地，现在那个地还在。那时候买得很便宜，没有发展嘛，现在很值钱。

孔令侃定居美国之前，孔令仪已经在美国好几年了。从1943年在美国结婚开始，她几乎都在美国生活。母亲宋霭龄大部分的时间也都住在美国长岛蝗虫谷的别墅里，擅长投资理财的她，在当时就已经开始投资美国股市。因此，退出政坛后，孔祥熙只得孤身一人居住在上海。

1946年，毛泽东首席秘书陈伯达撰写《中国四大家族》，指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一时之间，舆论的矛头纷纷指向四大家族，郁郁不得志的孔祥熙更加意兴阑珊。1947年，他以宋霭龄在美国来电说要进医院开刀为由，飞往美国，彻底结束了多年的政治生涯。

孔令仪：父亲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的。他知道自己是国共斗争的对象，离开是唯一的选择。他深知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重新定义他的事迹。我们孔家本来很有钱，为了国民革命事业，父亲还捐了不少钱。他当财政部长时，财政收入创下国府执政的新高纪录，他如果是个贪官污吏，可能吗？

在美国，孔祥熙和宋霭龄一直过着平淡寓居的生活。此后，孔祥熙以中国银行纽约市分行主要董事的身份，出现在美国金融界，每周两三

天驱车到华尔街工作，其余时间则待在家中。

孔令仪：有时候到那个中国银行会会客，因为我们在Long Island（长岛），人家看他不方便嘛。

孔祥熙喜欢收集古董玉器，来到美国后，这个爱好也没有改变。孔令仪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嗜好，家中的客厅摆满了她和父亲从拍卖市场买回来的各种古董。

孔令仪：去参加博览会展览买的。（问）他们大概要什么价钱，（我）没有钱，那么就跟我father说，结果father去买了。

尽管平日生活十分低调，但是纷扰并没有远离。1951年，《纽约每日镜报》记者布朗引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揭露孔、宋家族在美国的家产高达8亿5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孔、宋家族在美国的私产。孔令仪说，这件事情曾经一度困扰着当时已经72岁的父亲，但是孔祥熙很快就释怀了。

孔令仪：那时候他们拼命说是要推翻国民政府，一定要把我父亲先去掉。我父亲觉得犯不着了，他已经是尽了力量、凭了良心，将来历史可以证明，用不着我口来辩。

随着时间的流逝，纷杂的政治环境再也挤不进孔祥熙远在美国长岛的别墅。人们也逐渐淡忘孔家。直到1962年，孔祥熙才第一次来到台湾，那时候他已经83岁。回台湾住了4年，孔祥熙因病回到美国治疗，1967年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88岁。这是孔令仪失去的第一个家人，当时52岁的她，心里并没有作好准备在她有生之年必须目睹着家人一一离她而去。

〇我跪在她床前，握着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眼睛

1973年，宋霭龄病逝于纽约，享年85岁。1975年，孔令仪的小姨丈蒋介石也去世了。

蒋介石病逝后不久，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宋美龄的政治权力大为削弱。为了舒缓丧夫之痛以及权力斗争带来的不快，宋美龄离开台湾，长住美国长岛。她的寓所，就是孔祥熙夫妇位于蝗虫谷的别墅，距离纽约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孔令仪：地很大，30多亩，房子也很大。有一个大客厅，有两个楼梯，还有书房和饭厅。底下四个房间，上面有六个房间。

由于孔祥熙和宋霭龄已经病逝，同胞手足宋子安、宋子文也分别在1969年、1971年去世，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宋美龄和她的侍卫们。宽大的居所里，伴随着宋美龄的却是无边的孤寂。

孔令仪：因为我母亲过世了嘛，她（宋美龄）不大喜欢那里。她觉得太乡下了，她不喜欢。

自从定居美国后，孔令仪的生活重心也逐渐移向家族事业。因此，当宋美龄来到美国后，孔令仪就负责张罗一切，包括帮助处理困扰宋美龄多年的皮肤病。

孔令仪：皮肤病我想是敏感，也是很多事情搁在心里面，不能够讲出来。她（宋美龄）有很厉害的皮肤病，后来就好了。

记者：怎么样厉害？

孔令仪：发风疹，溃烂，全身发痒，都不能抓，只可以躺在那个洗澡缸里面洗热水，那时候真是蛮苦的。

尽管皮肤病让宋美龄苦不堪言，但她在这里的生活却十分恬淡，每天主要就是读书看报、画画、练书法，每周固定去教堂做礼拜，极少公开露面。1981年，在北京的二姐宋庆龄病逝，她也没与数十年未见的姐姐见上最后一面。

客居美国11年后，1986年，宋美龄以参加蒋介石百年冥寿纪念活动的名义返回中国台湾，重新住进士林官邸，这一住就是5年。其间，她先后经历了儿子蒋经国、长孙蒋孝文、孙子蒋孝武的去世，见证了蒋氏家族在台湾正式退出政治舞台。

重重打击之下，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赴美定居。但是在台湾这个岛屿上，还有一位宋美龄最挂念的亲人，那就是孔令仪的妹妹孔令伟。她留在台湾，主要是协助小姨宋美龄运作在台湾所经营的相关机构。

孔祥熙和宋霭龄共有四位儿女，其中老三孔令伟，原名孔令俊，是孔令仪的大妹，人称“孔二小姐”。她自幼狂放不羁，10岁出头便会射击，13岁就学会了开车。宋美龄曾经夸赞她：“令俊天生豪放，女生男相，很像我。”而她也是孔家四姐弟当中，与宋美龄关系最亲密的，据说二人情同母女。

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本来就霸道的孔令伟行事更加肆无忌惮。在南京的时候，有一次她开车兜风，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交警训了几句，她一怒之下，竟然拔出手枪，将交警当场击毙。

生活中我行我素，在公事上，孔令伟也常常当仁不让。当时很多送给孔祥熙的公文，她都要先过目，如果觉得不重要，就压一压，不送到孔祥熙那里去。她甚至连蒋介石的东西都敢动。有一次何应钦发来一份紧急公文要给蒋介石，被孔令伟翻阅后随手丢开。何应钦反复催促无果后，蒋介石下令追查。最后查到孔令伟头上，蒋介石哭笑不得，最后不了了之。

除了出格的言行举止，孔令伟另一个出名的地方在于她的穿着。她总是留着大背头，或者是头戴礼帽、西装革履，或者是一身长袍、手持折扇、口叼雪茄，俨如一位男士。而据说她从小便是男孩子打扮。孔令仪说，这其实和小姨宋美龄有关。

孔令仪：令伟真是可怜。她小的时候穿女孩子的衣服，天气热，她生得一粒一粒疥，头上也是。蒋夫人跟我母亲说：“你怎么搞的？给她穿那么长的衣服。”蒋夫人说她身上都生疥，就把她头发也剃了，给她穿那个短裤子，特别短。她这样一穿，秘书、侍卫看见就说：“哎呀，二小姐怎么你穿这个？！”就笑她。她觉得好像不自然，后来就改穿男孩子衣服，就改不过来了，就是因为人家笑。也是小孩太敏感，其实我穿什么

与你们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以后换过来，可是她换不过来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蒋夫人对她很遗憾。

由于孔令伟特殊的着装，解放战争后期，当雌雄莫辨的她陪同宋美龄在美国寻求援助时，常常搞得美国礼宾司的人十分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安排她的住处。

1950年，寻求援助未果的宋美龄从美国到台湾定居。此时，孔祥熙全家都已经迁往美国，孔令伟离开家人，一直跟在小姨身边，也来到台湾，负责帮忙打理宋美龄的生活起居。她不仅是宋美龄的生活总管，还协助建设台北的圆山饭店，可以说是圆山饭店的幕后灵魂人物。

孔令仪：订东西、拿样子、讲价钱什么都是她在负责，她费力费心很多，把圆山做得还是不错的。

圆山饭店位于台北市北郊，由士林官邸出面贷款修建，总资产达23亿元，其宏大的规模在台湾屈指可数。这种在当时几近奢华的建筑规模，更使其成为台湾的“国宾馆”。蒋介石在世时，就经常在这里举办“国宴”，或者接待“外国使团”。

正是因为有了孔令伟，才成就了这样的圆山饭店。和孔令伟接触过的人，对她要求完美严苛的性格都印象深刻。但在大姐孔令仪的心中，妹妹天真的模样，时常浮现脑海。

孔令仪：礼拜天要做礼拜，8点钟做小孩的礼拜，11点是大人的礼拜，下午4点钟我家里面祷告。他们祷告起来，好像跟神直接讲话，大人都很投入，但是我的小妹妹，跪在那儿都睡着了。

小姨宋美龄移居美国后，孔令伟选择了留在台湾，担任圆山饭店的总经理。公开对外营业的圆山饭店使她成为公众心目中的新闻人物，她也常常身着西装出现在饭店内，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她为之付出了巨大心血的这一切。

1994年，宋美龄因为孔令伟罹患直肠癌再度返台。为了就近探视孔令伟，宋美龄住在医院的招待所，孔令仪和丈夫一直陪伴在她身边。这一年的11月，孔令伟敌不过病魔的摧残，在台北振兴医院病逝。孔令伟病逝之后，宋美龄也放下了对台湾的所有眷恋，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台湾。

1992年孔令侃去世后，宋美龄因为就医的需求，搬进了孔令侃在纽约瑰喜广场的公寓大楼。公寓旁的小公园是宋美龄经常驻足的地方，这里离孔令仪中央公园旁的住宅不到10分钟的车程。孔令仪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探视宋美龄。当纽约天气好的时候，孔令仪也会带着宋美龄到她住所旁的中央公园逛逛。

孔令仪：看护和侍卫都是从台湾来的。我每天都去看看她（宋美龄），没有什么特别的。

记者：你们每天都去啊？

孔令仪：差不多每天都去。

记者：都什么时间过去？

孔令仪：下午去，就过去跟她聊聊。从前她有客人，后来她身体不怎么好，她就不看人了，就是家里人跟她……

在纽约，除了孔令仪每天都会去陪伴自己的小姨，每逢重要节日，在美国的蒋家后代也会去跟宋美龄欢聚，比如蒋纬国的太太邱爱伦、孙女蒋孝章、孙子蒋孝刚等。

1993年，宋美龄最疼爱的孙子蒋孝勇一家从加拿大搬到了旧金山，二者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曾孙蒋友柏也经常来看望她。宋美龄对这位曾孙也是非常疼爱，蒋友柏的英文名字Demos就是她取的。

蒋友柏说，他每次见到曾祖母的时候，都会像小时候一样，亲昵地抱住她。母亲蒋方智怡担心儿子无意之间伤着老太太，常常在一旁提醒他小心一点，但宋美龄每次都毫不介意地笑道："没关系，抱紧点才好，越紧越好。"

宋美龄爱热闹，晚辈来看她，她十分开心。不过她一生始终坚持这样两个原则：如果没有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见任何人的，包括她的亲人；只要出门，她一定要穿着中式旗袍，戴着珠宝首饰。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礼仪。

因此在蒋友柏的记忆中，曾祖母是一位"始终穿戴整齐、令人尊敬的伟大女性。她的头发近百岁还没有全白，尽管比当年稀疏了一些，但黑发仍能长到腰际。每天都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地盘在头上，显得雍

容华贵，风采不失当年”。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宋美龄都会和他坐车出去兜风。在纽约，兜风的习惯也被她保持了下来。她一般会让司机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把大家带到郊外的公园，掏钱请大家吃冰激凌，因为她本人也很喜欢吃。除了冰激凌，巧克力也是宋美龄的最爱。为此，有一次，她居然还手把手地教蒋友柏他们一群小孩子做巧克力，让人感慨她童心未泯。

因为自小在美国留学，宋美龄一口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地道纯熟。抗战时期，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介绍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情况，多次赢得热烈的掌声，最后全体起立鼓掌。她的演讲通过收音机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

1995年，二战胜利50周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及参议员赛蒙分别代表共和党及民主党，邀请宋美龄出席美国国会为她举行的盛大致敬会，表彰她在二战期间为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时隔50余年，宋美龄再次走上演讲台，发表演说。在二战同仁殒殁无几的会场上，将近百岁的宋美龄再一次征服了世界。

不过，这大概是宋美龄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2003年，106岁的宋美龄已经不方便出门了。亲人离去的恐惧，再度笼罩着孔令仪。

孔令仪：你看我头发掉了很多呀。现在戴的假发。

记者：为什么？

孔令仪：紧张呀，pressure（压力）。

记者：什么时候的事？

孔令仪：夫人生病的时候，跟夫人那几年总是有pressure，老人家，你总是想要照顾到，你总是想有没有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这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其实想到的我们都做到了，但是心里老是想，哎哟，有没有疏忽的地方。

10月24日，宋美龄的住所打来电话，要孔令仪过去一趟。见了孔令仪最后一眼，宋美龄闭上了双眼。

孔令仪：我跪在她床前，握住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眼睛。她在等我，你知道吗？她留最后一口气等我。

在美国曼哈顿教堂宋美龄的丧礼上，孔令仪静默不语。长久环绕着她的生活重心一一远离。孔令仪清楚地知道，往后的日子里，她必须面对更大的静默。

孔令仪：父亲先走，后来我母亲，以后他们人口愈来愈少。令伟，然后大弟令侃，他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

记者：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想念他们？

孔令仪：对，想。我后来跟Colonel（上校，孔令仪先生的昵称）也在讲，我说最近我很depressed（沮丧），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道理。我们一切普通生活都可以过，为什么还会depressed？实在说不上来。有时候晚上睡觉，突然醒了，下意识地就想打电话给家人，等到拨了电话，才惊觉他们都已经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是就是会想到他们，因为我们家里人很亲近。

宋美龄去世后，被安葬在纽约郊外的芬克里夫墓园。墓园建筑的两间小灵堂里，放着孔家全体去世亲人和宋美龄的灵位，紧紧相邻。每次亲人的离去，都令孔令仪心碎。但她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再风光的人生，最终还是要走下舞台。

宋美龄去世后，陪伴孔令仪的只有她90多岁的丈夫、4个家仆，以及两只小狗。3年后，孔令仪的丈夫黄雄盛也离她而去，留下孔令仪独自一人面对世间的变化。

2008年8月22日，孔令仪在家中去世。孔家第二代最后一位见证人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蒋、宋、孔家族的传奇，就这样落下帷幕。

第六章　郝柏村：亲历金门炮战

讲述人　郝柏村

郝柏村，『国民党军一级上将』。1919年生，江苏盐城人，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亲历抗日战争，参与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1965年任『总统府侍卫长』。后任『陆军总司令』，1981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93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副主席。退休后多次到大陆参观、访问。

讲述人　应舜仁

应舜仁，蒋介石侍卫。1927年生于浙江永康，1945年当兵离开家乡，成为南京总统府仪仗队队员。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工作38年，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最后岁月。退休后从事写作，先后发表政论文章台湾歹戏拖棚几时休再说台湾歹戏拖棚几时休三说台湾歹戏拖棚几时休草山行馆一把火——谁点火焰？等。

金门炮战

1958年8月23日下午5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当日落弹数达5万余发。由于正值晚餐时间，金门守军未作丝毫防备，突然的炮火袭击造成440余人死伤。随后的44天，解放军持续对金门进行了猛烈、密集的炮火攻击，并封锁金门，以阻止国民党补给运输。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被截后，美、台海军急忙组成联合舰队进行护航，金门守军同时开始对解放军的炮击进行还击。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对金门停止炮击七天。随后，解放军宣布采取“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的方针持续进行小规模炮击，国民党也利用单日对大陆进行零星射击。

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双方历时21年的炮击正式结束。

曹景行：1958年8月初，因为驻扎小金门的一名士兵犯下罪案，国民党第九师师长黄熠轩被追究责任，阵前解职，而接替他的是军炮兵指挥官——39岁的郝柏村。那时的郝柏村没有想到，就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后，在“八二三金门炮战”当中，他这位新任师长管辖的面积只有大金门岛十分之一的小金门，就承受了超过20万发炮弹的袭击，相当于大陆方向发射炮弹总数的一半。郝柏村指挥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军队，一直到战役结束。

多年之后，郝柏村官拜“参谋总长”，后来，他又成为继陈诚之后的第二位军人出身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说，他之所以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赏识和重用，和金门炮战有着一定的联系。

金门位于厦门东向偏南，明朝时朱元璋派人在这里设立卫所，固守福建东南海口，取“固若金汤，雄震海门”之意，简称金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金门与大陆的联系远较与台湾更为密切，它距大陆最远点10千米、最近点1800米，离台湾却有277千米。据说两晋以前，金门和厦门是相连的，后来因为地壳运动才逐渐分离，因此人们习惯上将金门和厦门合称为“金厦”。自古以来，两地在语言、服饰、习俗、房舍样式等各方面也十分接近。

金门包括金门本岛（大金门岛）、烈屿（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等十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在149平方千米左右。大金门岛面积131.7平方千米，呈哑铃状；在它的西边，便是面积不到15平方千米的小金门岛。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金门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历史上郑成功、施琅攻取台湾，都是以金门为出发地，因此，金门又被称为“台湾的桥头堡”。

郝柏村：我要是从头说金门的话，金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可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台湾海峡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1949年以前，金门还一片荒芜。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这里才逐渐有了人烟。1949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厦门要塞司令部成立金门要塞总台，开始在岛上构筑工事，铺设通信线路。8月，随着福建战事的发展，国民党进一步增强了防御，调派部队驻守金门各岛屿。陈诚担心金门守军战力不足，又将潮汕地区的胡琏第十二兵团调来防守金门。一时之间，小小的金门重兵云集，守卫森严。接着，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将

通海口各内河上游100海里的大小船只全部炸毁。

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成功攻取厦门，随后准备进攻金门。由于船只数量不足，日期一再延后。直到10月25日，金门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以9000余人的兵力，在凌晨时分登陆金门。国共双方激战3天，最终解放军因为后援不继而全军覆没，国民党方面称为“古宁头大捷”。

据说，当国共双方在金门古宁头村鏖战的时候，国民党出动飞机轰炸，村民都聚在附近的山头看热闹。每当飞机投中目标，村民都大声欢呼，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实在太精彩了，比看电影还过瘾。”应该说，这一仗打得相当惨烈，国共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民党方面称俘虏共民党军7364人，共产党方面也称击毙击伤国民党军9000多人。

26日，蒋经国前往金门。在他的回忆性文章中，他记载下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我于本日奉命自台北飞往金门慰劳将士，十一时半到达金门上空，俯瞰全岛，触目凄凉……沿途都是伤兵、俘虏和搬运东西的士兵。复至最前线，在炮火中慰问官兵，遍地尸体，血肉模糊。看他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英勇作战，极受感动……下午四时，飞离金门，但脑中已留下极深刻的战场印象。”

对解放军来说，这样的失败同样十分罕见。很快，指挥金门战役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就收到了第三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同时还要求“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几十年后，叶飞回忆起这场败仗时说：“世上事物，有利有弊，坏事能变好事。我1949年未能打下金门，不可原谅。但留着金门看来也有用场，否则，1958年不就少了一台大戏唱嘛！”

但是，金门战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使解放军对登陆战的艰巨有了深刻认识，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单靠陆军发起登陆作战，从而阻止了解放军进军台湾的脚步，间接导致了台湾问题的产生。因此，当国民党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流着泪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蒋经国也认为：“金门登陆共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折点’也。甚愿上帝佑我中华，使我政府从此重振旗鼓，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幸甚幸甚。”作为参战主力的

胡琏则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〇老“总统”说金门是下决心要守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守

金门之役结束后，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奉命就地改为金门防卫司令部，胡琏担任司令。

虽然金门古有“仙洲”之称，听起来好像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是在胡琏的眼中，金门却远非如此。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笔者伫立在北太武山顶环顾四野，便觉杀气腾腾，上冲云霄。‘料敌从宽’，古有明训，而且一定要计算到敌必来攻。金门孤悬海上，并没有盘弓弯马的余地，一场大战，必然是硬碰硬的重量级拳击赛。因此便想到了一句江湖术语：‘能打不如能挨！’小说隋唐演义中裴元庆挨不了李元霸的三大铁锤，怎能当得上隋唐第三条好汉的头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早已是高峰的垂训，年来我军对此已有不少成就，但在方法上应再商讨。‘马其诺’‘齐格飞’型的钢筋水泥堆积，终究是软化在希特勒、艾森豪威尔的重磅炸弹之下。在我们的地区内，石山嶙峋，黄土深厚，穿山甲的故事，土行孙的神话，触发了我们更多的灵感，于是尽最大的可能，把有关设施，向地下作广深的掘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夜以继日，便是七百三十多个工，成千累万的人力加上机械，其效率是惊人的，‘有恒为成功之本’，很快就达成了预期的作为。”

国民党军队驻守金门期间，人称“金门王”的胡琏持之以恒地干着一件事，那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多藏弹药。胡琏每日开山不止，在“八二三炮战”前，金门已经构筑了比较完整的环岛防御体系，各种坑道纵横交错，有外国记者把掏空的金门称做是“一块布满窟窿的瑞士奶酪”。

环岛纵深防御体系由前沿基本阵地、中间阵地、核心阵地组成。水际滩头设有绵密的障碍物，如轨道砦、铁丝网、围墙、阻绝壕、地雷场，水下设三列雷阵。前沿阵地筑建地堡群，防御支撑点，反空降高堡等。

纵深地域高地上，筑有大型坑道，配置大口径火炮阵地。各式高射兵器，组成了高、中、低立体三层对空防御火力。以平射、侧射、反射火力构成了三面三层火墙。基本上达到了‘岛屿要塞化’‘驻地战场化’‘战场堡垒化’及‘一人一坑’‘一车一坑’‘一炮一坑’要求。

——胡琏《胡琏回忆录》

‘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猫在山洞里把望远镜对准只有一个步枪射程之遥的大陆。防止伞兵降落的铁钉遍布全岛。

在所有可能登陆的海滩，精心安放了一层层用水泥桩、铁丝网、深壕构置的鹿砦。

埋设的地雷像天上的繁星无以计数，以致时常有人畜挨炸的事件发生。伪装过的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锁着港湾和公路交叉路口。仔细观察，茂密的树丛间伸挺着黑洞洞的坦克炮、榴弹炮炮口。纵横交错的地下道路和隧道通向营房、炮台、哨位、饭店、医院，甚至一家电影院。数万全副武装的军人像地老鼠一样长年在炸开坚石修建的地下工事里生活和工作。

至今，金门仍留存着它‘世外’的一面，但无人敢恭维它是‘桃源’。准确讲，它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海上军营、密布枪眼炮眼的大碉堡或生活上照顾不错的‘关押’4万军人和5万百姓的准‘监狱’。再换一个角度，它是当今世界各种强大力量较劲抗衡挤压出来的一个并不有悖逻辑的怪胎，是先是热战而后又是冷战年代的一个过时的剩留物。

——沈卫平《八二三炮击金门》

这段时间，台湾海峡也曾经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其中既有小规模的武装登陆，也有海战、空战，炮弹的往来更是家常便饭。抗美援朝结束后，从朝鲜战场上撤退下来的、装备着优良的苏式武器的志愿军精锐部队，被全数部署到金门对岸，对金门形成三面环伺的状态，两岸的军事氛围更加紧张。

1955年，出身黄埔军校炮科的郝柏村，成为金门防卫司令部的炮兵指挥官。由于意识到了防卫工事的重要，当时“国防部长”俞大维几乎每周都要到金门去看炮兵阵地。郝柏村一上任后，也视察了金门所有的炮兵阵地。

郝柏村：我去做金门炮兵指挥官，当时的炮兵阵地，都是用麻袋装上沙子围起来的野战掩体。一门炮要堵几个麻袋？差不多要两万个麻袋。

曹景行：一门炮要两万个麻袋？

郝柏村：一门炮要两万个麻袋围起来。当时台北一个麻袋要7块钱，所以两万个麻袋，要14万块台币。那么麻袋差不多用半年它就破了，要换了，14万块钱就没有了。所以当时我考虑，这样一门炮，一年单单花在麻袋上面的钱，差不多将近30万。30万，完全可以拿去买钢筋水泥，把掩体做起来了，而且使用时间又长。所以最后差不多花了3年时间，把100多门炮的炮兵阵地都做了钢筋水泥的掩体。这样不管它炮弹落在上面，还是落在外面，与里面都毫无关系，除非（炮弹）从那个洞口钻进去。不过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个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郝柏村说，当时金门有美国顾问，他们认为炮兵阵地应该机动，不适宜用固定掩体。郝柏村认为金门面积有限，而炮兵阵地又十分密集，实际上根本没有机动空间，因此“打不破比打不着重要”。出于这样的考虑，建设钢筋水泥的永久炮兵掩体也是十分有必要的。郝柏村的想法得到了俞大维的支持，金门炮兵掩体的构筑工程因此得以顺利进行。

此时，对面的解放军不仅修筑了鹰厦铁路[24]，为了将金门全岛控制在火力范围之内，同时又秘密在莲河[25]、大嶝岛[26]之间修筑桥堤，以便炮兵可以进驻大嶝岛。而金门炮兵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解放军修桥堤。郝柏村说，由于解放军都是夜间施工，他们便在夜间用单炮对施工地点进行间隙射击，并把这叫做“闪电计划”。

郝柏村：我们的炮兵阵地的情况，这个解放军清楚得很。因为平常我们零星的炮战，这个炮一发射，他马上就可以测出来位置。大陆的炮兵阵地位置，我们也清楚，大家都很清楚。

曹景行：你们也知道对岸对方的情况？

郝柏村：他们的炮兵阵地我们都知道。

曹景行：实际上小金门是离大陆最近的。

郝柏村：小金门最近，对面的情况都看得见。他拖炮进阵地，我们都看得见。

金门不仅是军事斗争的前线，也是政治力量周旋的舞台。从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声

音，意图将台湾从中国主权中分割出去，为“协防”台湾、围堵红色中国提供“合法”依据。为此，美国政府多次要求蒋介石放弃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为两岸政治上的完全切断联系作准备，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朝鲜战争后，美国联合英法，倡议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台湾也积极争取加入。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回应，先是周恩来发言要“解放台湾”，接着政协会议、各团体和党派也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发生了“九三炮战”。台海形势骤然紧张。

1954年9月6日，东南亚公约组织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除了美国，英国、法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都反对台湾加入。美国只好与台湾单独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同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抵达台湾，台美双方开始交涉条约签订问题。台湾方面主张条约范围应该包括金门、马祖和整个中国大陆在内，而美国的立场则是坚持只有台湾和澎湖。双方僵持不下，交涉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达成一致意见。

1954年12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其中规定美国政府对台的防卫义务仅限台湾和澎湖列岛。在签约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专门召开记者会，宣示该条约有以下意义：

一、向各国明确表示“中华民国”在国际外交的地位，美国将不会在任何国际问题上用台湾作为谈判的筹码；

二、驱散中共对美国“协防”台湾的认真保证所存的可能怀疑；

三、以长期的正式条约的形式向台湾表示，双方共同的军事安排是有依据和保障的。

《共同防御条约》的内容：

一、“缔约国”基于联合国宪章，以不危害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的和平手段来解决“自国”被卷入的国际纷争，并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以与联合国的目的不两立的方法来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

二、“缔约国”为了更加有效地达成此条约的目的，由自助及互相援助、单独及共同、维持且发展对缔约的领土保全及政治安定的来自外界武力攻击及共产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的、个别的及集团的抵抗能力。

三、“缔约国”约定为了强化自由的诸制度并促进经济进步及社会福利，而互相协力，并为了达成这些目的个别的及共同的继续努力。

四、“缔约国”关于实施此条约，通过“自国”“外交部长”或其代理随时进行协议。

五、各“缔约国”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方“缔约国”领域的武力攻击，即危害“自国”的和平及安全，且基于“自国宪法”手续，宣言为了对付共同的危险而行动。前述的武力攻击及因此所采取的措置，得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述措置，安全理事会若恢复和平及安全，即为维持和平及安全采取必要措置时，得终止之。

六、第二条及第五条所规定的适用上，所谓“领土”及“领域”，“中华民国”是指台湾及澎湖诸岛，北美合众国是指在其管辖下的西太平洋属领诸岛。第二条及第五条的规定，也适用于互相同意所决定的其他领域。

七、关于在台湾与澎湖诸岛及其周围，为了防御所必要的美国陆军、空军及海军，基于互相同意所决定，“中华民国政府”许诺其配备的权利，美国政府予以接受。

八、此条约，对维持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权利及义务或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联合国的责任，不给予任何影响，同时不可解释为给予任何影响。

九、此条约，必须由美国及“中华民国”，根据各自“宪法”上的手续予以批准，“两国”在台北交换批准书时，同时发生效力。

十、此条约有效期限，定为无期限。若有任何一方“缔约国”通告他方“缔约国”时，可以使条约在一年后终止。

郝柏村：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北京不接受，我们也不接受，老“总统”也不接受。《共同防御条约》明确规定了是“协防”台澎，不包括金马外岛。当时美国劝我们，希望我们放弃金马外岛。但是站在老“总统”的立场上，我们必须坚守金马外岛。坚守金马外岛，从攻势的意义来说，当时我们说要“反攻大陆”，我们需要一个跳板；从防卫台澎来说，我们要控制台湾海峡，必须在大陆边缘有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那就是金门、马祖。不过金门当时从美军的军事观点来说，要守住，这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金门是三面被大陆包围的，而且大陆上的地势都比金门高，比如厦门的云顶岩、南太武山，并且距离也很

近，都在炮的射击距离以内。当时美军总是说，金门你守是守不住的，还是放弃吧。但是老“总统”他说金门是下决心要守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守。

自从来到台湾，蒋介石便多次告诫部下，宁可不要海南、舟山、大陈，也不能丢掉金马，无金马则无台澎，有台澎则有大陆。《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也对美国记者说“金马乃是‘中华民国’的生命线”，“放弃金马，即等于放弃我们反共抗俄整个事业”，“不论美国‘协防’与否，我们自己将不顾一切牺牲予以确保”。对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美国最终没有明确表态。

郝柏村：到底《共同防御条约》“协”不“协防”金马，后来美国国会有一个决议授权案，作了授权。换句话说，如果解放军打金门、马祖，打外岛，美军“协”不“协防”？要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作决定。所以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他就说：“这个我们不说，让中共去猜，让他去猜。”

〇金门炮战是老“总统”老早就预料到的，情报上是知道的

《共同防御条约》签订正值美苏“冷战”时期。随着英法相继撤出中东，这一地带形成了“力量真空”。为了遏制共产主义阵营的发展，1957年年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对中东国家实行经济合作和军事援助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宣布美国可在接受援助的这些地区使用武力，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武装侵略”。

同年，黎巴嫩总统加米耶·夏蒙、伊拉克费萨尔王朝都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次年5月8日，黎巴嫩爆发武装起义，夏蒙政权摇摇欲坠。7月14日，由伊拉克青年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在凌晨冲进王宫，杀死国王费萨尔二世和首相赛义德，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一时之间，中东地区风起云涌，形势诡谲紧张。1958年7月15日，美军进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7月16日，中国政府发出了谴责侵略的声明。7月17日，北京举行了50万人的集会游行，游行队伍高呼“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滚出去”，同时也喊出了“美帝国主义从我国台湾领土滚出去”的口号，两个口号一起响彻云霄。

7月18日夜，中共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紧急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美军在黎巴嫩、英军在约旦登陆，镇压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游行示威是一个方面，是道义上的支持，从政治上打击帝国主义。同时，我们不能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指示。1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行为，绝不会袖手旁观”！

郝柏村：那么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中东发生了问题，美国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美苏的关系也是冷战最高峰的时候。所以赫鲁晓夫希望在远东牵制美国，韩战（朝鲜战争）虽然停火了，但是希望另外制造一个军事冲突来牵制美国。在毛泽东的立场上，他也希望知道我们同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到底美国人“协”不“协防”金马外岛，他也需要发动一个军事冲突来作测试。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金门“八二三炮战”，在地区上只是个局部战争。因为当时的美苏的冲突，基本上全面战争大家都不敢打，都是搞局部战争。那么同时由于当时受了双方面的限制，金门炮战在军事上显现出来也是很特别的：陆、海、空三军都参战，但是陆军只打陆军，炮打炮，空军是空中飞机打飞机，海军在海上船与船对打。

1958年夏天，台湾海峡战云密布。此时，金门国民党军拥有美式155毫米加农炮20门、155毫米榴弹炮96门、105毫米榴弹炮192门，共计308门。解放军拥有105毫米以上榴弹炮223门、100毫米以上加农炮73门、100毫米海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19门，共计319门。此外，福建地区库存炮弹多达89万余发，足够打半年以上。由于中程火炮多，远程火炮较少，为了增加胜利的把握，解放军总参谋部又下令立即从全国调大炮来。

7月17日，台湾方面军方宣布，三军已处于“特别警戒状态”，全体官兵停止一切休假。美国立即将一批“响尾蛇”导弹交付台湾，美军第七舰队也靠近台湾海峡展示军力。与此同时，解放军米格飞机大举进入福建各个机场，大批炮兵部队秘密在厦门集结。7月21日，解放军接到作战命令，要求24日夜全军进入阵地。当天开始，台湾海峡突然暴雨滂沱。恶劣的天气使得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也增加了不少困难。很多当年的解放军老兵都说，1958年的那场大雨真把部队折腾稀了。

时任解放军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的刘华后来回忆说：上面只知道按地图下达命令，说一声：‘限时进入阵地！’要知道，地图上标的路都是一些土路、小路，窄得很，加上下雨，到处泥浆，部队同时出来，又堆到一块了，谁都想头一个进去，谁也不让谁。现在检讨，我们指挥上确实有不少问题。我真急成了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了，因为我们完全在金门的火力范围之内，如拂晓前部队不能就位隐蔽，敌人发觉首先向我开炮，损失将无法估计。我们根本就没法还炮，也没法疏散，只能干挨打。

我下了一道命令：哪一门炮、哪一辆车出现问题，确确实实走不了，立即推到路边，翻到沟里去，不能影响大部队行动！

万幸，天亮前各部队都到了位。坏天气也有好处，使敌人观察不便、容易麻痹，我们这边千军万马大折腾，那边仍然在糊里糊涂睡大

觉，真让人难以相信。但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险象环生，让人后怕。

时任解放军九十三师炮团二营教导员的郭子兴说："85炮本是小炮，不重，柏油大马路上，5个人可以拉着跑。现在不行了，乡间小路全翻成了泥浆，一脚下去，陷到小腿肚，炮轮子陷进去就再也转不动。卸掉轮子反而好拉。稍平一点的地方，一个排可以拉动。上坡，得一个连。陡处，一个营加上民兵好几百人，才拉得动。从渡口到前沿，七八里地远，就那么一寸一寸往前拖、往前挪。拳头粗的绳子，炮三连拉断了17根，全营12门小炮，拉了3个晚上才到位。可想而知，后面两个122加榴营——炮大——拉到位的困难程度。炮轮上了架，人也散了架，随便什么地方，躺倒就叫不醒。迷糊几小时，干部脚踢巴掌拍一个一个拽起来，不能睡，事情火急，得接茬干！搞伪装，挖堑壕，修炮位，搬炮弹！整整一个月，棉布军衣没干的时候，全都糟成了烂布条。没有替换，提倡穿麻袋，上边剪个洞，头套进去，在两边掏个洞，胳膊伸出来，腰里扎根绳子，下边刚好盖到大腿膝盖，集合站队，活脱一个原始部落。"

连绵的暴雨也使得疾病在解放军中蔓延，尤数痢疾最为盛行，高峰时甚至有的连队超过半数的人都患上痢疾。由于药品不足，许多人由此落下了病根。南方红土碱性大，每天泡在泥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官兵烂脚，轻者脱皮、流血，重者化脓、掉趾甲，甚至骨头都露出来。整天生活在潮湿的雨水中，不少人还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苍蝇、蚊子、蟑螂、蜈蚣、蝎子等又成群结队地来捣乱，以至于当时士兵们有一种说法："当头号二号公敌根本轮不到美帝、蒋介石。"8月上旬，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炮兵进入阵地就绪。只等中央一声令下，解放军就会在同一时间对金门、马祖发动猛烈的炮火袭击，重点打击金门，集中袭击炮兵阵地和重要仓库，然后转入对空作战，并以海岸炮兵火力封锁对方港口和机场，继续打击炮兵及有生力量。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完毕之后，毛泽东下令暂停。在转交给叶飞的信中，他这样说："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礼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

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

从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下了决心攻打金门的，但是却不得不考虑国际形势。因此他主张等更有把握的时候再打，以免将局部战争扩大化，毕竟这是一场“极为特殊、复杂、微妙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即将访华，与北京讨论当前的国际局势问题，此时对金门发动大规模炮击，很容易产生这是“受到苏联指使”的感觉。而且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还要取得共识。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毛泽东下令暂时取消了对金门的炮击，使得金门炮战得以延迟到8月下旬。而对蒋介石来说，金门炮战的发生，他已经早有预感。1958年8月20日凌晨，蒋介石乘坐一艘“中”字号登陆舰夜航金门。清晨时分，蒋介石在金门料罗湾军用码头上岸。

郝柏村：金门炮战是老“总统”老早就预料到的，情报上是知道的。所以他8月20日还到金门去，召集干部讲话，指示我们必须坚守金门。

曹景行：您当时也参加了？

郝柏村：我参加，我当然参加，我当时是师长。

曹景行：他在讲话当中，预料要发生？

郝柏村：那当然，他预料，这个战争快要发生了，所以你们要赶快准备。

在太武山“毋忘在莒”石刻前，蒋介石同众部将合影存照。这4个字是蒋介石1952年亲手题写的，后来被胡琏刻在巨石上。此时他再次向部下们解释说，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单手中仅仅留下了“莒”这个地方，但坚持不投降燕国，最终恢复了齐国。今天，他们仍然应当“毋忘在莒”“雪耻复国”。

在“古宁头大捷英雄连队”荣史室，蒋介石又题了“冬天饮寒水，黑夜渡断桥”“忍性吞气，茹苦饮痛；耐寒扫雪，冒热灭火”“千秋气节久弥著，万古精神又日新”三副对联。他解释道，这三副对联是他来台之后每日记诵的座右铭：第一联是初来台湾时的心情写照；第二联是痛定思痛

之后决心一切从头开始的誓言；第三联则是必须永远追求的崇高境界。蒋介石勉励部下应当深刻体会，树立信心勇气，磨砺卧薪尝胆的志向。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蒋介石到金门的同一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条件成熟，已经作出了3天后炮击金门的决定。

尽管胡琏为金门的防御进行了积极的工事准备，但是解放军通过侦察，还是将金门的营区、仓库、雷达阵地等重要信息成功标示出来。不过，由于胡琏将最重要的心脏部位——金门防卫司令部（简称金防部）设在绵延数里的北太武山背面山脚下，从大陆任何角度都没有办法观测到，因此无法判断其具体位置。

就在情报部门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有消息传来——近年捕获关押的一批台湾间谍当中，有3人到过金门，并出入过金防部指挥所。通过对他们的审讯，大陆方面得知，金防部指挥坑道位于北太武山侧背坡底偏西处的翠谷，坑口周围是各种保障分队和设施，胡琏及各位副司令、参谋长的办公室与宿舍，修建于谷地两侧山麓。坑口外有一个篮球场，再往前两三百米是一个会议厅，叫“翠谷厅”，是国民党军官会餐、娱乐的场所。

目标已经确定，但是解放军所用炮弹，弹道弧度较大，只能保证越过北太武山落在指挥坑道上面，但却不能保证精准度。为此，解放军专门在大陆勘察选定了一座高度、斜坡度均与北太武山相仿的山头，按照严格的实际距离，进行了两天的实战演练，力求准确无误。

蒋介石视察金门的时候，金防部的地下指挥所南坑道已经竣工，但是因为里面阴暗潮湿，人员迟迟没有撤进去。蒋介石是炮兵出身，他早年曾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战法，又在日本振武学校的炮兵专科深造。他在见到金防部指挥所以后，就对胡琏说：“你们司令部的办公室、宿舍区多沿着狭窄的北太武山谷地两侧建筑，空间太小，又过于密集，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一旦战争发生，敌机空袭，敌炮奇袭，极易遭受严重损害，造成指挥上很多不利，故应将司令部迁移，愈快愈好。”

蒋介石离开之后，胡琏决定尽快把司令部从大金门的翠谷搬进南坑道。但偌大的司令部搬家实属不易，胡琏决定8月21日至23日作准备，24日、25日两天实施搬迁。据说，后来胡琏长久地为自己所选定的“黄道吉日”懊悔不已。

〇武官就报告，说昨天晚上金门发生炮战，老先生很镇定，他说知道

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晴空万里，在金门对岸的厦门，解放军炮兵阵地的459门大炮已经在一个月的阴雨当中悄然布置完毕。而云顶岩前线指挥所直到17点20分，才收到毛泽东的命令——按原计划17点30分准时开炮！解放军的一位前线指挥后来回忆说：“炮击前的那10分钟，很漫长，很安静，只听到桌上马蹄表的滴答声和从瞭望孔吹进来的海风轻微的声响。”此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官兵对即将到来的炮战毫不知情。

郝柏村：炮战当天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饭。通常我们吃完晚饭，大家都要出去看看部队，散散步。当时因为我们知道快要打了，所以我吃完饭以后，还是在指挥所里，等于在掩体里面。

在大金门，金防部司令胡琏和刚刚到访的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在指挥所谈话，三位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和章杰在翠谷湖边聊天。

郝柏村：金防部也准备吃饭，几个副司令官先到吃饭那地方等了。俞大维部长同胡琏司令官还在谈话，还没有谈完，所以他们晚到了。他们还没有到，炮响了。

1958年8月23日17点30分，金门炮战正式开始。第一天的炮击分为三个波次：第一波作战暗语“台风”，持续时间15分钟，对大、小金门及附属岛屿进行了猛烈而密集的炮击，发射了数万发炮弹；第二波作战暗语“暴雨”，持续时间5分钟，重点压制开始零星还击的国民党炮兵阵地；第三波是一次短促的急袭，19时35分开始，每门炮打4发，对预计中的抢救、维修予以打击。仅前两个波次，解放军就发射了近3万发的炮弹，平均每分钟发射1500发炮弹，大约600吨钢铁落在金门的预定目标区上面。

当年的解放军前线指挥石一宸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说：“从云顶岩上望出去，我‘开炮’的命令一下，像按电钮一样，各炮阵地上立刻闪现出一簇簇、一朵朵白色的爆烟和橘红色的火光。声音稍迟才到，是连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巨响，夹带着炮弹划空的尖啸。那动静很难形容，好像整

个天空是一面大鼓，有无数把大锤在上面不停地擂呀敲呀，震得耳朵紧绷绷地疼，脚下的大地也在急促地摇抖。十几秒时间，大、小金门先炸起一片亮点、烟簇；紧接着，亮点变成火海，烟簇形成了烟雾；又过十几秒，传回对岸轰隆隆打闷雷一样的声音。料罗湾海域，炮弹炸起一道道白色的水柱，弹片把海面打得好像沸腾起来，敌人几条兵舰飞快向深海逃逸。我打过的仗不算少了，我军这样大规模炮火轰击却是第一次看到，确实是万炮齐发、弹如雨下，无比的壮观。国民党有线电话被打掉了，只能用无线呼叫告急，我们这边监听得明明白白，一片混乱，有的连暗语都不用，乱叫'共军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被打得没有一点办法'。"

解放军炮兵梁树森回忆说：从抗美援朝开始我就当炮兵，还没有像'八二三'那样一次性集中打那么多炮弹。我们团每门炮平均打了80至100发吧，急促射，不停地打。许多炮炮管都打红了，才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许多魁梧壮实的装填手连续送弹上百发后，胳膊都肿了，第二天连端个饭碗都费劲。有的战士为了加快速度，不用送弹棍，就在右手上缠一块布，蘸湿了水，用拳头把炮弹顶上膛，被几百度高温的炮膛烤起了泡、燎掉了皮。好几个炮位打得快，炮弹打光了，战斗还没结束，急得炮长猴跳，派手下到临近炮位，也不请示，下手就搬。

所有炮位四周，都是空弹壳、空弹箱，堆得像座小山。那天天气晴朗，能见度特别好，肉眼看金门很清楚。我们炮突然一响，开始还可以看到那边的汽车乱跑、兵乱跑，一会儿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们阵地上一片发射烟尘，对岸金门一片烈火硝烟。海风把大担岛上的硝烟吹到海面，与小金门的硝烟相接，继而又与大金门的硝烟连在一起，在我炮阵地前方海面，形成了一道厚厚的灰黑色的把整个金门都遮挡在后面的巨大烟墙，场面真壮观。

"一仗下来，炮手全被退壳烟熏染得漆黑，除了牙齿、眼窝窝是白色的，整个一个'黑非洲'了。大约10分钟过后，国民党一些隐蔽阵地开始还炮，烟太重，看不到他的发射位置，但可以听到炮弹在我们头顶'哧''哧'飞过，在很远的左右后方'咚''咚'炸响。那天，我们确实把金门一下打糊涂了，他还打来的炮，全是瞎打，没打到我们团一门炮一个人。"

解放军炮兵连长梁文科回忆说："我们连4门炮几个齐放，大、二担国民党士兵滚的滚、爬的爬，没命往回跑，我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

本来，他们有三五成群出来拉呱的，有在树荫底下凉快的，还有下海洗澡的，闲散得很，一点也没觉着我们会开炮。打了没多大一会儿，烟尘就把整个大、二担罩住了，啥也看不见了。一、二炮喊：‘报告连长，目标没有啦！’我说：‘看不见也打，按原表尺只管打！’没走到近前，你不会知道打炮声有多响，等于拿一面大锣贴着你的耳根狠命敲啊，太响了！打了十几分钟，战士们耳朵全震聋了，严重的耳膜震破、流血，有的人落下听力下降的残疾。直到现在，我耳朵还时常嗡嗡响，你要不大声说话，我就听不见。”

在第一波的炮火当中，金防部三位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和章杰先后阵亡。俞大维手臂负伤，后脑部被一颗米粒大小的弹片击中，所幸没有穿透头骨，从而捡回了一条命。胡琏则躲过了一劫。

胡琏戎马一生，是陈诚的得力部下，参加过北伐，也曾与日寇浴血奋战。他在鄂西保卫战中死守石牌要塞，成功阻止日军从长江三峡进窥重庆，这场战役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他所属的十八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在山东的南麻战役中，还曾让陈毅的华东野战军铩羽而归。毛泽东曾经亲笔通告：“十八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毛泽东军事文集》中也有7篇专门针对国民党十八军及胡琏的电文。

淮海战役中，胡琏所在的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唯独胡琏背部负伤单独突围，令解放军将领无不扼腕，引为毕生之憾事。后来医生从他身上取出32粒弹片，有几粒与心脏和肺部“仅一纸之隔”。此次炮击金门，对于解放军来说，应该还是暗暗希望能给胡琏一次重击，以雪前耻。

但是命大的胡琏，再次死里逃生，叶飞曾经在回忆录里无限惋惜地写道：“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部，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五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们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顾问刚好要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打死。要是晚五分钟，必死无疑。”

在炮战发生的第一时间，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却并不知道金门的状况。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应舜仁，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58年8月23日那天晚上，在阳明山发生的故事。

应舜仁：那天晚上我当班，武官接到“国防部”作战次长电话通知，晚上金门一下子下了3万发炮弹，发生炮战了。当班的武官要向老先生报告，可是老先生刚刚睡觉了——老先生10点半钟以后一定睡觉，很准时的，已经睡觉了。武官要副官去报告老先生。这副官不报告，他说：“我怎么可以报告？这样子吵醒他，我要杀头的，怎么可以吵醒他？”他不肯报告，那武官没有办法了，只好第二天早上再报告。

第二天6点钟到8点钟也是我当班。老先生一起来武官就报告，说昨天晚上金门发生炮战，老先生很镇定，他说知道：“哦哦哦，就是这样子。”当时我们听到脚都会发抖，都觉得局势非常紧张，老先生他就照样是静坐，一早起来做祷告，静坐40分钟。我看到他一点表情都没有，如果有表情，这个就很严重了，可是金门炮战，他没有。这个换句话讲，在我们来猜，他心理上有先见之明。

早在8月20日，蒋介石视察完金门，在即将登上返程飞机的时候，他就对胡琏说：“你牢牢守住金门，便是对党国尽忠。平时可以向那边打打炮，把毛泽东打恼最好。若毛泽东真的来打金门，是天大好事。”在蒋介石看来，他也希望探知美国对金马的态度。因此，对于解放军炮击金门，其实他早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

8月24日，全球各知名报刊都以最重要的消息报道了金门炮战。新华社却仅在不特别显著的位置刊了一条简短的消息：神炮手严惩蒋贼军，敌炮兵变得哑然无声，运输舰一支被我击中。对一次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只是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显然，毛泽东并不想把此事大肆张扬，他要审慎地观察一下对方将如何应对。

金门炮战打响以后，在接下来的数十天，准备充分的解放军持续密集地向金门发射炮弹。金门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受到了炮弹的攻击，而金门军民，更是饱经炮弹洗礼。

郝柏村：小金门的面积是13.6平方千米，整个金门大概是150平方千米，小金门的面积是大金门的十分之一，但是在44天的炮战当中，承受的炮弹占了一半，20几万发。大金门、二担，也是20几万发，所以小金门打得很惨。每一个地方，被一个炮弹一个炮弹炸得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好像犁过地的一样。

曹景行：那老百姓受影响大不大，那一段时间？

郝柏村：小金门有大概5000名老百姓。那段时间，老百姓在家里，都是住在挖的洞子里面。另外，当时有很多妇女能够送到台湾来，于是就送到台湾了。所以老百姓伤亡不大，就是生活上受影响比较大。

曹景行：那听说后来金门的菜刀打了很多很多，用的都是当时的弹片。

郝柏村：弹片，对，弹片太多了，所以收集起来做菜刀。

在解放军猛烈而密集的炮弹攻击当中，身处前线的郝柏村，也经历了生死一线的时刻。

郝柏村：在那个炮战期间，我几乎被打到。因为我正在指挥所里面，我上厕所。我刚刚上完厕所，坐回来。门外是厕所，进了门，门里面是沙发。我刚刚一进来，坐到沙发上，“砰”，一发炮弹把厕所打掉了。

曹景行：厕所打掉了？

郝柏村：厕所打掉了，没有打到我。

与死亡擦肩而过，让郝柏村事后心有余悸。而作为炮兵指挥官，巡视阵地也是他无法推卸的职责。可以说，他每次巡视几乎都是在炮如雨下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谓危险重重。多年以后，郝柏村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郝柏村：炮兵阵地、指挥所、师指挥所、滩头、海滩……那时候所有地方都是日夜不停的，44天每天平均5分钟到10分钟，一定会有一群炮弹来。但是有的时候，我还要出去看部队。炮弹这么密集，怎么办呢？那我的做法就是，因为我的指挥所是在山洞子里面，已经搭了坑道，我的车子——吉普车也是在洞口上，然后看着一群炮弹，“砰砰”下来了。暂时没有炮击了，我马上上车蹿出去。我出去看了部队，我要回指挥所怎么回法呢？那我就把车开到离我很近的掩体里，然后等、等、等，“砰砰”一群炮弹下来了，我马上把车开出去，慢慢挪回指挥所。我就是这样做的。

〇美军护航运补只到离大陆12海里

从8月24日，也就是炮战的第二天开始，解放军一面炮击金门，一面出动海军打击国民党运输部队，金门遭遇封锁，日补给量只能达到平时的5%。为了缓解金门的窘境，国民党开始出动飞机空投。据说当时大陆这边还曾观察到金门守军士兵不畏炮火，争抢空投食品的场景。

郝柏村：这个时候，我们要抢滩上岸。抢滩，主要还是运补给，重要的东西还是补给。打了差不多10天以后，他主要就是封锁海滩了。封锁海滩，虽然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运补上去。同时我们还有一部分是空投。一空投，他就打了，但是他只能用炮打，他不能用他的飞机出来打。因为当时我们的空军用了美国援助的“响尾蛇”飞弹，大陆还没有飞弹，没有空对空飞弹。所以我们差不多打下30架飞机，只损失了一两架飞机。所以继续打下去，空域还是在我们手中，中共当时的空军还不行。

1958年9月4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各岛……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和领海上空。

同日，得知这一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相关”，“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持续采取及时又有效的行动”，“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希望：北平不至于蔑视人类要求和平的意愿”。军事评论家将这份声明视为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的代表作，杜勒斯自己也说：“我们过去曾被带到战争的边缘。到达这个边缘而又不卷入战争的本领是一种必要的艺术。”接着，美国方面表示第七舰队可以为国民党的运输船队护航，以确保金门守军的补给。

美军舰队开始护送国民党运输船之后，解放军中央军委当即作出指示：“对美国军舰掩护蒋舰艇侵入我国领海的行动，我外交部发言人已对美国提出警告。若美国军舰再来，我将再次警告。经过两次警告之后，如美舰再侵入我领海掩护蒋军舰艇行动，我即集中炮兵和海军的力量，

对停泊料罗湾的蒋军舰艇进行轰击；但仍不打美国军舰。”

对于解放军“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美军的反应是迅速撤离战场。台湾“中央社”记者曹志渊曾对此作了报道：“记者采访护航舰队抢滩新闻，亲眼见到美国护航舰将我运输船团送到距离金门三海里处，并不注意压制匪炮可能的射击，一任我登陆艇驶入海滩，在炮火下挨打。炮弹的碎片如雨般四处喷飞，射在船上，射在滩头搬运者的身体上，使记者为那些冒着炮火执行任务的海军弟兄和抢卸物资的金门民防队弟兄流下了无限伤感的眼泪。”

解放军的这种策略，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是有意让国民党军队继续留守金门，以维持内战的形式。

郝柏村：美国当然是支援了。但是这个支援，可以说是以不直接介入军事冲突为前提下的支援。毛泽东他也很清楚，金门炮战怎么打都行，就是不能打到美国人，不能打到美国的船。他也不希望造成同美国军事方面的直接的冲突。所以炮战期间，一直是这样的形势。当时我们判断大陆会不会登陆，打了3天以后，他没有情况，我们判断他不会登陆了。那么，他就长期地封锁。封锁呢，我们就要突破封锁，所以美军才护航，但是美军只护航到离大陆12海里。

〇晚上他打他的，我们照样睡觉

郝柏村管辖的大、二担岛，面积不过1平方千米，却屯兵上千人。因为饱受轰炸，又遭遇封锁，形势危急，大、二担岛成为台湾军方关注、担忧的焦点。在大陆火力的严密封锁之下，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二担的灶具被打光，水井被破坏，守军不仅吃不到热食，连喝水都要靠老天爷下雨，日子艰苦异常。

郝柏村有记日记的习惯，金门炮战20多年之后，他的《八二三炮战日记》在台湾首次发表，却被列为“机密”书籍，仅仅印了300本。直到前些年，这本书才大白于天下。这些日记当中，关于大、二担的内容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它详细叙述了守军的艰苦及出现的一些弊端：

9月13日，星期六，晴。我不抽烟，当然不知缺烟的痛苦，自炮战发生以来，香烟运补中断，有瘾者深以为苦，竟有一支残烟，数人分抽一口者。余虽不知其中真味，但鉴于缺烟正如缺粮，故决心令成功队将香烟运来。而该队尽一夜冒敌炮火之劳，竟不负众望。嗜烟者倘能记及，一口烟雾，亦系同志同胞生命血汗之代价，而更知所奋勉矣。

9月21日，星期日，晴。上午召见胡文斗上尉询问大、二担状况。目前大小金门及大、二担状况是同样艰苦，不过大、二担为最。而目前炮兵、通信、兵工人员及运补人员之冒险犯难，其艰苦亦不较大、二担将士为轻。胡上尉在大担期间，一般观察，士气似已趋低落，渠等曾写出若干问题及困难：

一、究竟怎么办，还要守好久？

二、目前最大困苦为行动困难，工事日见破坏，人员日有伤亡，只有挨打而无法还手。

三、水井遭受封锁，对二担通信联络困难，状况不能详悉。

四、炮兵火力制压敌炮不如理想，时常中断，任敌炮自由破坏工事。

以上状况都是事实，但必须由干部之精神力以克服这些苦难。从下述事实证明重要干部尚有不够坚强者，如连长见营长哭，而营长，以哭

对之。又对于与烈屿（小金门）通话之副师长嘻嘻哈哈表示不满，甚至要求上级派船送彼等突击大陆，宁愿拼死而不愿挨打守死等心理。余派胡上尉赴大担之目的，在了解彼等确实处境，对于渠等因处境艰苦所表现之变态心理，自愿曲谅之。遂决定派胡上尉于今晚赴大金门，并携去工事被毁状况图，亲向司令官报告当前大、二担状况。晚悉二担今日伤亡18员，状况艰苦。

9月23日，星期一，晴。……夜间又接邹雅旭告急电，竟谓‘工事全损，各排分别避难，战力全无，全属无谓牺牲，速救速救’。但并未报伤亡，实际二担自炮战以来伤亡尚未及百分之十，邹员之告电，徒显其贪生怕死魂不附体，此实原先之委任不当也，余至为不悦。

郝柏村：他打得很全面。一天打下来，一两万发——头一天差不多打了有5万发了。那前3天，我这个小金门没有还击，因为我怕他登陆，尤其怕他登陆大担，所以我把我的炮都对着大担，准备支援。过了3天以后，我们判断他不会登陆了，那我就还击了。还击他们，很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最初3天，他打我们，我们一声不响，他以为我们的炮都打坏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还击了，结果过了3天，全面地反击他。当时他们的炮，没有钢筋水泥的掩体，都是露天的，损失很大。

后来美军把8英寸炮送到金门去——“八二三”开战的时候，金门没有8英寸炮，是炮战期间送上去的。那8英寸炮送到金门以后，我们的炮的威力，就比解放军要大得多了。解放军当时的炮是152的加农炮，最大的口径是152。那我们是8英寸炮，8英寸炮是203厘米，所以准度、精度、威力都比解放军的大。但是因为补给不足，我只能一门炮对他一个阵地打。打了44天，我的炮弹只用了一半，我还有一半。但是这个一半不到1万发，所以我一天只打几百发。

曹景行：那其他物资的供应呢？

郝柏村：其他物资的供应当然更困难一点了。

曹景行：那段时间你们怎么过的？

郝柏村：比方说吃的菜，我们靠原来存储的罐头。蔬菜，当时我们在小金门，吃一些空心菜还可以，其他的地方连空心菜都没有，都是靠罐头。这个储存的粮食，我们如果要坚持半年以上，都没有问题。

在连续44天的炮击当中，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都隐蔽在地下坑道内。虽然人员伤亡并不是很多，但是长时间的坑道生活成为了影响士气的关键。一个曾经在金门服役的姓张的老兵说：“大陆的炮虽然厉害，但不可怕，因为我们都钻到洞库地堡里去了。真正可怕的，恰是在洞库地堡里的生活。你想想，十万军队、五万百姓成天猫在地底下，蓬头垢面，不见天日，靠定量配给的压缩类、罐头类食品度日，好多人浮肿，营养不良，加上蚊虫叮咬，缺医少药，得痢疾、胃病的人特别多。那时正是最热的天气，一天到晚出汗，又没有多余的淡水洗澡洗衣，人长痱子衣长毛，每一个地堡都成了一个‘毒气罐’了，相距十来公尺，阵阵臭气能把人顶个跟头。那确实不是人过的日子。”

高雄籍预备军官陈进宝所在部队当时接到了增援大、二担的命令。他说：“大担是一个1平方千米左右的小岛，它不但最靠近大陆，同时被视为最危险的地方，在整个炮战期间，是遭受匪方炮击最激烈的地方。我们知道敌人不敢登陆大小金门后，仍相信大担恐怕要受奇袭，因此谁到大担，谁就得觉悟，一旦有事，必死在这个地方。”“大担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一家民房，我们从表面见不到一个士兵，树木、草皮、道路被打得找不出痕迹。可是哨子一吹，一群一群的士兵就（像）蚂蚁一样，会从地下蹿出来。我们立即投入这样的生活。想不到，人还没有死，就先钻入地下学习方法了，不过这是战争，这里是前线，住在台湾的人实在是无法想象得到这种生活的。”

郝柏村：师指挥所是一个很小的山洞，当然现在都是很大的坑道了，现在里面都是很舒服了。当时我们这个指挥所，大概只有一个小房间这么大。我跟副师长、几个参谋，我们就在洞子里面，几十天都在那里面。晚上他打他的，我们照样睡觉。平均过5分钟、10分钟，我那个指挥所一定要落炮弹的，但是我不能不睡觉，几十天不睡觉不行啊。

除了环境的艰苦，影响金门官兵士气的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位金门退役上校指出了问题关键所在：“物质环境的艰难困苦会影响军心，但也能砥砺士气，你们毛先生带领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最能说明问题了。事实上，舒舒服服养尊处优的军队打不了仗，如果单从金门被封锁了几天，便推断金门的士气垮了未免过于武断。……其实，真正影响金门军心士气的不在这些地方，而在于戍卫作战的目的不明确，前途看不到。反攻大陆吧，根本不可能；保卫台湾吧，金门离台湾远得很，待在这个小岛上能做什么？抵御侵略吧，实际上是在同自己的祖国作对。而且谁

都明白，共产党把偌大一个中国都拿去了，还拿不下一个小岛？解放军基于各种考虑只是暂时不打，人家真动手，你兵力增加一倍也守不住。再加上思乡怀亲，所以才会苦闷、彷徨、消沉颓废，才会醉生梦死、惹是生非。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作战对象是日本鬼子，保卫的是自己的家园父老，金门官兵也会是好样的。”

〇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错的

1958年10月6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而这份文件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说，暂停炮击7天，并提议举行谈判，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拒绝。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27]，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告台湾同胞书》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一周后，解放军宣布再次停火两周，到10月20日，解放军称因为美方军舰对台湾运补船护航，停火无效，双方继续大规模炮击作战。到10月25日，双方仍持续炮击作战。随后解放军方面宣布按“单打双停”的方针持续炮击，即单日炮击、双日停火。此后每逢单日，两岸常向对方进行零星射击，或者发射宣传弹，大规模炮击再未发生。

1979年1月1日，随着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历时21年的金门炮战正式结束。

郝柏村：他宣布停火，（已经）打了44天，（后又）宣布停火一个

礼拜，然后又恢复打。大陆最后是宣布所谓的“单打双停”，当时毛泽东的这个做法，解放军的军队也都很奇怪。所以彭德怀发表文告以后，大家都说不懂，不懂为什么打打又停停，停停然后又打，又什么“单打双停”，不懂不懂。

但是毛泽东，军事上是一个手段，政治上是一个策略。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金马外岛在国民党的手里。因为这样，由金马外岛拉住台澎，就不会搞“台独”。这当然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考虑，不过这个考虑，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错的。

第七章　陈明忠：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

讲述人　陈明忠

陈明忠，台湾高雄人，1929年出生。成长于『日据时代』，自小接受『皇民化教育』。就读台中农业专门学校期间，曾被迫征召进日本军队服劳役，直到台湾『光复』才得以继续学业。『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参加民众对政府的抗争，担任『台湾民主联军』突击队长，与国民党军作战，经历了民众抗争的最后一役。失败后遭到通缉，在老师的帮助下幸运逃过一劫。毕业后到冈山农校任教。『白色恐怖』时期被逮捕，在狱中服刑10年。1976年再次被捕入狱，历尽严刑拷打，服刑11年。两次入狱都曾被判处死刑，后又死里逃生，也因此成为台湾最后一名政治死刑犯。

讲述人　冯守娥

冯守娥，陈明忠之妻，台湾宜兰人，1930年出生。自幼接受日式教育，但因为家人的影响，民族意识强烈。台湾『光复』后，积极参加学生活动。高中参加读书会，『白色恐怖』时期因此与哥哥同时被捕入狱，哥哥被秘密枪决，自己也在狱中待了10年。出狱后与陈明忠相识、结婚。曾经长期受到监视。

“二二八事件”

又称“二二八大屠杀”，大陆方面称为“二二八起义”，是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争和军队镇压的事件。

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几名查缉员在台北市的天马茶房前，查获贩卖私烟的妇人林江迈。双方发生争执，吸引大批民众围观。争执中，林江迈被查缉员的枪托击伤头部，围观的民众愤然将查缉员包围。查缉员开枪示警，混乱中，将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打死，几名查缉员也趁乱逃进警察局。当晚，愤怒的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严惩凶手，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2月28日，台北市部分地区展开罢市、罢工，许多民众前往“专卖局台北分局”抗议。抗议中伴随发生零星的焚烧事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

随后，抗议民众来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示威，遭到公署卫兵开枪扫射，并造成伤亡。愤慨的民众继续示威集结，于3月1日爆发了蔓延全岛的反抗政府事件，被国民党军部队镇压，造成许多人伤亡。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奉令来台调查，声明“政府”将以和平宽大的方针来处理，除了奸徒、共党、图谋不轨者严惩不贷之外，其余人一律从宽免究，此一事件才慢慢平息。然而此后数十年，“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一直在台湾没有消除，也成为后来“台湾独立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

白色恐怖

又称“戒严时期”，是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恐怖独裁统治。从1949年到1987年7月15日，长达38年。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发布“戒严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实施“戒严”，“戒严期间，由戒严地域的最高司令长官掌管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随后，又陆续颁布了诸如“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惩治叛乱条例”等相关管制法，实行党禁、报禁、海禁等。政治力介入人民公权力，剥夺了民众的自由和基本权利。政府还对政治上的异议人士、左派人士以及许多无辜者进行逮捕、审判、关押或处决。据统计，在“戒严”期间，台湾共发生29000余件政治案件，牵涉人数达14万人，其中有三四千人遭到处决。

1987年7月14日，在民意的压力下，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同时废止“戒严”期间制定的30项相关法令。“国防部”也对237位“戒严”时期遭到“军法”审判的民众予以减刑或释放。至此，“白色恐怖”在台湾走入历史。

目前，台湾社会对这段特殊时期的功过还未产生一致的结论。亲国民党的人士认为，政治上的独裁固然残酷，但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民进党方面则持批判的态度，认为不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

曹景行：81岁（现年83岁）的陈明忠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曾经两度入狱，被判处过两个死刑；虽然他最终活了下来，但是在狱中已经度过了21年的时光。陈明忠的人生悲剧，源自

60多年前那一场席卷台湾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18岁的陈明忠是台中农学院的一名普通大学生。那年2月，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风暴骤起，陈明忠和众多台湾青年一样，为了打倒贪官污吏，为了争取台湾的民主和自治，而投身民众运动。在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时刻，18岁的陈明忠成为了“台湾民主联军”的突击队长，他亲身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中民众抗争的最后一役。那时的陈明忠不会想到，他的人生即将被卷入政治的旋涡，跌宕起伏，身不由己。

1895年，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在治理台湾时采取同化政策，力图使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与日本接轨，而对于台湾本土进步人士提出的台湾人与日本人地位平等的要求，却予以严厉打击和镇压。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又对台湾人推行“皇民化”政策，大力推广讲日语，在各地都设立了“国语（日语）”讲习所，并取消报纸的中文栏，废除学校的中文课，还强迫不少台湾人改为日式姓名。

1929年，陈明忠出生在高雄冈山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生在“日据时代”的陈明忠，从小就受到“皇民化教育”，日本老师总是告诉他，“你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

陈明忠：小孩子的时候接受“皇民化教育”，我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这个观念很深厚。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想，做日本的什么？我希望将来是日本上将，骑白马，小时候的愿望居然是这样。

小学毕业后，陈明忠考上了“州立高雄中学”。当时一个班里有50名学生，大部分都是日本学生，台湾学生只有10个人。陈明忠第一次感受到，台湾人和日本人是不同的。

〇15岁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陈明忠：到了高雄中学，才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日本人）说的一视同仁都是假的。这个（些）日本人，不管是老师、同学，（还是其他）学生，都骂我们“清国奴”，动不动就打我们。一视同仁怎么会这样？我开始怀疑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究竟是什么人我都搞不清楚了，本来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结果人家不承认你是日本人，那你是哪里人？

陈明忠说，这个问题让他苦恼了两三年，终于有一本书让他弄清了心中的疑惑。

陈明忠：后来我看到“三民主义”，不过这个“三民主义”不是孙中山的。是孙中山的一个部下写的，书名大概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日本人把它翻译过来了。我看那个书才知道——当然书里面的那些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我搞不大清楚，我那时候才15岁，不过民族主义看得懂——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于是思想开始转变了。

陈明忠的夫人冯守娥女士，1930年出生在台湾宜兰的一个农家。虽然冯守娥从小在家说的是日语，在学校读的是日文，但是由于家人的影响，她很早就具有了民族意识。

冯守娥：我小时候就受我的家庭环境影响。我爸爸是蛮有民族观念的，对于日本人的殖民地统治很反感，尤其是在日本时代读了东洋史，知道中国的情况很糟糕，从鸦片战争以来都是被欺负的，也受到日本的欺负。所以在家里，我爸爸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这样我就一直都有民族观念。等到后来长大了，看到他们（日本人）对台湾人的不公平，我就很生气，对日本的反抗心理更强了，所以到“光复”后当然就很高兴了。

冯守娥说，她永远都记得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整个村庄的人都被日本人罚跪在烈日之下，理由是上缴的稻米数量不足。但冯守娥没想到，一回家就在广播中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家人顿时沉浸在狂喜之中。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陈仪在台北主持受降仪式，正式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入中国版图。随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很快，国民党军也进驻台湾。为了台湾“光复”，许多台湾人纷纷走上街头庆祝。由于长期分离，不熟悉中国，当时在台北街头，还有台湾人将中华民国的国旗左右弄颠倒。

冯守娥记得，那个时期她和别的台湾人一样，满心欢喜迎接大陆来的同胞，迎接中国人自己的军队。

冯守娥：国民党军来，我们也是很欢迎的，所以常常替国民党军讲好话。人家说，怎么穿得那么破烂？我们就说，八年抗战，当然很辛苦了，所以才那么破烂。还有那个绑腿，绑得松松的，好像跟日本兵不太一样。我们就说，那个里面是有铅块的，平时把铅块绑在里面，打仗要进攻的时候，就把铅块拿掉，这样跑得比较快。我们就这样跟人家解释，都是在替国民党军讲好话。

台湾“光复”之后，冯守娥用极大的热情学习中文，阅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文书籍，她说那时台湾青年中最流行的口号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冯守娥：尤其是老师都是很进步的，他们那个时候也教育我们抗战时期得努力。我们在学校，大家都觉得，好像战后的生活跟日本时代不一样，就是比较民主了。我觉得那三年得到的教育，比过去九年的“皇民化教育”好得多了。“皇民化教育”的时候是完全被奴化的教育，而在“光复”后，我们觉得那个教育是真正的民主与科学。那阵子还常常讲五四运动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学校也纪念三八妇女节，也纪念五四运动，很积极，很活跃。比如说五四运动，我们就写快报，写壁报，或者组织什么活动，那个时候还有学生自治同盟。

陈明忠1944年就考入了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然而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大力招募台湾人从军。到了1945年1月，更是全面实施征兵制度。和许多台湾学生一样，陈明忠也被征召进日本军队，在高雄要塞挖地道。台湾“光复”后，陈明忠总算回到了学校读书。

陈明忠：我觉得大陆来的老师比台湾的老师还好，为什么呢？大陆来的老师因为受过新式的教育，比较开放，比较民主。而台湾的老师受的是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军事教育，比较习惯用压制的、命令式的方

法。所以我们那时候对外省来的老师印象很好啊，不是我一个人，大家好像都这样。高中好多学生也有这个感觉，大学就更多的人有这个感觉了，就觉得说大陆来的人比较开明。所以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外省、本省的观念。

○这么腐败的政府，要把它推翻掉

台湾光复，民众欢欣鼓舞，然而还没等他们从回归祖国的喜悦中走出来，就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由于学校、商店、工厂、医院等建设都遭到了战火的严重破坏，战争造成的创伤一时难以痊愈，日本政府又停止了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使得金融秩序极度混乱。国民政府在接管台湾后，大量印制钞票，又将民生物资运往大陆资助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失业人口众多，当时的台湾社会一片乱象。再加上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官员认为台湾人被日本“奴化”，不信任台湾人，而当时大多数台湾人又不会说中文，因此无论在社会权利，还是工作职位上都受到不公平对待。

同时，国民党的表现也让人失望。行政长官陈仪大权独揽，接收大员们贪污腐化，国民党军士兵更是军纪无存，乘车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强迫赊借、偷抢拐骗、开枪伤人、强奸妇女等事情常常发生。

冯守娥：他们抢东西，接收人员还乱来。所以后来看到他们，民众好像都很不平。尤其东西一直涨价。其实在我们的认知里，外省人不是通通很坏，坏的就是接收的那些人，或者说是那些军队，乱来的是他们。

陈明忠曾经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军的“阿兵哥”恃强凌弱，欺负当地的农民，也听说了太多大陆来的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的“五子登科”、大肆敛财的行径。陈明忠说，他原来以为大陆来的人会流着热泪拥抱台湾的同胞，然而，现实却很不一样。

陈明忠：“光复”的时候来的那些人，根本没有把我们当做同胞，那是当做什么呢？好像是占领台湾一样。那个乱呀，贪污腐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像土匪一样的。所以一下子，“二二八”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参与了，就想这么腐败的政府，要把它推翻掉。

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闹市打伤女烟贩，并且开枪打死路人，引起公愤。第二天2月28日，台北民众进行游行请愿，而游行队伍在向“行政公署”请愿的过程中遭到卫兵枪击，从而引发

了席卷台湾的民变。

陈明忠："二二八"在台北发生了，可是我们台中不知道。那一天晚上，大概27日还是28日晚上，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的时候，台北有两个大学生来我们宿舍，他说你还看什么电影啊，现在台北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他就讲台北查私烟，开枪了，死了一个人，所以大家整个都起来了。我很吃惊，有这么一回事啊？他说3月2日，台中要开市民大会，在台中戏院里面，我说好啊，我参加，我就是这样参加的。

谢雪红[28]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二二八事件"之后，她又发起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为台盟的首任主席。有研究者把谢雪红称为"二二八事件"的第一女主角。在当时一份军统局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谢雪红被列为"二二八事件"的八大匪寇之首。

1947年3月2日，陈明忠在台中剧院的市民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建国"

工艺职校的校长谢雪红。

曹景行：早上开始的，当时去了多少人？

陈明忠：满客，满满的，整个戏院满满的。

曹景行：谁主持的呢？

陈明忠：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出来的是杨克煌[29]。杨克煌就是后来和谢雪红一起到大陆去的那个人，"日据时代"他是共产党，台湾那时候的共产党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好像是这样，我们知道有这种人，可是没有见过。杨克煌最先出来，然后介绍谢雪红出来演讲，她的意思好像就是说，现在的政治腐败，要推倒，要一个民主的政府，她说的就是这样嘛。

曹景行：主要是针对腐败。

陈明忠：腐败！对，对，打倒贪官污吏嘛。当时大概是台北的处理委员会出来讲过两个：一个要求民主，一个要自治。可是一般老百姓的看法就是打倒贪官污吏，所以大家都赞同她。那时候大家都很激动，非常激动，就说："不要再讲了，走！"大家就走出去了，走到台中警察

局。

我慢慢地走，等我去的时候，谢雪红已经叫台中县长刘存忠跪在阳台上，那等于是市民公审刘存忠。大家都很激动，要求谢雪红把他枪毙掉。谢雪红说，他是贪官污吏没有错，很坏没有错，可是罪不至死，不要枪毙了。因为谢雪红有声望，她讲的话人家都认为有道理，就同意了。还有些人要求把他的耳朵割下来，她说："哎呀，这太野蛮了，不要这样做了"。后面就有人提议揍他。揍可以，就叫旁边的人揍他，我记得是这样。后来我们就到了警察局里面，那里放的有枪，我们就去拿枪，把枪拿出来大家分了。

陈明忠记得，大家从警察局里拿到了分发的枪支就各自回家了，然而第二天，当地驻军就开始了镇压的行动。

陈明忠：在台中市政府附近，几个人围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干什么。突然国民党军一个车子来了，那上面安有机关枪，旁边还有沙包，好多士兵在里面，看到人就射。开玩笑，这个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赶快躲起来，还没有还枪。这真是莫名其妙，我们还没有动什么，你倒先开火。

陈明忠说，受到袭击后，民众开始向台中军队的集结地——教化会馆发起进攻。

陈明忠：从早上一直攻，我参加的时候快中午了吧，一直攻，攻到晚上他们才投降。投降了以后我们就进去了，里面好多日本的装备，像空军的飞行员的衣服，还有皮鞋，日本刀也有，还有手枪，大家就拿起来，都武装起来。

曹景行：这是谁指挥的呢？

陈明忠：没有人指挥啊，主动去的。

曹景行：没有人指挥？

陈明忠：没有人指挥。

曹景行：就带着那天从警察局那边拿出来的枪？

陈明忠：是，带着枪，好多人都有枪了。因为他先开枪，所以大家

都很气。

曹景行：那你们学生当时有给打死或者打伤的吗？

陈明忠：当时看到的学生是高中生，大概是台中3个学校的高中生。有没有死，我不知道。

曹景行：后来那些士兵呢？军队的人呢？

陈明忠：后来我们打到晚上，他们投降了——其实说起来，不是他们投降。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眷属姊妹在里面哭啊。当时台中的主要部队都集中在那里，整天一直打，他们的家眷就哭起来了，要求投降。实际上我们真的一直和他们打，我们是打不进去的，因为他们有机关枪，同时有棉花嘛，一捆一捆的棉花。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没有死伤，但是我们就有死伤。

陈明忠说，当时他们抗争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打倒贪官污吏”。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些外省来台的普通民众也成为了袭击的对象。

陈明忠：有些人看到外省人也打，那我们就说：“这个事情是打倒贪官污吏，怎么能打外省人呢？”好多人搞不清楚了，因为打贪官污吏是没有错，可是做官的差不多都是外省人。实际上说起来，好多外省人（贪官），因为做坏事就躲起来了，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事情就出来，结果就挨打、挨揍，这些是有的。后来我看资料，台北那边有一批流氓，他们台中也有人，相互都有联系的，就想把问题扩大，他们就打外省人。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大家没有想到打外省人。

当时像我们学生看到外省人被打这个情况，心里觉得不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外省的老师印象好，我们怎么可以打外省人呢？我们要打的是贪官污吏，不是外省人。所以我看情形不对，我就把学校的校长——他也怕，我到他家里，带他们全家到学生宿舍里面。还有好多教授，也把他们带来，保护他们。

〇回去才发现这下糟糕了，台中整个城市没有人，静静的

随着民众运动的兴起，1947年3月初，谢雪红在台中成立了“二七部队”，成员主要是台中几所学校的学生。之所以以“二七”为名，源于2月27日的缉烟事件。陈明忠当时并没有加入“二七部队”，而是和民众一起把手榴弹等军火装上开往台北的火车，支援台北的民众。

陈明忠：大家组织起来，我记得那是台中农学院队，就在我们宿舍里面。我带他们到台中火车站，那时候等于是占领一样啊，就在那儿维持治安。后来台北这边递通知来说没有武器，要我们支援武器。我们说武器没有那么多，但还是寄给他们了，我记得手榴弹是寄（托）给火车的司机，叫他们帮忙带。不过他们到底有没有带到，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此时，解放战争在大陆已全面展开，台湾岛内的驻军大部分被抽调到前线。“二二八事件”发生初期，全台湾的正规部队只有一个团加一个营，总共5000人的兵力，而且分散在台湾各地。1947年3月8日，国民党军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率部登陆基隆，开始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此时陈明忠身在外地，当他要返回台中的时候，周围的人劝他不要回去了。

陈明忠：他说：“你不要回去，国民党军要来了。”我说：“奇怪，如果真的要来，我们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听到消息呀？”所以他说不要回去了，我不大相信。他说：“如果你一定要回去的话，你的武器，我们给你保管，不要拿武器，拿武器的话碰到国民党军会被他干掉。”所以我就把武器给他了，然后回到台中。回去才发现这下糟糕了，台中整个城市没有人，静静的。而且我们走路的时候，我还穿皮鞋，日本空军的那个皮鞋，走在路上“当当当”地响。当时整个台中都没有人走路，我就很紧张。

由于台中形势很严峻，陈明忠很快离开了台中。在埔里，他加入了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也是在那时“二七部队”改名为“台湾民主联军”。

陈明忠：搬到那边去，谢雪红就叫我睡在她的旁边。那时候谢雪红，她在“二七部队”的地位好像总指挥，大家有什么事情都请教她，但是她真正的职务我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叫她“欧巴桑”。大概她就是总指挥，最高的了。里面好几个领导人，他们来请教她，“欧巴桑”“欧巴桑”地叫。因为我就睡在旁边，所以他们说什么我都听到了。我以前和他们没有来往，可是他们也知道我参与过打教化会馆，而且我是学生嘛，那时候农学院在台中算是最高学府，所以大家好像没有什么警戒性，都在一起。

谢雪红说，把“二七部队”改名为“台湾民主联军”，因为嘉义张志忠
30 领导的叫做“台湾自治联军”，“二二八”事件主要的诉求是民主和自治，他叫“自治联军”，所以我们这里叫做“台湾民主联军”，要改名。

她这样说，大家就兴奋起来了，大家就开枪，向天开，“乓乓乓”。后来谢雪红就叫我说：“明忠，我们去练手枪。”她带我去郊外，准备一个榻榻米，放在大概50米远。她就和我练枪，她打5发，只中了3发。我觉得很差劲，目标那么大，50米还会打不中？那我就打了，结果5枪一个都没有打到，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手枪和步枪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谢雪红，一个欧巴桑，打得真好，对她很尊敬。

在“二七部队”改名为“台湾民主联军”后，陈明忠被谢雪红任命为“台湾民主联军”的突击队队长。1947年3月15日，陈明忠和战友们一起进攻日月潭方面的国民党军。

陈明忠：一个车子里面30个到40个吧，就去进攻了。指挥的人叫做古瑞云，到大陆以后叫做周明，他是总指挥。总指挥下面有两三个队，我是其中一个队。我们的车子从埔里开到一个鱼池旁就停下来了，因为害怕国民党军听到车子的声音，他们会有准备，所以我们停下来走路。

走到那边的时候，忽然探照灯打过来了，我们因为打过仗，所以赶快卧倒，马上机关枪就扫来了——他们在那等，埋伏着等我们，所以我们赶快卧倒了。没有看到对方在哪里，可是听到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只好把枪架在头顶这样打，根本头都不能伸出来呀，可能是丢了手榴弹，整个山呀、湖呀，声音很大，“乓乓乓”。

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突击队果断作出决定，向对面的国民党军发起冲击。

陈明忠：打了大概半个钟头的样子，总指挥周明讲："这个样子，对方有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就知道有机关枪。如果没有进攻，到了明天早上，他们的援军就会来，就把我们整个消灭掉了，所以要冲。"他讲得有道理呀，可是我说："这不能冲，他们有机关枪，我们根本就上不来。"

他过了几分钟又来了，他说："明忠，不冲不行啊，真的等到明天我们整个都死掉了，你现在冲，也许还有救。"这个确实是事实，只好冲了。冲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部下讲，我说预备的时候——大家"哇"大声叫出来，大家都说好啊。所以冲出去的时候，我喊预备，大家都"哇，冲"大声叫出来。不单是突击队，其他的人也都叫出来了。

大叫的时候，机关枪停了，他们跑掉了，所以我们冲出去的时候没有死。我们的声音把他们吓坏了，我们怕，他们也怕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只是要冲。"哇"——他们就赶快把机关枪丢掉跑了，我们一直在后面追。

陈明忠的计策让部队顺利突围，他们不仅扭转了局势，还抓获了国民党军俘虏。

陈明忠：听到草里面有声音，一看，有国民党军在里面。抓了三个回来了，那就倒霉了，事实上只有三个，结果后来警备署的记录里偏说我俘虏了250个。不可能的，前后抓的俘虏总共也只有30多个、40个，怎么会一次俘虏250个？带也没有办法带，也没有车子，只有3个。可是为什么记录里面说俘虏了200多个？两三百个，那都是我的罪状，真是莫名其妙。

就在陈明忠他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1947年3月16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埔里，陈明忠带领着战友们在一座小山上迎战。

陈明忠：我一站起来，枪子儿就这样从旁边过去了，我从眼角看到的，衣服都给弄破了，所以胳膊这有伤嘛。我打前面，怎么旁边枪子儿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旁边的人撤退了，那边有很多国民党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打前面。所以说没有经验就是这样，只打前面，人家占领了，我都不知道，那距离恐怕100米都没有——所以我能捡回一命，算很幸运的——我一看，前面有国民党军，这边有国民党军了，那边又来了，赶快逃亡

啊，所以我带着头走了。

这一战，国民党军占了优势。陈明忠手下的12个人只剩下了5个。寡不敌众之下，他们一起悄悄下山，回到埔里，想跟大部队会合。

陈明忠：回到埔里的时候，我去看医生，我受了伤，那一块肉没有弄好，我叫他把它切掉。就看那医生手发抖，他手一发抖，我就痛得不得了，最后我说："好了，给我包起来好了。"因为那时候枪声、炮声到处响，他听到声音就怕得不得了，所以我让他包起来。包起来以后，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要了，我是医生，要救人，不管是敌人自己人，我都要救。"我那时候真想问他："你是把我当做敌人啊，还是自己人啊？"可是看他那个发抖的样子就不好意思问他，就算了，回到本部里去了。本部也没有人，通通跑掉了。

由于找不到部队，无奈之下，陈明忠只好带着5个人离开埔里。不想，路上他们又遭遇了警察，还和警察交了手。

陈明忠：走到雾社和埔里中间一个叫做眉溪的地方，有个派出所，看见几个警察在那里。因为打了败仗，受了伤，两天晚上没有睡觉，我一气之下，开玩笑了，说攻。一打，这下糟糕了，警察都跑掉了。后来警察报告说，我们五六十个人攻他一个，攻派出所，实际上只有五六个人，结果他加了10倍。我后来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地方，只有五六个人，结果他向上报五六十个，所以国民党军那边说五六十个"二二八"的暴徒，他们说我是暴徒了。

在这次战斗之后，"二七部队"的人员各自逃亡，谢雪红、杨克煌远赴香港，后来又转赴大陆。当时国民党缉拿谢雪红的悬赏奖金是10万元，陈明忠则是1万元。陈明忠本想离开学校，而他曾经保护过的院长周进三此时也对他伸出援手。

陈明忠：这个院长是陈仪的妹婿，他以前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念书的，日本话讲得很好，可是他平常不讲，他讲话的时候说普通话，还有一个台湾人做翻译。我们也不知道他是陈仪的妹婿，后来他才告诉我。因为"二二八"完了以后报纸上登出来嘛，要通缉我，1万元奖金。谢雪红他们当然也通缉。

我想离开的时候，他叫人家来，他要保我，因为我救过他们嘛。院长就叫一个教授带我去二十一师，二十一师一个少将问了我一些事情。

他一直问我谢雪红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真的没有办法回答。给他骂，说：“你们是为了爱国，没有错，可是你看‘二二八’的结果，物价都涨价了。”给他骂了一顿。

曹景行：他们主要问谢雪红哪里去了？

陈明忠：等于是叫我们自首一样，让我们写悔过书，写下文稿给我，叫我按照这样写，我就这样写。现在档案解密里面，我找出来了，我那时候写的悔过书，都是胡说八道。

在学校院长和老师的帮助之下，陈明忠总算化险为夷，顺利地回到了学校读书。他的生活暂时平静了下来。然而，他逃过了“二二八”，却没逃过即将到来的“白色恐怖”。陈明忠那时并没有想到，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将会两度入狱，被判处两个死刑，成为台湾最后一名政治死刑犯；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牢房囚室里度过21年的时光。

○基隆的案子，外省人统统枪毙，本省人统统感训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宣告从第二天零时起，台澎金马地区实施“戒严”。从此一直到1987年的38年间，都被人们称为台湾的“戒严时期”，或者叫做“白色恐怖”时期。

据统计，“戒严时期”台湾共发生近3万起与政治相关的案件，14万人牵连其中，其中三四千人遭到处决。而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全部的罪名都被扣上了“红帽子”，离不开所谓的“参加朱毛匪帮”。众多的政治受难者当中，陈明忠就是其中的一个。“二二八”过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没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陈明忠：有个同学说：“宪兵队的黑名单里面有你。”我说什么单？“黑名单”我那时候连黑名单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他说：“你是危险分子。”那时候我对什么是危险分子也弄不清楚。

1950年，“白色恐怖”的风暴开始席卷台湾。9月的一天，厄运降临在了陈明忠的身上。

陈明忠：我那时在冈山农校教书。忽然有一天，几个宪兵来了，他说有话要谈，直接就带我走了。先是到了冈山宪兵队，然后被送到彰化宪兵队，在那里刑求刑讯（逼供）、问案，问我参加共产党没有，我说没有参加。

曹景行：怎么样的刑求？

陈明忠：灌水，先灌水。躺在板凳上，还要用毛巾来捂住口鼻，不准你呼吸，就把水吸进去了。吸了很多以后，肚子大起来了，他就用板子压，（水）就会出来了。后来我没有承认，就把板凳倒过来，把水管直接从鼻子里面灌进去。本来压的时候是用板子，以后没有，他直接用皮靴踩起来，水就从鼻子、嘴巴里流出来了。搞成这样，再用棍子打。

曹景行：灌的是什么，就是水？

陈明忠：水，头一次是灌的水。后头就老虎凳来了。

曹景行：老虎凳？

陈明忠：老虎凳以后呢，我就晕过去了。醒过来以后他说：“你现在看老虎凳这个地方，这样搞出来以后，关节就断了。如果断了，你一辈子就残废了，所以你还是承认好了。”

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承认，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有没有这个党我不知道，随便讲嘛，因为他一定要说我参加叛乱组织。

曹景行：他主要是要您承认参加共产党。

陈明忠：是吧，那我没有参加。没有办法，我就承认说“社会革命党”。

由于陈明忠已经招供参与所谓的“社会革命党”，于是情报治安保卫单位不断将他送往各地接受审查。不久之后，陈明忠就从彰化被转移到了台南的宪兵队。

陈明忠：我的同犯里面有一个宪兵，他是误杀人，和同事开玩笑时，以为枪没有子弹，一开，一颗子弹出来就把同事杀掉了，所以他被关在里面。有一天晚上，他和他同事——他们都是宪兵，两个人讲话的时候，外面那个人说：“这里面有没有陈明忠？”我正躺在里面，一听，哎，他讲到我了。他说有啊，他同事就指着我说：“队长说这个要枪毙。”我就糊涂了，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房间的那个人说：“他没有事情啊。”

他同事说：“哎呀，这些人绝对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有事情也说没有事情。”他讲陆军的一个什么司令或副司令，他的姨太太是共产党，他知道了以后没有办法，自己把姨太太杀掉，因为会影响到自己，所以他们不会承认的。“他说没有事情，绝对不是没有事。”我说怎么会？我会死掉？别人没讲我要枪毙呀？我想起来，对了，这个名牌有挂，大家都“匪谍嫌疑”，我是“匪谍”。

无意间听到的这次谈话，让陈明忠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时刻都有可能面对死亡。

陈明忠：过了几天，早上10点多钟的时候叫我起来。“陈明忠，起来，出来。”我说：“我一个人吗？”他说：“是啊。”我一个人？那就是枪

毙了，于是我就把身上带的东西，有一些现金、香烟（里面可以抽香烟）、手表给一个关在一起的人，他是台中师范的，毕业以后做老师的。他叫黄介石，这个人后来被枪毙掉了。

我把东西交给他，上次的谈话他也听到了，所以他两个手捧着我给他的东西，他也没有办法安慰我。大家都还年轻，我是21岁，他是22岁，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安慰，所以他捧着东西也不说话。我要走出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头顶）会跳，“砰砰”！我大概有一点紧张了，就走出去了，然后被捆起来了，结果不是枪毙，（而是被）送到台北了。我们这个案叫做杂案，就是不是一个案子，当时抓到的人全在一起，互相都不认识，有台北的，有台中的。

曹景行：抓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匪谍嫌疑”？

陈明忠：都是“匪谍嫌疑”。

曹景行：不是什么其他各种各样的犯人都有？

陈明忠：没有，都是政治犯，都是“红帽子”。

那时的陈明忠只有21岁。尽管从台南被转移到台北，暂时没有被枪毙，但死亡的阴影仍然时刻笼罩在他的心头。他说，想到自己很可能会死，也会为自己感到可惜。

陈明忠：因为那个时候谁会死、谁不会死，是按照开庭的顺序来算的，没有起诉书嘛。开始的时候是数了，列入12个人。

我们那时候大概有个行情，12个里面四分之一——就是3个会死。我开庭的时候，第一次出去的时候，第一名那是枪毙，一定死了。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又变成第四名，偏偏这个时候“行情”就增加了，本来四分之一，那时候变成三分之一了，就要死4个，我刚刚碰到了。所以我那时候也比较动摇，会不会死搞不清楚，有一点心里着急。

由于陈明忠在严刑拷打之下供认的“社会革命党”只有他一个成员，情报治安保卫单位几经调查依然没有收获，只好押解着陈明忠赴台湾各地“调查取证”，让他忐忑不安的死刑也就缓了下来。

陈明忠：我为什么拖了久一点，就因为我承认是“社会革命党”嘛，根本没有这个党，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去的时

候，问了两三次。我说："你打我，给我刑求，我没有办法才承认这个东西。那谁创立的，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到底有没有这个党我也不知道。"

调查期间，陈明忠曾经被关押在保密局一个多月。恶劣的条件让他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陈明忠：保密局吃的菜都很坏，像冬瓜只有手指这样大的两三块。有一次吃花生米，一共19颗，我就吃了9颗，剩下10颗想下一顿再吃，结果调走了。我一想到那10颗花生米就觉得很可惜。现在已经60多年了，想到那10颗花生米还（觉得）很可惜。

在保密局睡觉也很倒霉，保密局一个13平方米的房间，关了24个人，所以分三班睡觉，8个人睡觉，其他的16个站起来，站16小时，但是有时候可以蹲下来，不是坐，我们那里坐的地方都没有。所以那一个多月脑筋不清醒，都没有办法思考。还好后面被送到军法处来，军法处就比较好一点，这里分作两班，可以轮流睡觉了。所以到了军法处的时候就很高兴。

"保密局的牢房空间很小，人多拥挤，空气又污浊，在里面只能蹲着，搞得大家都便秘，生不如死。在这里，常听到被刑求者凄厉的叫声，审讯室里各种刑具都有，吓都吓死了。同房中有一半以上是大学生，虽互不认识，但会互相照顾，如果有家人送东西来，都会分着吃。"

——《"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杨成吴先生访问记录》

关押期间，除了恶劣的条件，和陈明忠一起待过的狱友们也让他印象深刻。几十年后，陈明忠在回忆狱友时曾经写道，他们都是才从鬼门关里走一遭回来的、充满理想怀抱热情的年轻人，他们在囚室里谈天、争辩，"由此激荡出的思想火花，让苦难的监狱生活充满了想象力，以及对未来的新希望"。

陈明忠：大致是这样，那个房间，早上某某人准备东西，就是要枪毙了。我房间里面有一个张伯钊，这个人是广州人，中山大学毕业的，他知道会死，所以每天早上都准备，衣服都穿好。如果今天没有枪毙，他再脱下来。

曹景行：后来呢？最后他怎么样了？

陈明忠：当然枪毙了。我看张伯钊这个人好像无所谓，每天早上准备。我有点动摇，他就给我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记得很清楚，他说孔子讲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说：“道是什么？就是你的理想！我为了理想死，求仁得仁嘛。”我非常佩服他，他自己承认他是共产党，所以他一定会死的，可是他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同一个房间，又有一个基隆中学的校长，很有名的。在“日据时代”，他为了抗日回到大陆，后来回来当基隆校长，是共产党。这个基隆的案子，外省人统统枪毙，本省人统统感训。他是本省人所以判感训，但是他不接受感训。

曹景行：他不接受？

陈明忠：他说：“我的部下都死掉了，我为什么留下来？”他就这样死掉了。我们普通人死的时候叫，他出去的时候喊口号，有些是“共产党万岁”，有些是“毛泽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死之前，有一次他说：“你给我唱一首《红马车之歌》。”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太太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想，他为什么想到他太太？大概他太太很可怜嘛，以前他到大陆去抗日，回来当校长没多久就（被）枪毙了。

“最恐怖的时期是在军法处，每天凌晨五点钟都会有人被叫出去枪毙。那时的气氛很紧张，因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叫到我’的恐惧一直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潘水匮先生访问记录》

对于根本不存在的“社会革命党”，当局查来查去也没有线索，最终起诉陈明忠的时候，只好翻出“二二八”的旧账，指控陈明忠“参加叛乱组织”。在法庭上陈明忠对此提出抗议说：“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时就已经宣布，对‘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既往不咎，怎么又拿‘二二八’的旧事来判我入罪呢？”法官当时回答说：“就是因为不追究才会判你10年的徒刑，要是追究起来，你有10条命也不够。”所以，法官反而认为陈明忠应该感谢政府的宽大。

判刑之后，陈明忠被送往台湾著名的政治犯监狱——绿岛的“新生训导处”。在绿岛，政治犯们要接受感训，内容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思想改造就是训话、上政治课、小组讨论。

据政治犯回忆，政治课的内容有领袖言行、“国父”遗训、“中国之命运”、国际现势、毛泽东理论“批判”、“共匪”暴行、苏俄侵华史等。劳动方面则是“只要补给船运来黄豆、米、面粉、煤炭等，就要动员轮流到南寮扛补给品。从南寮扛着约50公斤重的补给品到新生训导处，一趟来回十余公里，上、下午各一趟”。此外，还要上山砍柴、割茅草，下海敲石头盖“克难”房、围围墙、营造司令台等。政治犯们的生活就是一日上课，一日劳动。

陈明忠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忍耐10年，他就可以重获自由。不想，两年之后，他又被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监狱暴动”的案件之中。陈明忠说，这场狱方一手导演的“监狱暴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狱方想为了通过编造假案领取奖金。

陈明忠：我们不过是怠工，就是不愿意做工，因为营养不好，劳动太多了，所以我怠工。结果就变成我带头了，说我们要暴动。我们20多个人就被捆起来，送回来，那应该要枪毙了。

由于同案狱友的家人多方打点，这个案件受到重新审查，陈明忠等人总算逃过了一劫。此后，陈明忠被送到新店军人监狱。

陈明忠：我在坐牢的时候，风评（指大家对某人某事的评论）还不错。我打个比方，坐牢的时候，好多外省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卫生纸没有，牙刷也没有。我们家里寄来的东西吃不完嘛，所以我说，我们把钱合起来，大家一起用。

陈明忠的建议得到了狱友们的支持。但他没想到，自己这么一次好心之举，也会遭到狱方的打压。

陈明忠：这个本来挺好的，结果后来大陆人民公社开始了，他说我们搞人民公社，就受到处罚了。

在新店军人监狱，陈明忠患上了肺结核，吐血的时间长达五六年，却没有得到基本的治疗。

陈明忠：吐血，每天吐血，他不给你治疗。我说要去看病：“我吐血。”他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病？”我说：“下午就开始发烧，发烧到三更半夜。”“还有没有？”“肩膀会酸。”“还有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流汗。”“还有没有？”“没有了。”“不够资格，回去。”

就是这样的，他不给你治疗。有时候头痛得不得了，他说不要胡思乱想就好了，不给你治疗。我现在大概65公斤，而我10年刑期满了回来的时候只有43公斤，肺结核也好了，没有治疗也好了。

〇小牢是监狱，大牢是社会

陈明忠的妻子冯守娥女士，也是在1950年被捕入狱。冯守娥入狱的理由很简单，只是在高中时代参加读书会，但是她的刑期与陈明忠一样，也是10年。冯守娥和哥哥冯景辉同时被捕，几个月后冯景辉就被秘密枪决。

冯守娥：我哥哥，平常我们是很要好了。有什么书也是一起看、一起讨论。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希望有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希望有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当然还希望赶快统一。那个时候正在讲统一，但我们已经觉得是统一的，不是只有台湾，而是整个中国，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通过街头的布告，冯守娥的父亲和母亲才知道儿子冯景辉被枪决。而冯守娥自己，则是在对她宣判的法庭上，听到了哥哥冯景辉被枪决的噩耗。

冯守娥：我哥哥的罪名是：颠覆政府，着手执行。我就跟那个法官抗议了，我说："什么叫做颠覆政府、着手执行？"据我所知，我哥哥顶多也就是要人家一起抗诉而已。

曹景行：他是不是参加共产党？

冯守娥：不算是参加的，那个是读书会的名字。

曹景行：就是外围，可能是外围。

冯守娥：对，他们要这样讲，我也不知道。当初无论如何也没办法争辩，他是秘密审判的嘛。

曹景行：您是20岁进去的？

冯守娥：对。

曹景行：出来的时候多大了？

冯守娥：30岁，虚岁是31岁，那个时候我们都讲虚岁的。出来以后情报治安保卫单位还是一直控制你。比方说一个月要去几次其他地方，

要移动或者什么，也要去报到，到警察那边户口登记。反正很麻烦，你去工作，他也要跟，去哪里工作就跟到哪里。

1960年，冯守娥总算走出监狱。她说，在那个年代的台湾，他们这种政治犯出狱之后，只是从“小牢”换到了“大牢”。小牢是监狱，大牢是社会。

冯守娥：我爸爸卖了一块土地给一个工厂，他的条件就是，我们家里介绍两个人进去，就说介绍我的一个堂弟进去，另外想留一个位置给我。结果我回来，写履历表的时候，我就把那10年照实写——因为那里的人事主任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我写假的，他也会知道嘛，所以我就照实写，“因思想问题坐牢10年”。

结果履历表寄去了，被他退回来了，不行，不能要我。那我没有办法，只好去学打毛线，去租人家的房子，跟人家合伙打毛线。我想那个是比较独立的，不会被找什么麻烦，可是警察也去跟那个房东讲那些话，威胁他。那我没有办法，只好又再找工作。

当时，台湾当局对释放的政治犯的监视，几乎到了如影随形的地步。同为政治犯的潘水匮说他出狱后，因为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种菜：“我种菜，警察也会到田里察看，到家里找我更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还会遇到警察，监视真是无所不在。”

冯守娥在狱中并不认识陈明忠，出狱之后，他们为了生存，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台北工作。在那里，冯守娥和陈明忠相识、结婚。那时，出狱的政治犯之间结婚很常见，他们称之为“同学结婚”，外界却把这样的人家称为“叛乱家庭”。

陈明忠和冯守娥先后有了两个女儿，生活也平静安逸。那些年，陈明忠在一家药厂工作。不过，他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却没有停止过。

一些所谓的“党外人士”和陈明忠也有交往，虽然大家只是喝酒谈天，但是陈明忠也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当局都在密切注意。因此，他小心翼翼，避免被抓住把柄。不想，厄运最终还是没有放过他。

〇就算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来

1976年，前台东县长黄顺兴的女儿黄妮娜在日本求学时，秘密去了一趟大陆。回到台湾之后，黄妮娜被逮捕。在狱中，黄妮娜供称，她之所以去大陆，是在思想上受到了父亲的朋友陈明忠的影响，她所看的书籍也是陈明忠提供的。

1976年7月4日，陈明忠再次被捕。在他的记忆当中，当他被带进保安处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在等着他，其中有中将、少将，也有上校、中校。其中那位中将见到陈明忠后就说了两句话，说完之后，拂袖而去。第一句话是："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有口供。"第二句话是："就算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来。"

陈明忠说，在一张需要他签字的保管单上，他看到了"民国六十五年度特字001号"的字样，于是越发感到事情不妙。

陈明忠：那就开始问了，问了就刑求，什么刑求都用了。他自己说："刑求分成四个阶段，普通人第一个阶段就承认了，剩下少数人也是第二个阶段就承认，没有的事情都承认。"闽南话讲"偷古井"，舀水的古井都偷走了，固定的井怎么会被偷呢？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都承认了。所以第三阶段、第四个阶段，他没有用过。我是头一个四个阶段都通过还不承认的人。

最后他问我："你到底练什么武功？"我说："我哪有练什么武功？！"我知道一承认就完了嘛，你不管怎么样假的都一样会死掉嘛。当然，不承认也会死，不过起码还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可以活下来，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承认。

陈明忠记得，当时刑求的所谓"四个阶段"总共要经过21个昼夜，各种酷刑轮番上阵。拷问他的调查人员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他承认几个著名的党外人士是黄妮娜赴大陆的"幕后黑手"。陈明忠明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

陈明忠：当然很痛苦，指甲也被他拔掉了。现在觉得比较痛苦的是，指甲拔掉已经很痛了，还要把牙签插进去，插进去以后，小便都会出来。老虎凳以前也用过了，现在也搞了。灌辣椒水还没有关系，灌汽

油那就非常痛苦了。灌汽油以后两三个月一直都有汽油味道，为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尽量吐出来。因为我知道灌汽油会慢慢地死掉。以前日本快投降的时候，把大陆的负责人抓了很多，都灌汽油，后来通通死掉了，没有马上死，慢慢地死掉。所以我知道会死人，经常吐出来，可是还是有一部分进去了。

老虎凳用过以后，坐牢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监狱里没有活动嘛。可是出来以后走路，那就有点糟糕，没有办法走下去，所以只好开刀。现在越来越厉害，我现在如果没有戴腰带的话，恐怕50米都走不动，变成了这样。

最后五天五夜，心脏坏了，一分钟跳了200多下。他叫三总医院来看，又给我吃药，可是没有用，就一直不停地跳，没有办法。在这中间，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会给他刑求死掉，所以我说，我和国际特赦组织有关系。这样他们就不敢把我弄死。

陈明忠后来才知道对他执行刑求的保安处第三组，组长是张伟英上校。被判刑之后，陈明忠在监狱的电视里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电视报道说，张伟英以“科学方法”侦破陈明忠等人的案件，被选为“国军英雄”。

当时陈明忠的罪名是“以非法的方法意图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由于陈明忠坚决不开口，当局就诬陷陈明忠计划从东南亚进口武器，准备暴动。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不准陈明忠与家人会面，也不准陈明忠请律师。

陈明忠：不让她（冯守娥）请律师，把她抓起来，把身份证什么的都拿去，她还是要请律师。结果呢，他说两个人没有夫妻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在搜的时候把身份证、户口簿都偷偷摸摸拿去了，这样就变成不能证明两个人的夫妻关系，所以她就没有办法替我请律师了。于是我妹妹赶快回到冈山，叫我妈妈来，可是已经晚了，辩护已经结束了。所以给我请的三个律师，一个都没有辩护。所以我说我是秘密审判的最后一个嘛。“也是最后一个死刑犯，也是唯一没有死的死刑犯”，这是陈文茜讲的，不是我讲的。

后来是我太太看到情况不对，赶快找她妹妹帮忙，她妹妹在美国嘛。那么她妹妹就开记者招待会，一些国际组织，还有“保钓运动”美国

那些人，就开始营救我。后来还在《纽约时报》里面第一页做广告，听说那个花了台币60多万。因为救我的人里面有几个是诺贝尔奖得主，所以台湾就没办法枪毙我，后来只判了15年。

陈明忠说，由于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的那一天，军法处连夜改写判决书，改判陈明忠有期徒刑15年。在1976年11月27日的电视新闻上，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亲自发表谈话，宣布陈明忠意图从东南亚偷运武器发动暴动，被判15年徒刑。

陈明忠：蒋经国出来说，我从菲律宾拿武器回来，要暴动。问题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菲律宾啊，我是坐过牢的人，根本不能“出国”，但是还是这样判了。我去绿岛的时候，那些还在服刑的人已经知道陈明忠要来了，我坐直升机回去的那天，他们香烟、酒都准备好了。那些人，他们无期的，一直留在那里。

1950年我第一次判10年回来，他们就在那里。那时候已经26年了，还在等我。所以我说：“你们够朋友，我坐满了10年出来，结婚，生孩子，再进去，你们还在等我。”

〇动乱时代的人，不如太平时代的狗

陈明忠在绿岛度过了11年的时间，最后的6年被单独囚禁。随着严刑拷打的后遗症日益恶化，陈明忠的妻子冯守娥在两年内写了30封申请书要求保外就医，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经过多方营救，直到1987年3月9日，监狱里的副监狱长亲自带队，把陈明忠送回台北的家里。狱方人员临走时还专门拍了一张陈家的全家福照片，证明陈明忠已经平安回到了家人身边。

曹景行：等您出来，孩子们都长大了。等于说您的孩子从小就是政治犯的孩子？

陈明忠：是啊，叛乱家庭啊。

曹景行：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陈明忠：很痛苦啊。对我大女儿影响比较大，她后来觉得社会很脏，从外面回来，下课回来，连书包都要洗，变成这样了，所以我心里对她们有点愧疚。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给他讲："爸爸，你们走你的路，当然这是你们的自由，可是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的话，为什么要生我们呢？让我们这么痛苦。"我们大家说起这些来都很痛苦啊。

还有一个人，他被判了15年，回来以后，有一次他女儿和她的朋友来，他听他女儿的朋友说："刚才那个人是不是你的爸爸？"她说："听说是。""听说"——因为她家里说爸爸死了，结果爸爸一下子又出来了，所以她们不认，说"听说"。

"回想我们走过的岁月，可以说生不逢时。在日本统治时代，我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回归'祖国'后，我们满怀欢欣，但'祖国'回馈给我们的是'二二八'的无情杀戮。我们关怀社会，热爱国家，结果在威权体制之下，换来的竟是被捕入狱的悲情遭遇。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历史可以改写，没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我虽被异族统治，但铁定不会坐牢，也不会看到这么多好人被处死。在此，我永远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的战友，以及关心台湾前途而牺牲的政治难友，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

——《“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谢新杰先生访问记录》

“今天的社会已经比我们年轻的时代开放、自由许多，如今抗议、游行示威都没问题，要是以前通通被抓。尤其被戴了帽子，就脱不了罪嫌，这样的岁月，我们已经走过，不但牺牲了青春，葬送了前途，甚至家破人亡。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

——《“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吕聪明先生访问记录》

陈明忠：动乱时代的人，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们是通通完了，我21岁（坐牢）坐到31岁，第二次47岁（坐牢）坐到58岁，不是完了吗？出来后不能做工作了，身体也弄坏了。我们不希望这种痛苦再让我们的孩子、孙子这一代承受，2300万的（台湾人）不要再受这个痛苦。

[1]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0-1958）美国空军中将，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指挥官。1937年至1945年期间与中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入侵。1946年10月成立民航空运队，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运送救济物资，后来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给养。

[2] 严家淦（1905-1993），号兰芬，字静波，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66年被蒋介石擢升为“副总统”。1975年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三年后卸任。任职“总统”期间，将最高权力逐步过渡到蒋经国手中。1993年病逝于台北。

[3] 据秦孝仪后来回忆，”耶稣基督“是宋美龄加上去的。

[4] “国民党四公子”为1970-1990年台湾政坛用语，另外三人为前“内政部长”连震东之子连战、“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之子钱复、“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宗瀚之子沈君山。四人均为国民党要人的第二代，且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

[5] 陈明仁（1903-1974），湖南省醴陵人，国民党起义将领、解放军上将。抗日战争期间率部队在广西作战，收复柳州、桂林。解放战争期间参与指挥四平战役，因击退林彪、罗荣桓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干城之将”。

[6] 关于陈诚“三炮起家”的说法是：棉湖之战，陈诚“一炮”打响；“二炮”打响，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谋反，陈诚带领，炮兵连当机立断，架炮击倒敌阵军旗，随后国民革命军赶来一举歼灭敌人；“三炮”打响，则是攻打惠州城时，陈诚发炮打开城墙缺口，使东征军得以攻破惠州。

[7] 即台湾水泥、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和台湾纸业四大公营企业。

[8] 熊公哲（1895-1990），字翰叔，号果庭，江西奉新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著有《荀卿学案》《王安石政略》《高中国文教学备考》《孔学发微》《果庭读书录》《果庭文录》等。

[9] 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10] 唐纵（1905-1981），字乃建，湖南炎陵人。在国民党内长期从事军警情报工作，有军统“智多星”之称，深得蒋介石、蒋经国器重。

[12] 《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份影响深远的纯文学刊物。欧阳子、陈若曦，於梨华、李昂、林怀民等新兴台湾作家都曾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作品。女作家三毛的第一篇小说《惑》也发表于《现代文学》，据说三毛由此受到鼓励，放弃学习绘画，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除了发掘和培养了台湾新一代的小说家，《现代文学》还率先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福克纳等西方文豪的译作，正是通过《现代文学》才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的。

[13] 1949年9-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湖南省衡阳、宝庆地区，对白崇禧军队进行的进攻作战。历时34天，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14] 王麻系阿拉伯语“聚礼”的音译，穆斯林于每周星期五下午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仪式。包括礼拜、听念教义演说词和听劝善讲演。

[15] 程思远（1908-2005），广西宾阳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1930年担任李宗仁的秘书，后任白崇禧的秘书。1949年寓居香港，曾任《正午报》专栏作家。1965年受周恩来之托，协助

李宗仁夫妇返回大陆，随后与李宗仁定居北京。曾当选为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6] 余纪中（1909-2002），江苏武进人，中央大学毕业，历任国民党第二〇三师政治部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主任，东北行辕新闻处处长等职。赴台后任"中国时报"社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17]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在查缉走私香烟的过程中，不慎开枪误伤围观群众。愤怒的群众在惩处肇事稽查员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包围了宪兵队。此事件触发了2月28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请愿市民遭到驻署的卫兵攻击，事件因此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进而激化为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民党军镇压，造成许多平民伤亡，台湾迅速掀起反对国民党的浪潮。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受命率蒋经国等前往台湾调查安抚，会见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等人，并向台湾居民广播，平息了这一事件。在随后提交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告时，白崇禧也对台湾人民多有缓颊。

[18] 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

[19] 李宗仁的字。

[20] 黄旭初（1892-1975），广西省容县杨村镇东华村人。历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长、绥靖公署副督办。1931年起，连任广西省主席19年。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因做过李宗仁部下，对李宗仁忠心不贰，是桂系政治大员。

[21] 蒋孝严的妻子黄美伦。

[22] 佩佩即孔令仪的中文乳名，由英文乳名"Baby"音译而来。

[23] 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州人。国民党元老，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24] 中国东南部地区重要的铁路干线，北起江西鹰潭，南至福建厦门。1955年动工兴建，1956年竣工通车，曾经长期是进入福建的唯一铁路线。途经地区多山且暴雨频繁，因此常有山体滑坡造成铁路中断事故。

[25] 厦门边防，靠近泉州。

[26] 位于厦门东南海面，与金门岛最近距离仅1800米，面积13.2平方千米。"八二三炮战"中被授予"英雄三岛"称号。

[27] 1958年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兵力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当记者问道如果中共方面作出某些让步，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他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28] 谢雪红（1901-1970），原名谢阿女，台湾彰化人。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二二八事件"中坚持对国民党采取武力抵抗。后前往香港，创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担任首任主席。后来相继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1970年病逝于北京。

[29] 杨克煌，台湾彰化人。1929年加入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日本侵略者逮捕，5年后获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与组织台湾人民协会，并被选为委员。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前往香港，参与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担任第一届总部理事会秘书长。后回到大陆，任台盟总部理事兼秘书长。

[30] 张志忠（？—1954），本名张梗，化名老钟，台湾嘉义人。“日据时代”曾赴厦门集美中学、大学就读，并积极参加反日活动。1936年前往延安，就读抗日军政大学，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台，担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二二八事件”中组织“台湾自治联军”武装反抗国民党，失败后转入地下。1950年被捕，多次劝降无效后，于1954年被枪决。